

目

学术研究

(郭沫若题)

社长 主编

梁渭雄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冯达才

总校对

黄荣显

•学苑聚焦•

- 5 /冯 生:发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光荣传统,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我省社科界纪念五四运动座谈会、研讨会活动综述

•邓小平理论研究•

- 11/刘 嵘:邓小平理论的主要特色
——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 15/李全发:邓小平改革理论的科学体系
- 19/潘华实:试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 22/怀 思:《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研究丛书》第二辑简介

•经济学 管理学•

- 25/许经勇: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与我国的出口贸易
- 30/谢 康:论服务贸易发展对中国外贸环境的影响
- 34/张 井:对深化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构思
- 38/吴金群 邓 飞:政府采购近期研究综述
- 41/徐 斌:药品消费研究

录

·哲学·

47/王金宝:现代性的危机与出路

54/高家方:黑格尔逻辑学开端探析

·历史学·

59/蒋昭侠 曹诗图:对史、地分离学术研究现状及其原因的反思

64/曾昭璇 曾新 曾宪珊:从《西安历史地图集》看史、地的结合

67/肖茂盛:略论广东商帮商人资本的发展趋势

72/黄赞发:翁万达的典边韬略

·文学 语言学·

76/徐文俊:马采先生及其学术贡献

78/臧克和:古汉字结构的取象类型原始移情考略

84/林 笱:库恩和中国古典小说

——兼谈文学的创造性背叛

91/车永强:试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书评·

96/伏俊琰:赋学研究的一部力作

——读曹明纲著《赋学概论》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83815300—283

83846307、83846177

邮政编码:510050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排印

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CONTENTS

No. 5, 1999

- Academic Activities in Guangzhou for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May 4th Movement
..... Feng Sheng(5)
- Main Features of Mr. Deng Xiaoping's Theory Liu Rong(11)
- The Scientific System of Deng Xiaoping's Theory Li Quanfa(15)
- A Trial Talk about the Current Chinese Marxism Pan Huashi(19)
-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Second Volume of 'Series of the Study
of Deng Xiaoping's Theory and Guangdong's Practice' Huai Si(22)
-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Chinese Foreign Trade
..... Xu Jingyong(25)
- On the Influ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Trade upon the Environment
of Chinese Foreign Trade Xie Kang(30)
- A Tentative Plan fo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Commodity Circulation System
in China Zhang Jing(34)
- Points from the Present Study of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Purchase
..... Wu Jinqun and Deng Fei(38)
- An Analysis of Medicine Consumption Xu Bin(41)
- Crises and Way Out for Modernity Wang Jinbao(47)
- The Start Point of G. W. F. Hegel's Logic Gao Jiafang(54)
- A Review upon the Present Study Divocing History from Geography
..... Jiang Zhaoxia and Cao Shitu(59)
- Combination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Point from Reading 'A Coll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Maps of Xi - an City Zeng Zhaoxuan, Zeng Xin and Zeng Xianshan(64)
- The Developmental Tendency of the Commercial Capitals of Guangdongese
Merchants Groups Xiao Maosheng(67)
- Mr. Weng Wanda's (1498 - 1552) Military Strategies for Guarding the Frontier
..... Huang Zanfa(72)
- Mr. Ma Cai and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 Xu Wenjun(76)
- A Textual Study of the Original Hieroglyphic Types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 Zang Kehe(78)
- Mr. Franz Kuhn (1884 - 1961) and Ancient Chinese Stories Lin Jia(84)
- Satiric Means of Mr. Qian Zhongshu's Novel 'Wei Cheng' (《围城》)
..... Che Yongqiang(91)
- A Book Review over 'An Outline of the Study of Rhymed Prose *Fu*'
by Cao Minggang Fu Junlian(96)

发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光荣传统， 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我省社科界纪念五四运动座谈会、研讨会活动综述

□本刊记者：冯 生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5-0005-06

今年是五四运动 80 周年。五四运动作为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爱国救亡运动，一场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一次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次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民主、科学的精神，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条件。隆重纪念五四运动 80 周年，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努力实现跨世纪的历史任务，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最近，《学术研究》杂志社、《羊城晚报》理论部、《广州日报》理论部、广东哲学学会、广东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会、广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广东哲学学会等相继组织广东社会科学界专家学者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 80 周年”学术座谈会、研讨会等系列活动，现将其要点综述如下。

一、继承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传统，发扬新时期爱国主义精神。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中最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东西，就是爱国主义。历史上，当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利益受到外来侵略势力严重威胁的时候，人民群众总会义无反顾地

奋起抗争，这个传统在五四运动时期被空前广泛地激发出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扬光大。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爆发的爱国运动，是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指导的革命的爱国主义运动，也是有广大群众参与的全民的爱国主义运动。有学者认为，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爱国主义有着不同的要求和内容。五四时期的爱国主义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爱国主义，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主旨的爱国主义。在今天中国，爱国与爱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的，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和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也是一致的。爱国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爱国主义才能取得重大成果。爱国，不仅要在口头上，更要落实在行动中，尤其要用实际行动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新时代的青年，作为祖国的未来和振兴中华、建设祖国的生力军，更要注意继承五四运动的爱国传统，发扬先辈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

纪律的新一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功立业,创造出无愧于先辈和时代的光辉业绩来。

二、弘扬五四运动的民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有学者指出,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之一,就是倡导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以及为这一制度服务的旧礼教、旧道德和旧意识,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这种旨在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广泛的人民民主政治,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一脉相承,在本质上完全一致的,这是因为:1.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特征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要清除封建专制主义长期统治的影响,真正把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权力落到实处,还需要作长时间艰苦的努力。不仅要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树立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公仆意识,克服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更重要的还要建立一套使人民能够广泛参与国家管理、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具体制度,也就是要改革和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我国已经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体制,在改革和完善这个政治体制的过程中,必须依据我国的国情而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这当然不妨碍我们借鉴民主国家的管理经验、吸取其中一些并不注定“姓资”的具体做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政治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2. 没有民主,就没有健全的市场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国后30年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和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随着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

化,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愈来愈迫切地要求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市场经济的运作,不能靠人治,而只能靠法治。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仍然个人高度集权,而又缺乏民主监督和法规制约,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权力腐败、以至出现许多“钱权交易”的现象,最终破坏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一些国家的政治腐败直接加剧了泡沫经济的膨胀。我国在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已经迈出了许多切实的步子,但仍然滞后于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也正是党的十五大提出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缘由。3.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的持续稳定,归根结底取决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正确处理。而社会主义民主,正是调动广大人民积极主动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所以从根本上说,发展民主和实现稳定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当然,民主进程和稳定局面有时也会出现矛盾,特别是在深化改革、触及人们利益关系调整的时候,社会上难免会有较多的不稳定因素,如果民主不能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社会就会出现不稳定的局面,而没有稳定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所以在一定情况下,我们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如果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发生矛盾,那就只有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我们所讲的稳定当然不是绝对的静止,不是什么事情也不干,更不是什么话也不让讲。前辈们说得好: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而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听不到人民的声音。缺少民主的稳定是难以

持久的,因为没有民主,就不能合理地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的矛盾,不能沟通、协调各种不同的意见,不能真正消除各种不稳定的因素。我们要在稳定的局面下逐步地推进民主,又在民主的发展中实现稳定,这才能有社会的长治久安。4. 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的发展。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是紧密联系的。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当代要实现现代化,关键仍然是要进一步弘扬科学的精神,民主并不直接解决科学真理的问题,因为多数人的主张也不一定就符合科学的真理。科学真理在开始被发现的时候,往往还只被少数人或个别人所认识和掌握。然而从发展来看,民主能促进集思广益,便于集中众多的实践经验,并能保护少数人的意见,特别是能够排斥个人专断、营造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保障。我们倡导领导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决策的民主化,就不会有决策的科学化。5. 没有民主,就没有持续的思想解放。邓小平说,“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如果人们连话都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讲了真话还要被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那还怎么能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由于开始有比较正常的民主生活,才能不断突破僵化思想和僵化体制的框框,取得改革建设事业的胜利。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为继续解放思想提供良好的条件和保证,才能顺利地把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新的世纪。

另有学者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发展,我国经济和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业已基本具备,

因此必须抓紧进行,为此很需要做好如下工作:1. 端正对民主的认识。过去,在某些领导人那里,民主被单纯地看作是一种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你要做好工作,就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发扬民主,往往强调“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由于“集中”往往不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所以“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又变成了“长官意志下的民主”,“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大民主”就是典型。十五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是说,民主不仅是方法和手段,更重要的是目的和制度;民主不是谁的恩赐,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民主的作用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我们只要这样理解民主的本质及其重要性,才能认识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自觉地努力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开展政治体制改革。2. 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通过立法的形式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权威,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必须遵守执行。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得到落实和保证;才能使践踏民主的家长制作风及腐败现象得到制止和惩罚;也才能避免因领导人的变动而改变,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各级人大和政府应把制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和法规摆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切实抓紧抓好。3. 民主建设既要稳妥又要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主要受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政治体制改革要

以安定团结为前提。所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要有一个过程,欲速则不达。另一方面,民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政治、文化又有巨大的反作用。因为民主的发展,必然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同危害国家和社会稳定的犯罪行为作斗争,对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起着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革政治体制决不能慢慢来,更不能停止不前。正如邓小平所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我们一定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按十五大精神,有秩序有步骤地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搞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

三、发扬五四运动的科学精神,实施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有学者指出,民主与科学,是两个相互联系的课题,前者是后者发展的重要条件,后者则对前者给予促进作用,二者都是使得社会摆脱中世纪状态的关键,成为飘扬在新文化运动的队伍前列的两面大旗。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要求科学是完全必要的,他们所理解的科学有着丰富的内涵,不仅包括自然科学乃至“社会政治学说”,实际上同理性的概念相等同。而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总是积极推行愚民政策,千方百计地使广大群众陷于迷信和愚昧的精神状况;成为供他们驱使的“顺民”,以维护其朽败的旧制度,因此,科学同迷信和愚昧的斗争就赋有严重的社会意义,决不能把科学这个战斗口号,单纯地归结为知识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独秀才将科学视为判断事物的最高准则:凡是有悖于科学的,无论是“祖宗之所遗

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他认为科学的主要任务在于消除迷信和愚昧。鲁迅也在许多杂文中提倡科学,揭穿和批驳形形色色的鬼话,他认为科学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因,因为“科学能教人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早就说过,科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今社会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上述的论断。我国社会主义要发展,要实现现代化,也必须首先依靠科学,因为,我们讲的发展,是以客观规律为基础的,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发展,也即是说,是要以科学为基础的,是尊重科学的发展。而且,这里讲的发展,是以最先进的生产力为主导力量的发展、是以高新技术为主要推动力量的发展,因此都离不开科学的昌明和发展。江泽民同志曾经深刻指出:“我们要立下一个雄心壮志,就是必须尽快地使我国摆脱高技术落后的局面,努力研究开发出自己具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努力创造并掌握好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努力建设强大的民族高科技产业,这是关系我们经济繁荣、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的战略之举。”只有坚持自主创新,提高我国的科技前沿水平,集中力量、重点攻关,抢占高科技制高点,建立起强大的民族高技术产业,并使它向传统产业辐射渗透,促进产业升级,尽快完成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转移,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促进我国经济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发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来临的要求,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才能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建立起巩固的经济基础。在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时,一方面

要把经济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又要把科研面向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主战场,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社会需求为目的的科技、生产、贸易相结合的,适应市场竞争机制的科技产业结构,加速科技成果的产品化、商品化。五四运动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认为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至今仍具有启发意义。党中央制订“科教兴国”发展战略,就是要把教育作为发展科学文化基础的战略,关键在于要树立全民重科技、重知识、重人才、尊师重教思想的同时,增加教育投入和改革教育体制,使科学理性得以光照神州大地。

四、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动力之一,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此视角来考察,五四运动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真正开端。因为正是五四运动促使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发生了一系列质的变化,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准备了条件。1. 促使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从学理评介转换为寻找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科学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可追寻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899年)、梁启超(1902年)和朱执信(1906年)等的著述。但这些著述的内容均属学理的评介,而且除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某些方面有所肯定外,大都持否定、曲解或批评的态度。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斗争紧密联系,着眼于寻找指导革命实践科学理论。李大钊1918年先后发表的《法俄革命的比较观》、《庶民的胜

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通过评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科学性。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他组织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有关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几段重要译文,更为即将爆发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2. 促进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角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转换为无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国早期真正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陈望道等,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多成为共产党人。3. 促使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资料从二手的书文转换为马克思、列宁的原著。20世纪初二手书文的介绍是零碎的、片面的,甚至歪曲的,有如上述。五四运动时期在中国传播的则有《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和资本》、《国家与革命》、《伟大的创举》等。4. 促使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中介从西方的日本转移到东方的俄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向全世界验证、宣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通过俄国人找到了救国救民的革命理论。从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逐步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变化。

五、五四运动与新文化革命。有学者指出:五四运动作为一场伴随反帝反封建的社会民众的新文化运动,其政治目标是反帝反封建,确立民主政治;文化目标是批判传统文化,建立新文化。因此,民主与科学是这场运动的两面鲜明旗帜。民主是对专制而言,是一种基于现代精神的政治制度、价值原则和权利意识,它追求的是人在政治上的解放,是要使中华民众在备受政治上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科学是对蒙昧而言,是一种基于现代精神的价值理性,它追求的是人在

思想上的解放,是要使中华民众在封建文化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一句话,就是人的解放。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要发扬五四精神,坚持建设符合当今人类文明发展潮流的价值理性,大力建设、尽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价值准则,依照宪法治理国家,按照现代法治精神管理国家,增强广大人民特别是干部的民主法制观念,增强权利意识,牢固树立新时代的公民意识,弘扬民族精神,建设新的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又有学者指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包括前期和后期两个不同的内容,前期以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为主要内容,而后期则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有三个基本内容: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礼教;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把专制与迷信视为冲击旧社会的焦点症结,因之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战旗,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儒学,把封建礼教视之为“吃人”,把反对封建制度和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礼教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场彻底的反封建的批判运动。而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则是“文学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场斗争的结果导致了封建主义旧文学的崩溃,促成了具有时代精神和风貌的新文学的诞生,因而,有力地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发展。

有学者对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

统。范仲淹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则徐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就是其体现。近代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他们总是中国人当中最先觉悟的成分,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一次又一次挺身而出,承担起救国先锋的重任。五四运动,从运动的准备,到运动的发动和发展,知识分子,特别是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运动中知识分子意气风发,无所畏惧,勇于探索,敢于斗争,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表现出一种不妥协的精神。他们真正唤起了民众,这场运动开始时是一场知识分子的运动,但很快就发展成为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各个阶级、阶层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这场运动可说是知识分子对历史的伟大贡献。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广大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是社会的主要支柱,而且作为现代工人阶级最重要组成部分的知识分子,是现代生产力的开拓者,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开拓者,是精神文化、精神产品的创造者,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是先进思想、现代文明的传播者,也是为社会培养“四有”新人的教育者,因此,知识分子必须站在时代的潮头,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全心全意为工农大众、为人民服务,与工农相结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邓小平理论的主要特色

——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 刘 嵘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广东 广州 510275)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5-0011-04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基石和精髓。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特色。那么,什么是当代中国的“实际”呢?陈云说:“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①

一、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根据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根据”

历史经验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所以是科学,能够指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成功,就是因为毛泽东强调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定为中国人民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根据”,走自己的路。毛泽东说:“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②理论的预见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十年探索”时期的挫折,“十年浩劫”的错误,正是违背了“实事求是”,对实际作了错误的判断;或者超越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或者以“阶级斗争为纲”搞阶级斗争扩大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对此作了深刻的拨乱反正。从

1981年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一直到1987年,作了全面的阐述,明确而完整地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③

2、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时代根据”

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提出“要从国内外实际出发”。不仅要从基本“国情”出发,而且要从“时代特点”出发。把“国情”的“基本根据”和“时代特点”的“时代根据”结合起来考察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全部问题的根据”。

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又经过长期的军事斗争较量,国际局势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持并存的局面;并经过秘密渠道,美国总统尼克松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于1972年2月访华,签订了《上海公报》。中美《上海公报》的签订标志国际“时代特征”由革命与战争向和平与发展转移。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全球

的战略眼光,从理论上揭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邓小平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④和平与发展这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时代根据”。

江泽民在十四大、十五大的报告中,对邓小平理论作了新的概括,提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当代中国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时代特征——和平与发展,就是邓小平科学理论的“国内外实际”。而现代中国实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时代特征——战争与革命,就是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科学理论的“国内外实际”,即“全部问题的根据”。要懂得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科学性,就要懂得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赖以建立起来的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全部问题的根据”。

二、“基本根据”决定发展的根本任务

搞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根据”是为了从中引出规律,并根据规律,制定根本目标、根本任务,走自己的道路,作为行动的指南,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

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及其规律,主要应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基本根据”和和平发展为“时代根据”的基本矛盾运动作科学的分析,找出规律,按规律办事。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中国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它贯穿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决定了必须摒弃过时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而把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发展生产力为长期的根本任务上来。

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运动的基本规律,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因此,要适合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既要坚持、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又要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协调发展;既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又要采取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他人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之路。

政治和文化的建设和改革都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根据”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根据”为出发点,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三、“时代根据”决定发展的道路

邓小平面对开放的世界,坚持从国内外实际出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和平发展的“全部问题的根据”出发,及时抓住机遇,实现全面对外开放,从1979年开始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沿边和沿江城市,再逐步向中部、西部内地城市推进的新路子、新格局。这是一条充分吸收外资、科学技术、科学管理以及充分利用世界各国、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1、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者“异中有同”

在当代,“一球”有“两制”,“一国”有“两制”,在国内,也存在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经济成分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可说是“一公为主,多私为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越来越看得清楚:不同的事物都不是“纯之又纯”的,

而是有其共同性,表现为“一致性”或“共性”或“共同点”,即“异中有同”。在以革命与战争为主题的时代特征的条件下,也是“异中有同”,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但是,在对抗斗争中,容易看不到有“同”,因此,出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着干”,或认为“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或认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或者什么都要问一个姓“资”或姓“社”问题。这些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条件下形成的思维方式,否认对立中有统一,并一切都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区分“是非”的判断标准。现在时代特征变了,国内外的主要矛盾也都变了,但是过去形成的思维定势,一直到今天,仍有影响。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者“异中有同”,主要表现为:不同社会制度中,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等等都是相同的。邓小平在1980年就指出:“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⑤发展已是“一球”的共同任务了。

2、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者“相反相成”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者不但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赖,互相依存,互相渗透,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向着相反的方向和性质转化。

邓小平在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时,就分析说:“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⑥而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包括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需要资金,需要科学技术,需要

先进管理,等等。因而,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包括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北方和南方,在一定条件下,有互补、互利、互相合作和互相促进的作用。这样一来,在“一球”的“两制”的关系中,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就有互补、互利、互相合作、互相促进的作用。

怎样收回香港,邓小平在构想中提出:要从中、英和香港三方面实际出发,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实行“一国两制”,才能和平回归。这不仅符合香港人民的切身利益,可以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而且“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邓小平说:“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制”之间,是“相反”的,但却存在着“相成”的情况,存在着“互补”、“互利”、“互荣”的“互相促进”作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以及和平回归后的实践,证明了“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创造性和科学预见性。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过: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

在国内,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协调发展的局面。长期实践证明:对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繁荣市场,解决劳动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了重要作用,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了。

从“一球两制”、“一国两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互补、互利、互荣的互相促进作用;存在着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当着某些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接受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的

领导和监督、公有制度的制约,就使某些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所以,在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的条件下,中国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之路,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最终消灭资本主义。这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特色,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我们知道,马克思等曾提出经济落后的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20世纪初,列宁进一步指出:“殖民地 and 落后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⑦同时,列宁还指出:“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⑧毛泽东的贡献在于:在现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条件下,反对在中国走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而是超越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阶段,走无产阶级领导的又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提出的第一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但到了第二步,却在胜利面前,逐步陷入了主观主义的误区,导致发生严重的错误。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和事业,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走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利用一定资本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初步的成功。在“一球两制”、“三个世界”、“多极”力量的条件下,江泽民在1995年10月11日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回答美国《新闻周刊》和《北京新闻与世界报道》客人提问时说道:“中美两国合作则两利,对立则俱伤。所以,克林顿

总统当选不久,我就提出了同美国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⑨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通过频繁的外交,开始形成一套以全球友好为基础的外交战略: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建设性战略性伙伴关系;中俄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日是睦邻友好合作的关系;中国和东盟是长期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中国与欧盟是长期稳定互利合作关系;中法则是全面伙伴关系。这不仅摆脱了苏联解体以来的孤立的困境,而且为我国发展经济提供了极大的机遇,当然又是极大的挑战。

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反相克”

在战争与革命为时代特征条件下,“两制”充满了激烈的冲突和对抗,容易产生只讲斗争性,不讲统一性的片面性;而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下,则容易产生只讲统一性,不讲斗争性的片面性。因而,要有清醒的头脑,善于在对立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之中把握对立。我们肯定“一球”之中有“两制”的同一性,但没有取消对立,取消斗争性。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斗争性即寓于统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统一性”。对抗变成对话,仍然有“对立”,有矛盾。是经济建设“合作”的“伙伴”,又是“竞争”的“对手”;时而针锋相对,时而讨价还价;一边说“不打硝烟的战争”,一边却鼓吹“打没有硝烟的战争”,采取经济上的“制裁”或“封锁”,制造“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培植、支持“不同政见者”和“亲西方的下一代”等等,以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所以,邓小平在1992年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

邓小平改革理论的科学体系

□ 李全发

(中共肇庆市委党校副教授,广东 肇庆 526000)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5-0015-04

一、邓小平改革理论产生和形成的社会条件

1、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走向完善和发展的迫切需要。邓小平曾多次指出,社会主义是个好制度,我们必须坚持,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这种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发展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快,要比资本主义高,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现阶段,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具体体制,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走向完善和发展,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

2、党和人民经受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多次挫折和教训,迫切要求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邓小平说过改革是大家的主义,人民的要求。“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社会带来的严重灾难和沉痛教训,是邓小平改革思想产生的直接动因。由于“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社会带来的严重灾难,迫使我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体制的问题,要防止“文化大革命”的重演,就要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

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⑩

所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相反相成”,存在“互利”、“合作”的伙伴关系;但不能忘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互相排斥的斗争性,“相反相克”。看不到斗争的绝对性,不提高警惕,也会犯错误的,甚至亡党亡国。

出版社 1982 年,第 72 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1 页。

③④⑥⑩《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52 页,第 105 页,第 105—106 页,第 379 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51 页。

⑦⑧《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336 页,第 525 页。

⑨《光明日报》,1995 年 10 月 11 日。

责任编辑:罗 苹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

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思想路线,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使一大批久经锻炼的老同志重新恢复工作,又吸收一大批新生力量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为邓小平推行改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4、世界各国掀起改革热潮和当代世界出现和平与发展的历史主题,为邓小平在我国推行改革实践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而国内社会和政治稳定,各民族和睦相处,团结一致,人心向往社会主义,向往共产党领导,向往发展经济、振兴中华,为邓小平推行改革实践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基础。

二、邓小平改革理论的内容及其科学体系

邓小平改革理论的内容及其科学体系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及其现存旧体制所决定的。邓小平改革理论是对我国改革实践的总结。它回答了我国改革的性质、任务、对象、目的、领导力量及改革的策略原则等重大问题,它贯穿于我国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领域,体现在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等的改革实践中,形成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成为邓小平理论体系的一个独立子系统。

1、关于改革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十分强调,改革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为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服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是邓小平推行改革实践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点,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于邓小平改革实践的全过程和方方面面,又体现在邓小平改革理论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成为邓小平改革理论的思想基础,是邓小平改革理论的灵魂和精髓。

改革必须为我国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服务,这是邓小平推行改革的一个十分明确而贯彻始终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及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和办法决定的。我国每一项改革是否围绕着服务和服从于这个中心而展开和深化,就决定着这项改革的成功与失败。我国20年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正是遵照邓小平这个正确的指导思想,紧紧围绕着服务和服从这个中心而展开各项改革,使改革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强有力杠杆和直接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的方针、政策、办法是否正确,只有通过改革实践,看它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效果如何而定。改革必须为我国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服务是邓小平推行改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邓小平改革思想和理论的归宿,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块奠基石。邓小平改革理论的框架和大厦正是在这块奠基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2、关于改革的性质,邓小平强调,我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邓小平关于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从以下几个不同层面和意义体现出来的:

(1)从我国改革主体这个层面和意义来体现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

首先,从我国改革的出发点体现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邓小平在谈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我们整个工作的重点转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把建设四个现代化作为几十年的奋

斗目标。同时,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①

其次,从我国改革的目的和目标体现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邓小平说:“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②在谈到我国关于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三个决定时说:“中央相继作出三项改革决定。这些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裕,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③“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④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更为突出地指出:“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⑤

再次,从我国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体现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邓小平说:“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⑥“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⑦

(2)从我国改革客体这个层面和意义体现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

首先,从改革的对象和任务体现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⑧“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

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⑨

其次,从改革的内容和范围体现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邓小平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⑪“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⑫

(3)从我国改革主体和客体相统一这个层面和意义体现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邓小平说:“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⑬“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⑭邓小平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回答了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并把改革置于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这样的高度来确定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更体现着改革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是邓小平改革理论的核心内容。它由改革主体、客体、主客体统一的三个不同层面而又互相紧密联结的内容组成。体现着我国改革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解放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使社会主义优

越性不断得到充分的发挥。

3、关于改革实施的办法和步骤。邓小平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践第一,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改革措施和办法:

(1)改革从易到难,从浅入深,逐步推进。这主要体现在,改革先从农村开始,然后到城市;先从经济、然后到政治;先从流通、交换,然后到生产、分配;先从经济的部门、领域,然后到整个经济体制的转换等等。

(2)改革先行实验,取得成功,逐步推广。邓小平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农村见了成效,我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的改革。”^⑮“我们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刚刚起步,总方向、原则有了,具体章法还要在试验中一步步立起来。”^⑯

(3)改革必须坚持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原则。邓小平说,改革是有风险的,难免会犯错误,但不要怕,“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⑰

(4)改革必须坚持“两个稳定”的方针。邓小平说,我国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两个稳定,“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⑱“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

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⑲

(5)改革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6)改革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关于我国改革实施办法的理论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在我国改革实践中产生,并经我国20年改革实践的反复检验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成功的,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是构建邓小平改革理论的重要内容。

4、关于改革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邓小平说:“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⑳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要想取得这场革命成功,就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人民解放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

5、关于对改革的检验标准问题。邓小平强调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是否正确,要依实践的结果来判断。邓小平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4、110、122、266、241、134、142、370、135、237、81—82、307、142、135、130、142、118、217、284、357页。

责任编辑:罗 苹

试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 潘华实

(茂名教育学院讲师, 广东 茂名 525000)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5-0019-0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十多年来,邓小平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在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一、在国际矛盾方面,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

在十月革命期间,列宁曾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从1917年起,这一点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后来斯大林以列宁的论断作依据,在《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把当今的时代概括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毛泽东基本上坚持了同样的观点,认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由此可见,战争和革命已被认为是当时时代的两大主题。几十年来,由于教条主义的禁锢几乎没有人再去思考和推敲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关于时代政治划分的结论,这种思想定势贯穿将近半个世纪。

对于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邓小平

是高度重视的,特别是他第二次复出以后,更是审慎地思考这一问题,从哲学的高度去把握现代国际社会的演变趋向。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指出:“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保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1980年,邓小平又指出:“当今时代,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当然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的斗争搞得好的话,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1992年,邓小平再次明确指出:“世界和平和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我们要采取在较长的和平环境里搞建设,实现我们的目标。”邓小平精辟地分析了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形势,阐明了争得较长的和平环境进行国内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了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

界,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和平这个时代的趋势。由此可见,邓小平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运用唯物辩证法去认真分析世界各类矛盾,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取代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表现了邓小平作为一位革命家的胆识和魄力,显示了邓小平具有非凡的时代洞察力。

二、在社会基本矛盾方面,实现了侧重点由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向生产力的转换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互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泽东的这一独到见解无疑比斯大林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的理论更符合于现实状况。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发展与历史性贡献。邓小平不但继承了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观,而且有了新的见解。1979年,邓小平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又说“当然,指出这些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并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这远不能满足人民

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还指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可以看出,邓小平十分注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一面,并极为明确地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矛盾,从而克服了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中对两对矛盾未能区分主次,错误分析与判断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忽视生产力发展这一重大失误。在邓小平看来,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更根本、更直接的决定作用。现行僵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已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只有将之改革,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可见,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实质就是通过变更旧体制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它为我们抓住机遇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指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三、在社会基本理论问题上,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开创了我国历史的新纪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率领全国人民进行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从1956年到1966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严重失误,多年来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

“资本主义”加以反对,导致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改善不大,国家仍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1989年,国际局势剧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所有这一切,造成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产生犹疑和困惑。正像邓小平后来总结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明确地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邓小平还从全局着眼,阐明了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1990年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的讲话中又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一重大问题作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教导人们坚持一切从本国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总之,邓小平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这对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推进改革,指导改革沿着合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方向发展,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四、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

长期以来,由于受原苏联的影响,认为公有制是计划经济的前提,而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这样,便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这一种经济理论的定格将近30年。当然,计划经济在建国初期的特定条件下起过重要的作用。可是,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联系的日益复杂,这一体制某些方面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便逐渐显露出来。加上后来又把发挥市场作用,发展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加以反对,使得经济体制上过度集中统一的问题不仅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发展得越来越突出,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这种理论的偏差,曾经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邓小平重新工作后,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冷静的分析、深邃的思考。他观察事物不从书本里找现成答案,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实际出发。1979年,虽然当时经济理论上尚未转变观念,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时就明确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可见,在还处于讲计划经济为主的情况下,邓小平的论述是具有了超人的认知与胆略。1987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

《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研究丛书》 第二辑简介

□ 怀 思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广东 广州 510610)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5-0022-03

由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于幼军为主编, 广东省人大常委张难生为副主编的《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研究丛书》第二辑已于 1998 年 12 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特将该《丛书》的 11 部书的梗概作如下介绍:

一、《邓小平经济发展论》(汤照连主编, 郭小东副主编)

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 力求完整、准确地概括、分析邓小平经济发展论的客观条件, 形成的客观过程, 丰富的内涵及其历史作用。全书分 8 章由五个层次构成: 西方发展经济学和邓小平经济发展论; 经济发展

的国内条件; 经济发展的国际条件; 经济发展的战略与政策; 邓小平经济发展论在广东的运用与证实。该书在深入领会、掌握邓小平有关经济理论, 广泛收集学术界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发展经济的主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认真的探索, 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见解。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张井著)

该书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从理论和实践、历史与现实结合上, 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 纵述了社会主义 400 年发展中的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论争和实验, 我国改革

的。”此后, 邓小平还不断地利用各种场合反复地分析了计划和市场的运用与性质, 尤其是 1992 年初的南方谈话中, 他十分清楚与透彻地讲道: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 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所有这些论述, 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特征的思想束缚, 使我们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目标。

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十几年来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检验, 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观点才被全党所接受, 并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党的十四大将这一新概念写进了报告。这是邓小平对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新发展, 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突破性贡献。●

责任编辑: 冯 生

开放中有关改革导向和目标问题的思想交锋;分析了我国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就是从贫穷的“社会主义”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转变,并在这个转变中,正确地解决了生产与流通,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辩证关系,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体制对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一与区别。全书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三、《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与农村现代化》(马恩成、周森、陈文学著)

该书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概括和分析了广东农村 20 年来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历史和经验;具体地阐述了广东乡镇企业的诞生与发展,体制变革与创新;着重分析了顺德市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广东外向型企业的发展以及珠江三角洲、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等不同类型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特点及经验;论述了我国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乡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广东在这些方面的发展历程及主要特点;展望了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趋向并提出若干对策建议。该书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的特点。

四、《第一生产力论与科教兴粤》(李辛生著)

该书从当代科技革命和我国现代化出发,运用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结合,科学史和认识史结合的方法,深入探讨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形成、发展,分析了这一卓越理论的科学基础和思想渊源,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科技对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强大驱动功能和决定性的变革作用,回顾了知识经济的兴起及其演进过程,并考察了党的“科教兴国”战略的制订和在南粤实践的光辉成就。该书充分展示了“第一生产

力论”的强大生命力和实践力量。

五、《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究》(黄家驹、黄少荣、王金洪著)

该书比较系统分析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形成过程、基本内容和伟大意义,紧密结合我国实际,深入地阐述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指导思想、基本目标和实施步骤等重要问题;认真地探索了关于人治与法治、政府机构改革和人大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等重大问题;概括了建国以来我国政治体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见解。该书还对我国政治参与机制、权力协调机制、权力监督机制、政治体制运行机制等同西方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比较研究,开拓了人们的眼界。

六、《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理论与广东的实践》(丘海主编,骆锦辉副主编)

该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邓小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伟大意义;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广东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历程和经验;认真地探索了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规律。该书具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特色,对当前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七、《邓小平伦理思想研究》(李权时主编,李明华、李大华副主编)

该书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关于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及其伟大意义;从理论与现实结合上比较深入地分析了价值观、荣辱观、公平观、幸福观以及道德教育等多方面问题,提出了不少独特见解。该书的特点是把邓小平的伦理道德理论与邓小平光荣革命生涯和高尚品格结合起来考察,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学术性。

八、《邓小平教育理论与广东高等教育实践》(许学强主编,许怀升、黄循洛副

主编)

该书以广东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为中心,以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灵魂,系统地总结了广东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巨大成就和重要经验,着重分析了在改革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招生与毕业生就业制度等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和经验;认真地探索了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和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思路。该书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鲜明的广东特色。

九、《邓小平教育思想与广东教育改革》(梁琼芳主编)

该书以新的思路,新的视觉,探究了邓小平教育思想及其同广东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全书共 13 章,首先概述了邓小平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基本内容和主要特色,接着分析了在邓小平教育思想指导下广东教育改革的主要成就和经验,之后从教育的地位与作用、教育工作的基本方针、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分别介绍了相关的邓小平教育思想及其对广东教育的指导作用,并探索了广东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和对策。

十、《跨世纪的珠海发展之路》(梁广大、黄龙云主编,张耀中、杨水生副主编)

该书紧密联系珠海的实际,比较系统地论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经济特区理论的基本内容和伟大意义;全面剖析了珠海市和珠

海经济特区的发展过程、两个文明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对珠海未来发展前景、战略部署进行了探索和展望。该书的特点是把珠海特区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权衡和度量,以发展为主线,系统地总结了珠海特区各方面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提出了珠海“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思路和对策。

十一、《邓小平理论与广东文艺实践》(刘斯奋主编,李树政副主编)

该书通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文艺走过的道路,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总结了新时期广东文艺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所形成的发展思路、工作机制和成功经验;分析了新时期广东文艺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品格;探讨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文艺繁荣发展的规律和途径,为广东文艺实现世纪跨越、再创辉煌指明了方向。全书共分 5 章,分别阐述了邓小平文艺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邓小平理论与改革开放新时期文艺的转型;新时期广东文艺发展的状况、格局以及 90 年代广东文艺发展思路和工作机制;新时期广东文艺的实践成就;建设新时代文化,促进广东文艺的世纪跨越。全书的特点是把理论分析的深刻性和叙述的形象性结合起来。

责任编辑:冯 生

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与我国的出口贸易

□许经勇

(厦门大学经济系教授,福建 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F114;F75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5-0025-05

我国的出口贸易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其出口市场既包括亚洲、欧洲、北美洲,也包括拉丁美洲和非洲,因此,我国的出口贸易形势,在相当程度上是和这些地区的经济形势联系在一起。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近期我国的出口贸易形势呢?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对美国的出口贸易来看。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1997年的国内总产值为8.1万亿美元,经济总量约占全世界的1/4。1997年,我国对美国的出口占总出口的17.9%。美国的经济形势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关系很大。美国连续8年的高速度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大量外资的流入所引起的。1993年以来,欧盟国家开始迈出统一货币的步伐,至今除英镑外,欧洲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比值却是一路下跌,由于欧盟各国对启动欧元后其币值的走向难以把握,欧洲金融财富的持有者为了躲避统一货币的风险,就把大量的欧洲货币兑换成美元以及大量购买美元资产,由此引起了欧洲货币在1995年以后对美元的大幅度贬值以及巨大的货币环流从欧洲向美国流动。国外资金的大量涌入,压低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利率水平,刺

激了美国企业增加设备投资,也刺激美国消费者利用消费信贷购买住宅,由此引起工业和房地产投资迅速增加;利率水平下降使银行存款大量流向证券市场,使股票指数和债券价格不断攀升。1990年美国家庭持有的股票只有3.1万亿美元,1997年猛增到11.4万亿美元,其资产构成已超过不动产的比重。与此同时,外国人持有的美国国债也已超过1.5万亿美元。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大量外资流入所导致的经济泡沫。这个泡沫迟早是要破灭的,其时机则取决于欧元启动后前景何时会明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欧元启动后,许多国家的政府、国际金融投资者将出于各种目的,放弃他们所持有的部分美元而代之以欧元。其中一些保有巨额外汇储备的政府,出于政治因素或国家经济安全考虑,都会将一定份额的美元外汇换成欧元。而众多的国际金融投机者,绝不会放过欧元启动初期看涨的机会,不失时机地进入欧元市场而退出美元市场。1993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虽然颇为强劲,但与此不协调的是存在着一个突出的结构性问

题,即其投资远远大于储蓄,二者之间的缺口是依靠外资来弥补。一旦明显看出欧元的走向是趋于坚挺,美国 1995 年以来所形成的巨大货币环流就会发生逆转,从而导致美元的急剧贬值和美国经济的严重萧条。美国经济一旦出现危机,其所产生的影响甚至可能超过亚洲金融风暴,对此我们必须给予高度的关注。

随着亚洲、巴西金融危机的蔓延以及上述泡沫经济的存在,美国经济的不稳定因素迅速增加,持续 8 年的高速增长开始出现转折苗头。虽然美国近期连续三次降低利率,企图刺激企业投资和私人消费,以扩大内需,稳定经济,但 1999 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预计比 1998 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以上,仅为 2.6% 左右。根据近 20 年的经验,美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 1 个百分点,将导致美国进口增长率下降 2—3 个百分点。1998 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达到 2300 亿美元,1999 年将进一步扩大。随着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和对外贸易逆差的扩大,我国对美国的出口前景将更为严峻。而在贸易逆差剧增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依然在贸易政策上趋向加强保护主义,即在进口上设置更多的障碍,在出口上则采用 301 条款等高压手段迫使贸易伙伴开放市场。这就必然会导致双边贸易争端日趋尖锐化,影响着我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的增长。

其次,从对欧洲的出口前景来看。

欧盟各国国内总产值之和高于美国,随着欧元的启动,欧盟对世界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欧盟的经济与贸易规模比美国还大,但在国际储备和结算中欧洲货币的比重则大大低于美元,主要原因是统一前各国单独的经济和贸易规

模都与美国相差甚远,货币统一后,欧盟将有可能以整体的力量与美国经济相抗衡,从而将逐渐改变欧洲货币在国际储备与国际结算中的比重与其经济实力不相对称的状况,相应增加对欧元的需求。1999 年 1 月 1 日欧元的启动,是人类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次新的尝试,自然会面临着不确定性因素。这些不确定性因素,首先表现在,欧元区将货币政策集中到欧洲中央银行,必然会产生高度集中的货币政策与各成员国经济各不相同的具体情况的矛盾,从而大大削弱欧盟各国政府在干预本国经济方面的能动性及其灵活性,使各国政府在对本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回旋余地大大缩小;其次表现在,欧元的实施,使欧盟经济上高度一体化与政治上一体化程度很低的矛盾更加尖锐。即与经济一体化相比,政治一体化严重滞后了。固然欧洲的货币联盟可以先于政治联盟出现,但它必须最后推动政治联盟的建立。只有具备这样的条件,欧元区才算是进入它的稳定和成熟阶段。

欧盟现为我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商品进口商,对我国出口贸易形势关系重大。欧元区首批 11 个成员国本来就已经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欧元区的 GDP 占世界的 23.4%,约与美国相当;出口(不包括区内贸易)占世界贸易的 20.9%(美国仅 19.6%)。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将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对象。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政府也一直强调要开发欧洲市场。而 1999 年 1 月 1 日欧元的正式启用,对我国的经济与贸易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应当这样看,欧元的启用将会使各国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重新安排其资产组合,这将使已经绷得很紧的国际金融环

境更加紧张,从欧盟撤出的游资有可能会对实施美元联系汇率制度和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对我国香港的港币和我国的人民币造成新的冲击。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是以美元为主,欧元正式启动之后,我国的外汇储备将作一些调整,在这个调整过程中,会增加外汇管理的风险和难度,从而对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产生不利的因素。

欧元的正式启用,将使得欧元区区的经济一体化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很大的发展,区域内各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将发挥积极作用。目前欧盟成员国 60% 的外贸业务是在欧盟内部完成的,欧元启用之后这一比重还会进一步扩大,对区域外商品需求有可能进一步降低。欧元启用后,将使欧元区内原有汇率波动得以消除,欧元区内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降低。欧盟国家过去由于货币不统一,彼此间的贸易也需要对外汇套期保值,因此提高了结算成本。在欧盟各国间的各类支付亦都需要付出兑换费用。过去欧盟国家间的各类套期保值业务和贸易结算多以美元作中介,欧元启用后由于结算费用更低和手续简化,又无需套期保值,其交易成本将会大大降低(仅公司节省外汇开支及套头开支一项,即可节省开支 650 亿美元),这就会促使区域内交易的更大发展。

欧元启用后的欧洲经济一体化,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欧洲统一市场,对欧元区外部就会产生一种自然的排斥作用,对我国产品设限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也就是说,欧元的启用使欧洲内部贸易得到加强,对区外贸易构筑新的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有严重制约作用。我国向欧洲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欧元启动后,将受到来自欧元区内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劳动密集型国家的挑战。

货币一体化还有利于促使欧洲产品结构升级换代加快,使我国产品和技术进入欧洲市场的压力加大。为配合欧元的实施,我国出口企业需要支付一笔相当可观的设备更新和人员培训费用,使企业增加了成本。这将迫使我国出口欧洲商品实行统一价格,使我国不可能再从价格差异上获利。而伴随着价格透明度的提高,欧盟更容易找到削减配额、征收反倾销税的理由,给我国商品打入欧盟市场增加难度。

第三,从对日本的出口贸易来看。

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又是世界第一大债权国,其经济形势如何对全球的经济运行乃至我国的出口贸易都有相当的影响力。日本是我国的重要出口国,1997 年我国对日本的出口占总出口额的 17.4%。进入 90 年代后,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时期。1991 年泡沫经济破灭后,一直到现在,日本经济的年增长率也就是 1% 左右。除了 1996 年反弹了一下,但很快又降下来了。1997 年到 1998 年,基本上是负增长。1999 年,乐观一点讲,能够实现零增长就不错了,悲观一点讲,可能还是负增长。它的财政年度从 1997 年、1998 年和 1999 年,都是连续负增长。

从总体上说,目前日本经济仍然处于低迷状态。1998 年 12 月中旬,日本政府再次将这年度经济增长率调低至 -2.2%,这是继 1997 年度后连续第 2 个年度的负增长,并创战后最差的纪录。据中国海关统计,1998 年 1—11 月,中日贸易额比前年同期减少 5.1%,其中对日出口下降 7.9%,进口下降 2.0%。依此类推,1998 年中日贸易额将比 1997 年减少近 10%,约为 550 亿美元。由于日本经济状况 1999 年不会出现根本性改善,尽管日本的内需已出现止跌回稳

迹象,其前景也不容乐观。可以这样说,1999年日本进口降幅将会有所减缓,但仍然将维持负增长。1999年日本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形势是:亚洲和巴西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普遍放慢,以及日元可能升值,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均不利于日本出口。因此,1999年日本出口贸易还将继续下滑,约-2%左右。当前日本进出口贸易的形势是:内需不振直接使进口增长受阻;出口增长面临重重阻力,反过来又会减少对进口的需求。以上分析表明,1999年中国对日本的出口贸易,仍然会出现下滑的势头,但其下滑幅度可能会小于1998年。

第四,从对东南亚的出口贸易来看。

1997年,中国对东南亚的出口占总出口的6.6%。应当这样看,即东南亚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严重破坏,现已开始出现金融和经济趋于稳定的迹象,并显现出经济逐渐复苏的好兆头。这种态势从中长期看,将有助于改善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但就1999年而言,我国对该地区的外贸出口,其难度将比1998年更大。因为这些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对内对外支付的困难,不少企业破产倒闭,出口能力受到破坏,其货币的非正常贬值并未带来它们出口的迅速增加。其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如果说,在1998年还主要反映在这些国家进口需求的急剧萎缩上,那么,当这些国家经济开始复苏、出口能力得以恢复时,其货币贬值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就会呈现出来,并在国际市场上对我国出口形成更大的竞争压力。因为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出口商品结构接近,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主要出口市场也都集中在美、欧、日、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这场金融危机已导致东南亚及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和

地区的货币纷纷贬值,造成人民币相对升值,这就必然削弱了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加大了我国出口的难度。

在全球性金融动荡的情况下,我国对外承诺人民币汇率不贬值,有利于稳定我国的金融与经济,有利于为外资创造良好投资环境,有利于减少我国外债支付成本,有利于支持港币联系汇率,有利于亚洲经济的稳定,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但从经济的角度评价,主要竞争对手的货币纷纷大幅度贬值,必然会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很大的价格竞争压力。亚洲许多国家所以出现出口大幅度下滑,乃至爆发金融危机,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亚洲国家的货币大多是盯住美元,而1993年以来,美元对欧洲货币的大幅升值(是欧洲货币大量兑换美元及大量购买美元资产的结果),亚洲国家的货币也随之升值,这样,就改变了亚洲国家与欧洲国家国际竞争力量的对比,有利于扩大欧洲国家的国际市场份额,而打击了亚洲国家的出口。因此,1999年我国出口贸易将面临着20年来最困难的时期。

第五,从对拉丁美洲的出口贸易来看。

目前拉丁美洲的经济形势再度陷入困境。预计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0.6%。巴西是拉丁美洲第一大国,其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八位,其经济占拉丁美洲经济的45%,对拉丁美洲地区经济影响甚大。如果巴西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不仅会使该地区金融市场受到严重冲击,而且还会使整个地区经济的增长速度放慢。目前这些国家的股市和汇市都面临巨大压力。在对外贸易方面,由于亚洲地区、俄罗斯、巴西的金融危机,国际市场对初级产品(比如石油、食品、矿产品)的需求不旺,价格呈下

跌趋势,严重地影响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出口收入。加上亚洲许多国家货币大幅贬值后,其产品 在拉丁美洲及其他市场的竞争力迅速增强,而拉丁美洲国家的产品,无论在拉丁美洲地区还是其他地区,都遇到强有力的竞争,出口形势较为严峻。1998 年拉丁美洲地区经济增长率为 2.3%,比 1997 年回落 2.9%,受亚洲和巴西金融危机的影响,1999 年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还会继续回落,预计经济增长率为 0.6%,但除个别国家外,还不致于发生全地区经济性衰退。在对外贸易方面,拉丁美洲国家的出口将继续受困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低迷的影响,而其进口则由于各国采取的种种限制,将出现较大的滑坡。据此,我国对拉丁美洲的出口将更加困难。

第六,从对俄罗斯的出口贸易看。

未来的俄罗斯经济形势是令人担忧的。苏联解体以来,在经济形势日趋恶化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对外贸易曾经一度保持不断增长的势头,连年贸易顺差均超过 200 亿美元。但是 1998 年三次更换政府以及当年 8 月份以来的金融危

机,对俄罗斯经济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据初步预测,1998 年 GDP 将下降 5%—6%,对外贸易额也将比 1997 年下降 17% 以上。受金融危机的惯性作用,1999 年俄罗斯经济仍将呈下滑势头,其下降幅度可能达 6% 左右。其可能采取的对策,将是多出口、少进口,这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是不利的。但由于目前俄罗斯国内消费品市场商品严重短缺,为改善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政府又不得不临时减免部分生活必需品的进口关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利于我国消费品的出口,但其规模和弹性都是相当有限的,对此我们不应估计过高。●

参考文献:

①马洪主编:《中国的经济形势与展望》,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8 年 4 月版。

②《专家判断今年经济发展形势》,《瞭望新闻周刊》1999 年第 1 期。

③王建:《欧元统一与亚洲金融风暴及我国中期阶段的国际经济政策选择》,《北方经济》1998 年第 10 期。

责任编辑:谭湛明

论服务贸易发展对中国外贸环境的影响

□ 谢 康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国际商务系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中图分类号)F719;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5-0030-04

1960—1970 年世界服务贸易额翻了一番, 1970—1975 年又翻一番。70 年代至 80 年代前半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服务出口扩大了 4.5 倍(按当年价格计算)。总体上, 服务贸易在 70 年代出口增长较快, 80 年代逐渐减慢。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 1976 年世界服务贸易从 1970 年 1100 亿美元(占当年国际贸易的 29%)迅速增长到 2818 亿美元(占国际贸易的 23.7% 和货物贸易的 31.2%), 1981 年猛增为 7714 亿美元, 同期增长近 8 倍。1986 年服务贸易额 8511 亿美元, 占国际贸易的 30.6% 和货物贸易的 44.15%。其间, 国际商业服务贸易得到较大发展。下表是依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统计资料整理的 1980—1996 年世界商业服务贸易发展概况。

1980—1996 年世界商业服务贸易的发展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出口	4020	4130	4050	3910	4030	3809	4496	5323	6048
进口	3990	4120	4000	3840	3970	4016	4527	5390	6229
总计	8010	8250	8050	7750	8000	7825	9023	10713	12277
年份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出口	6638	8022	8455	9534	9595	10550	11979	12577	
进口	6850	8331	8583	9642	9726	10597	12154	12674	
总计	13488	16353	17038	19176	19321	21147	24133	25251	

注释: 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各年统计公布的统计数据也不断修正, 本表主要依据世

界贸易组织 1997 年年度报告制成。

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 不可避免地对在正在经济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外贸环境产生影响。影响可从正面和负面来看。

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

1. 70 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是发达国家服务经济发展的结果之一。发达国家在绝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领域逐渐丧失比较优势, 转而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特别是技术和信息密集型服务贸易。这种环境无疑有助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及服务的出口。

二战以来, 随着交通运输、电讯和旅游业的发展, 发达国家服务业整体上得到巨大的发展。70 年代后, 不仅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产业空心化和服务化趋势, 而且服务业在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也出现持续增长趋势, 这些趋势的直接结果是 70 年代不少国家服务业生产的年均生产率获得提高。据美国劳工部统计, 1961 年、1971 年和 1981 年, 美国从事服务活动的人数分别占非农业人口的 63%、68% 和 72%。在其他国家也出现同样趋势。据世界银行统计, 12 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服务部门的就业人数, 已超过全部劳动人口的 50%, 而在另外 21 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 至少有 1/3 的劳动力在服务部门就业。这说明各国就业

结构的重心已经由制造业部门转移至服务部门,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均日益显著。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对服务的多种需求,而多种服务需求的国际化,必然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随着发达国家先后进入服务社会,在服务贸易上表现出强劲的竞争优势而进行资源再配置,它们逐渐放弃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集中进行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贸易。这种大环境无疑有助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2. 服务贸易发展,特别是电讯业和运输业服务技术的进步,电讯成本和运输成本不断下降而带来的跨国分散化经营优势,带动发达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这对于中国吸引外资,学习外国管理经验和国际商务经营规范,增强外贸出口活力有积极帮助。

生产国际化导致世界货物贸易额大幅度增加,而这又成为服务贸易发展的源泉。由于众多的服务是货物的互补品或投入品,货物贸易的增加,必然给服务贸易扩张带来贸易机会。生产国际化在区域贸易自由化浪潮中得到发展,这种发展往往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服务贸易条款,既扩大了区域内服务贸易发展的可能性,也为服务生产的国际化和文化生活的国际化带来契机。无疑,服务生产的国际化极大地刺激各国文化生活的国际化。

3. 90年代以来,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一直徘徊在20.1%—21.5%之间,且年增长率分别在1994年、1995年和1997年低于货物贸易,说明服务贸易发展进入新一轮结构调整时期。货物贸易正处在新一轮发展阶段,这种贸易环境将有助于近期内中国外贸出口的稳定持续增长。

70年代后的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据统计,1986年国际服务贸易相当于当年世界贸易的34.3%,扣除转移项,广义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的31.2%。无论

是70年代,还是80年代,服务贸易平均增长率均高于货物贸易。1982—1992年,世界服务贸易增长1.5倍,同期货物贸易仅增长1倍。另据统计,1980—1993年,商业服务贸易年均增长率为7.7%,货物贸易年均增长率为4.9%(以名义值计算)。其他私人服务与收入项是商业服务中最活跃的服务领域,其年平均增长率达9.5%。随着商业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商业服务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从1980年的17%增加到1993年约22%。

然而,90年代后,随着货物贸易的迅猛发展,服务贸易增长逐渐落后于货物贸易增长。1993年,世界服务贸易增长3%,而货物贸易却比上年减少2%。然而,1994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仅增长7.7%,而货物贸易出口则增长12.6%,1995年呈现同样趋势。预计在90年代后半期,服务贸易增长将难以超过货物贸易。1995年和1996年,世界货物出口与服务出口比例分别为3.95:1和3.97:1。在这种大环境下,1997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3250.6亿美元,比1996年增长12.1%,成为世界第10大贸易国。在此之前,中国连续5年列全球贸易第11位。

4. 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外贸从数量型、以低级制成品为主的贸易结构,转变为质量型、以中高级制成品为主的贸易结构,有助于中国经济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随着世界产业结构逐渐由粗放型生产结构转变为集约型生产结构,世界范围内对知识和信息密集型生产或销售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例如,由于对技术贸易中“交钥匙”生产设备和其他工程需求的扩大,安装、投产管理和培训等生产者服务在货物商品供应中的比重迅速提高,甚至达到占业务价值的50%。现代技术的高、精、尖,使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特别是在高技术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在国际贸易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势下,与这些货物贸易相联系的服务贸易获得

了迅速发展。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通信技术的发展,不仅为服务贸易创造了必要的发展条件,也创造了新的服务贸易形式——信息服务贸易,而且后者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之一。国际服务贸易的这种变化趋势,对中国外贸进出口结构的改善,及贸易品质量的提升起到刺激和促进作用,EDI 贸易方式就是一个例证。

然而,服务贸易如一把双刃剑,它在改善中国对外贸易环境的同时,也给中国外贸环境的发展带来某些负面影响。

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

1. 发达国家将以服务贸易的强大比较优势为基础,以货物换服务的原则,要求中国开放本国服务市场,以此作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或增加对中国货物出口配额的条件或要价,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外贸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服务贸易既可能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填补货物贸易逆差的重要手段,也可能是某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1976年以来,美国服务贸易年年顺差。90年代后,服务贸易出口对于填补美国在货物贸易上的巨额逆差发挥着重要作用。1996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达734亿美元,抵消货物贸易逆差的37.98%,对美国实现贸易平衡目标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反,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德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则是逆差。特别是日本,在服务贸易上的贸易逆差与其在货物贸易上的巨大顺差形成鲜明对比,日本近年来进口美国服务占美国服务出口总额的15%左右。1993年,美国对日本服务贸易顺差120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594亿美元。这样,美国对日本服务贸易顺差抵销了货物贸易逆差的20%。显然,与美国对日本服务贸易出口的业绩相比,美国在对华贸易政策问题上,估计会更多地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对中国施加开放服务市场的压力。

2. 尽管在规模上服务贸易比货物贸易小,但其技术、资本和信息含量普遍高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发展对中国货物贸易的实际贸易利得和贸易绩效将有不利影响。

服务贸易出口中长期居第一位的是其他私人服务与收入项目(包括通讯、广告、非商业保险、代理金、管理、租赁、期刊预定费、加工与修理、批发、专业和技术服务),1987年该项目贸易额达2010亿美元;第二位是旅游,贸易额1500亿美元,分别占当年服务贸易总额的40%和30%。1990年美国商业服务进出口额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8%,其中,旅游服务和客运服务收入约占总额的1/3;美国商业服务出口占美国商品出口的1/4强。1991—1993年,美国旅游服务分别顺差168亿美元、162亿美元和超过200亿美元。1993年美国旅游服务出口占当年服务出口的1/3。在这种局势下,美国等服务出口国势必会利用其服务增值优势,尽可能地缩小中国货物出口的实际贸易利得,甚至使中国出口上亿双鞋的贸易值可能抵不上美国出口一项大型高技术服务项目的管理咨询费用或软件销售值。

3. 由于发达国家和少部分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是相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的,因而发展中国家为使货物贸易出口抵消服务贸易比较劣势,必然会共同地采取极力扩大货物出口的经营战略,这将使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面临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竞争者和国际竞争压力。

1979—1989年,服务贸易最大的10个出口国(或地区)没有发生改变,仅是各国之间的位置发生某些调整。同期,除瑞典替代沙特阿拉伯外,服务贸易最大的10个进口国(或地区)也基本上没有改变。90年代后,除1994年香港取代奥地利成为第十大服务贸易出口地区,并在1995年成为第九大出口地区外,服务贸易十强局面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进口方面,美国逐渐由第二大进口国取代日本和德国成为第一大进口国,从而使其既是服务贸易最

大的出口国,也是最大的进口国。此外,除1992年后西班牙、台湾和韩国先后取代瑞典成为第十大服务进口国(地区)外,十大服务贸易进口国(地区)的结构也没有发生大变化。有趣的是,服务贸易前七位最大的出口国,也是前七位最大的进口国。在这7个国家中,除美国和日本外,都是欧洲发达国家。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上的比较优势明显。

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统计和估计,中国商业服务出口从1990年的全球第27名上升到1996年第16名,进口则从第33名跃升至第12名。1996年中国商业服务贸易逆差约62亿美元。尽管如此,中国服务出口的竞争优势依然远不如其货物贸易,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中是一种普遍现象。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和韩国货币大幅度贬值,既对中国服务(特别是旅游服务)出口构成压力,也对中国货物贸易出口构成竞争压力。

4. 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特别是金融服务和电讯服务贸易自由化趋势,将使中国发展本国金融、电讯服务业等关键服务部门的努力面临不利的竞争局面和贸易环境。

1995年7月,世界贸易组织在日内瓦达成全球金融服务临时协议,大约120个国家在该协议上签了字,使其大约囊括全球90%的金融市场,20万亿美元的银行资产、20万亿美元的银行存款、2万亿美元的保险费、10万亿美元的股票市场资本和市场价值为10万亿美元的上市债券。该临时协议有效期为1997年底。1996年12月,在世界贸易组织新加坡部长会议期间,28个国家或地区(大约占世界信息技术市场份额的90%)签署信息技术协定,协定涉及计算机、电讯产品、半导体、半导体制造设备、软件和科学仪器等范围的产品,信息技术产品年出口额达到5000亿美元。日本、美国、欧盟(包括15个成员国)、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是信息技术产品的主要进出口国和地区。预计,世界金融和电讯服务自由化步伐在本世纪末将会逐步加快,这种服务自

由化环境必将对中国金融和电讯服务业发展构成挑战。

针对服务贸易对中国外贸环境的上述正面与负面影响,我们认为,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采取以下对策扬长避短:(1)在巩固原有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市场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借助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实现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2)适当地、有选择地、按一定序列步骤开放本国服务市场,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或者说,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给予外国投资者税收等优惠条件来吸引外国资本,也可以通过开放本国服务市场来吸引外国资本,改善投资环境,因为服务贸易通常与直接投资紧密相联;(3)参考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发展本国服务贸易经验,大力扶持那些符合本国资源禀赋条件的服务业部门(无论其规模大小)开展跨国经营,或者通过合资、合作等方式,进入国际服务市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市场;(4)或者与发达国家以服务换货物的战略相抗衡,采取以服务换货物战略,即有条件地开放本国部分服务市场,换取发达国家放松对我国货物贸易或高技术出口的限制。或者采取服务与货物分离战略,仅就服务市场问题单独谈判,而在货物贸易领域大力促进进出口,采取何种战略需要依据环境和条件来判断。●

参考文献:

①Burgess, David F. 1990, Services as intermediate goods: The issue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dited by Ronald W. Jones and Anne O. Krueger. Basil Blackwell Ltd. . 122 - 139.

②Burgess, David F. 1995, Is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the service sector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Oxford Economic Papers*, 47: 60 - 78.

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人民日报》1997年3月22日第4版。

责任编辑:谭湛明

对深化商品流通体制改革 几个问题的构思

□张 井

(广东省财贸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 510400)

(中图分类号)F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5-0034-04

一、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商品流通体制框架

改革开放初期,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三多一少”(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减少流转环节)进行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对冲破计划经济统购统配的产品流通体制起了重大作用,使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先行,推动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但“三多一少”的改革要求,全国在80年代后期,广东在80年代中期,已经基本完成。此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基本上按经济体制改革的一般部署进行,很少针对它的特殊性。在特殊性方面,仅进行了零售业态和经营形式的改革。这样的改革只是修整枝叶,没有动到主干和深入根基。所以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由先行转变为滞后于整体经济体制改革,不能适应改革和发展的要求。

从党的十四大起,改革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商品流通体制是这个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扭转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滞后状况,着重研究商品流通体制的特殊问题,探索并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品流通体制框架。我设想这个框架

应包括以下几个基本方面:

——对商品流通职能和地位认识的理论体系。

——商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商品供求宏观调控体系。

——商品市场体系。这里是指不包括生产要素市场在内的狭义市场体系。

——流通企业所有制结构体系。

——商品流通的法规体制。

——商品流通的组织网络体系。

——商品流通的所有制结构体系。

——国内与国际商品市场的衔接与沟通体系。

——电子商务网络的建立与商业革命。

——商业业态和营销方式的创新发展。

——商业文化和商业道德。

这些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商品流通体制需要研究和实践的重大问题。它是一个巨大的跨世纪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克服把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囿于零售业态和经营方式改进的狭隘观念。

二、什么是“大市场、大贸易、大流通”

“建设大市场,发展大贸易,搞活大

流通”，是 90 年代初，有关商业管理部门提出并广为传播的一个口号。但提出时其涵义和界限就不明确，在传播中自然各人按自己的理解和需要进行解释和贯彻。一般只理解为一个“大”字和演绎出一个“多”字。要求商店和市场建设得越大越多越好，以为这样就可以带动整个市场兴旺和经济繁荣，并认为这是市场经济应有之义。实践结果是，初期商店和市场小而少时，这样做确实起了好作用。但随着商店和市场越来越多、越大，就转化为盲目重复建设和流通能力结构性过剩。

有一个经验叫做“建一个市场，活一方经济”。在市场较少，流通阻滞时，是一个普遍经验。可是到了近年，这个经验失去了普遍适用性。只有在市场不足的主产区、主销区和集散地仍然有效；而在其他多数地方，却是多建一个市场，浪费一块土地，沉淀一笔资金。

有一条“流通规模规律”，它的涵义是社会投入流通领域的生产要素，要与生产和需求相适应。如果过少，会使买卖困难，生产受阻，消费不便；倘若过多，则会使流通设施闲置，效益下降，两者都会造成社会浪费。流通规模的大小应由市场决定。如果增加对流通投入，生产效益和流通效益都提高，说明流通规模偏小，应当继续追加对流通的投入；相反，增加对流通的投入，流通效益反而下降，说明流通规模偏大或结构不合理。当前的情况是城市的流通规模过大，农村的流通规模过小。农村的流通规模应按布局合理原则适当扩大；而城市的流通规模不宜总量扩张，只宜合理调整，优化结构。

企业（流通企业和生产企业）的单体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单体企业规模扩大有三种情况：随着规模扩大，利润率递

增，叫“规模经济”，应当继续扩大规模；随着规模扩大，利润率反而递减，叫“规模不经济”，应当设法缩小规模；随着规模扩大，利润率保持基本不变，而利润总额增加了，这是“最佳规模”，应当保持这样的规模。当前全国大城市闹“大百货商场病”，大百货商场建得越多越大，人均卖钱额和资金利润率也大都下降。这种情况说明了大百货商场这种零售业态搞得太多和单体企业规模过大了。但不能证明大百货商场业态已经进入生命周期的衰落阶段。

我认为“建设大市场，发展大贸易，搞活大流通”的提法比较模糊，缺乏严密性和清晰性，难以把“市场”、“贸易”、“流通”三个外延交叉的概念明晰分开，只能作为一个概念来理解。这个提法中的“大”，只是与“小”相对而言，且不是单纯数量指标，而是与质结合的概念。因此不是越大越多越好，而是相适应才好。可以把“大市场”、“大贸易”、“大流通”概括为“大市场”。“大市场”是相对于“小市场”来说的，它有五方面的涵义：第一，从商品种类分，“小市场”只限于实物商品（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大市场”则扩展到包括各种生产要素和无形商品（服务和无形资产）在内的广义市场体系。第二，从流通空间分，“小市场”只限于国内市场和地方市场；“大市场”则扩展到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又包括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第三，从流通时间分，“小市场”只限于现货市场和现实市场；“大市场”则包括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亦包括现实市场和开发潜在市场。第四，从经营主体成分分，“小市场”是国合商业垄断、封闭的市场；“大市场”则是以国合商业为主渠道，多种所有制商业和多种业态、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的市场。第五，从交易形态分，“小市场”只限

于有形市场;而“大市场”则扩展到无形市场,即电子商务网络交易,实现商业革命。总之,“大市场”使商品流通业的地位和作用,由社会生产的末端产业升位为先导产业,由弱质产业转化为支柱产业。

三、主渠道的新涵义

“流通渠道”的科学概念,本来是指商品从生产领域到达消费领域经过的通道和环节。但我国的党政文件说的“流通渠道”却是指流通企业的所有制,“主渠道”是指国合商业。我在这里也按这个约定俗成的定义进行论述。

“国合商业主渠道作用”,是1982年作为国合商业比重占多数,并对市场起支配作用的涵义提出来的。它与当时所实行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相适应。所谓“国合商业主渠道”,实质是计划商品为主,并由国营和供销社经营;非计划商品只占小部分,由多种成分商业经营。后来随着“三多一少”流通体制逐步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国合商业主渠道作用”的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它是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和公有制主体地位在商品流通领域的体现。

有人认为现在实行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合商业主渠道作用”不必要了,这是一种误解。其实,越是实行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越发展,贸易就越自由,竞争就越激烈,国家就越要依靠国合商业发挥主渠道作用和主导作用,调控市场和规范市场秩序。

在新时期国合商业渠道作用的新内涵,应是重建一个由国合商业或国合商业控股的、以综合商社为骨干的、能够对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的商品流通组织网

络。

在现代经济中,商品流通过程一般包括批发和零售两个环节。它们的职能和作用不同,批发是流通的起点和中间环节,是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流通。马克思称之为“第一次循环”,是资本的直接流通领域。而零售则是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的流通。马克思称之为“第二次循环”,“不属于资本的直接流通领域”。两者比较,批发比零售更重要。马克思又说:商业是生产者与消费者进行商品交换的“中项”(中介),而批发则是“中项”的“中项”,即“较高的中项”,“这个中项对于两极(生产和消费——引者注)本身来说总是表现为较高次方的东西。”^①我理解所谓“较高次方的东西”是指乘数效应的乘数效应。商业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和先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批发环节。所以国合商业的主渠道作用和国有商业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批发领域。

因此,应当通过国有资产重组和企业改革,把零售领域国有资本大部分转移到批发领域,使国有资本在批发领域占大多数,并通过控股方法,扩大其效应,控制重要商品的批发环节。非国合经济要经营一般商品的批发业务,也要实行审批准入制度。这样,国合商业才能发挥主渠道作用。

国合商业在零售领域,主要通过办好少数大型企业,起示范作用,和控制好特殊重要商品和专商商品的经营。其他企业改革,可不受所有制的限制,放手让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各种经济成分的比重,应由市场形成。所以国合商业资本不必占多数。

工农业经济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主要依靠国有和公有经济在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

以及占据重要行业的制高点。而商品流通业除了依靠这些因素外,还要依靠流通组织网络的巨大功能。我国实行“三多一少”改革,破除了计划经济用行政权力组建起来的全国流通组织网络,这是必要的。但失策的是没有随之建立以资本为联系纽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国统一的流通组织网络,使国合流通企业多数变成散兵游勇、“企自为战”状态。现在应当亡羊补牢,重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品流通组织网络。这个组织网络的目标模式,我设想是按粗行业、内外贸结合组成十数个以致数十个全国性综合商社,其成员企业跨地区分布全国,并实行批发带零售,销售方面的基层企业是连锁公司和连锁店(这种“批零”关系最紧密稳固)。这样在市场竞争和主导市场方面,能发挥群体优势,实现主渠道作用。

综合商社是企业集团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以流通公司为母公司,并以流通为主业的企业集团。综合商社可以在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和国有资产重组中逐步建立。由国有独资、有投资中心功

能的商贸物资全国总公司为母公司,向在各省、市的行业公司投资控股,组成各子公司;再由子公司参股组成各孙公司,最外层多数为连锁店,这是纵向系列。横向系列则同样以资本为纽带,向产业企业、金融企业、科技企业和其他行业企业控股、参股,组成各层次、跨行业多元经营的企业群体。供销社亦可以参照这种方法组建组织网络,坚持“为农”服务宗旨。农村基层供销社及其专业社,应当主动积极参与农业产业化,并充当龙头企业。把千家万户的生产,通过流通组织网络,与千变万化的市场联系起来。

这样的商品流通组织网络,其形式、性质和功能都不同于计划经济的产品流通组织网络。这样组建起来的综合商社,也不同于有些地方名为“商业集团”的“翻牌公司”。它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化生产以及大市场的要求。●

①此处的引文,散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

责任编辑:谭湛明

政府采购近期研究综述

□ 吴金群 邓 飞

(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中图分类号)F2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5-0038-03

政府采购制度自 1782 年在英国创立以来, 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但在我国, 它仍属于新生事物。自 1995 年深圳市率先拉开“政府采购”的序幕后, 特别是 1998 年以来, 这一制度开始在我国很多省市试行。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 都积极地参与了对政府采购问题的研究, 现将近期的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一、“政府采购”的特征

政府采购, 也称公共采购, 是指各级政府及所属实体为了开展日常政务活动和为公众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需要, 在财政的监督下, 以法定的方式、方法和程序(按国际规范一般应以竞争性招标采购为主要方式), 从国内、国际市场上为政府部门或所属公共部门购买所需商品和劳务的行为。政府采购制度是指政府采购政策、采购程序、采购过程、采购管理等的总称。

与私人采购相比, 政府采购具有以下明显的特征:(1)政府采购所支出的资金是公共资金, 而不是公司业主或公司法人的资金, 因此只能按法律的规定进行开支。为此, 要实施严格的预算限制和公共审计程序。(2)政府采购和分配

的物品是为了几个请购机关之用, 通常不是用于制造或转售之目的。(3)从事和管理政府采购职能的人员没有公司雇员需要赢利的动机。(4)政府采购过程是或者应该是完全公开下进行的。(5)政府采购程序事先经过严格的规定, 同私营领域不同, 它没有多少灵活性, 因此创新发生得相当缓慢。(6)公共官员、管理者受到公众和新闻媒介的监督, 渎职、失误都要曝光。在私营领域, 只有重大失误或欺诈才被曝光, 其它则内部处理。(7)政府可以、而且确实具有至上的能力, 政府采购承担着执行国家政策的使命。(8)政府采购对象十分广泛, 采购数量巨大。政府始终是各国国内市场最大的用户。

有些同志论述到政府采购与控购(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区别: 控购主要是通过直接的行政性的财政计划抑制社会集团对某些商品的需求, 实现社会商品的供求平衡; 政府采购制度是通过法律手段和竞争机制, 规范公共采购部门的采购行为, 以实现政府预期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控购针对的是某些具体的商品(品目是有选择的), 而政府采购针对的是政府对所有商品、工程和服务

的购买,没有品目的限制。

与财政供给制的区别在于:在实物供给制的条件下,财政是选购商品的主体,商品的使用者只能被动地接受商品。而实行政府采购制度,财政只是参与、监督商品的采购过程,保证采购过程的公平交易和资金的有效使用;商品的使用者是采购商品主体,所购商品的技术和物理指标都要满足商品使用者的要求。

二、我国现行采购办法的弊端

由于我国在理论上缺乏契约国家的观念,政府是纳税人的公共资金托管人的地位并没有确立,纳税人也缺乏参与对公共资金的监督管理意识。我国的国民经济也长期在计划体制下运行,根本没有公共市场和私人市场之分,更无政府采购与私人采购之别。在具体实施方式上,我国自建国以来一直采取财政以货币形式向各预算单位供给经费,再由各预算单位分散采购所需物品,进行自我组织服务和供给的办法。这种办法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有其特别的适应性,然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很不适应,弊端颇多:

1、造成财政资源使用的非效率性。这种分散购买、自我服务、自给自足的办法,不仅与社会化生产不相适应,而且由于失去了规模效应,造成设备能力不能充分利用,加大了各行政、事业单位的业务成本,额外增加了财政资源的耗费,降低了财政资源使用效率,增加财政负担。

2、不能发挥规模购买优势,不利于运用市场竞争机制的好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供应商为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率,竞争十分激烈。政府采购完全可以充分运用这种竞争条件,降低购买成本,提高财政效益。而现行的采购办法,由于购买批量小、零星,不仅无法得到竞争的好处,而且难以从厂家直接进

货,极大地提高了采购成本。

3、给以公谋私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厂商为了销售,常常采取各种利诱手段,诸如给回扣、送礼品等等,诱使采购者购买质低价高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依然由各单位分散实施,一些素质差的工作人员就有可能在“糖弹”面前落马,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损失,腐蚀了干部,毒化了社会。

4、财政分钱后由各单位自行采购的办法,也增加了支出控制的难度。财政只能在分钱时实施真正的控制,而钱分出去以后,常常购买什么、购买多少都无法控制,不得已只好采取控制集团购买力的办法确定什么能买、什么要审批等等,还得专门设立一个机构,造成人力、财力的额外耗费。

三、改进现行的预算管理和运行机制

一是改进预算监督。实行政府采购制度以后,财政监督将由价值形态向实物形态延伸,改变目前财政监督形同虚设、财政支出管理弱化的现状。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财政部门不仅要制定政府采购政策,而且要参与采购管理,这将意味着财政部门的工作领域将得到拓宽,财政部门干部的知识结构也要作相应的调整,他们既要懂技术,还要了解市场。只有财政干部具备这些能力,才能真正做到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的监督。有同志进一步强调了必须加快财政干部的业务培训,努力提高综合业务素质。也有同志从实践的角度提出:配合政府机构改革,从机关分流人员中挑选一批人员作财政监督联络员,对试点单位、定点单位进行日常监督。

二是改革现行的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管理体系和具体操作方法。现行的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管理体系和具体

操作方法,是按国家机构的建制和经费领报关系确定的。每年预算一经批准,财政部门即按预算和各单位用款进度层层下拨经费,年度终了后,又层层上报经费使用情况,汇编决算。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后,财政部门不再简单按预算下拨经费,而是按批准的预算和采购合同的履约情况直接向供货商拨付货款(支出)。由于采取直接付款形式,支出的决算也不需再层层上报,财政总会计可以根据支出数直接办理决算了。考虑到实行政府采购制度的开始阶段和今后的相当时间内,各单位预算支出中,一部分如设备购置等将通过政府采购方式实现,另一部分如人员工资仍将由各部门(单位)办理,这样客观上预算经费的层层下拨和直接支付方式将长期并存。根据这一现状,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制度在不改变现行的核算方式的前提下,要明确允许直接支付方式并规范核算的具体方法。财政部门内的总预算会计帐户也要作相应的调整,即要设置一个专门明细帐或开设一个专门的帐户,用于核算各部门(单位)经核准用于政府采购的支出预算。

三是完善国家金库制度。按现行国家金库的有关规定,国家的一切预算支出,一律凭各级财政机关的拨款凭证,经国库统一办理拨付。目前,国库的拨款体系与预算会计管理体系是匹配的,即国库办理的财政拨款按会计管理体系在银行结算体系中层层拨至用款单位。实行政府采购制度以后,国家金库的有关办法中应明确允许财政办理直接拨款的方式并制定相应的具体操作方法。这种方式与正在探索改革的国库单一帐户的管理方式基本吻合。

四是建立政府采购的管理机制。政

府采购制度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事务多,需要建立一整套管理机制来管理和协调。政府采购制度才能顺利运转,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建立完善的政府采购管理机制,就必须建立明确的政府采购主管机构(可由财政部担任)、明确采购模式(可实行集中采购为主,分散采购为辅的模式),加强对招标代理机构或采购代理机构的管理,建立仲裁机构。

四、尽快制定《政府采购法》

鉴于政府采购对政府行为以及国民经济的重大影响,按照依法行政的原则,制定我国的政府采购以及相应的配套法规势在必行。

有同志论述到,仅有政府采购法是不够的,还需要制定大量的配套法规,如对供应商资格要求的规定、对评标标准和程序的规定、对采购从业人员资格要求的规定、对采购管理和经办人员行为规范的规定、对采购质疑和仲裁程序的规定,等等。

还有同志具体阐明了目前国内有关部委起草的招标投标法与政府采购法之间的区别,比如调整对象不同、法的类别不同、立法的目的不同、适用对象不同,等等。●

参考文献:

1、《财政研究资料》,1998年第7、14、22、31期,傅志华、刘运峰、周利国、安秀梅、杨雪芬、李亚珍、陆亨良等人文。

2、《中国财政》,1998年第1、5、6期,贾康、马海涛、何振一、曹富国、胡宇等人文。

3、《财经研究》1998年第11期,范瑗瑗文。

4、《财政研究》1998年第3、4、6、7、12期,冯健身、刘尚希、李达成、许永化等人文。

责任编辑:谭湛明

药品消费研究

□ 徐 斌

(华东理工大学工商经济研究所博士, 上海 200237)

(中图分类号)F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5-0041-06

一、药品消费的社会性与我国医疗保障制度问题

消费品可分为私人消费品(Private consumption goods)和社会物品(Social goods)。前者是指那些个人消费时不影响他人福利的消费品,也就是外部性为零的物品消费。社会物品则是指个人在消费时,社会其他成员也能享受到福利的那些消费品,也就是存在明显外部性的物品消费。

药品消费之所以具有一定程度的外部性,原因:(1)有些疾病具有传染性,对别人具有负的外部性,“对症下药”可消除这种负的外部性;(2)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人力资本因病而停止工作也许会降低生产函数的产出效率,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保健也许具有保护生产函数的外部功效;(3)爱护同类可以说是一切动物的天性,从这点出发可以解释为什么要免费让戒毒者吃药,人道主义的要求也许正是药品消费外部性的重要起因。对药品安全与有效的绝对性质量要求,显然同药品消费的社会性有密切关系。

作为一种社会物品,政府就有介入的必要。对政府而言,目标不仅是效率,更重要的还有公平,我国就提出了“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的方针。公平性是从药品消费的社

会性延伸出来的,已成为卫生保健资源配置的必要标准。

正因为是社会物品,才有了由各种公共财政承担费用的医疗保障制度。药品消费社会性的一个重要含义便是,大量的消费必须通过各种医疗保障制度由公共财政支出承担相当比例费用。这些保障制度的基本目标就是确保国民享受到基本的保健服务。

我国自50年代开始实施的以公费、劳保医疗制度为核心的医疗社会保障制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这种制度是依存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其主要的功能缺陷包括:第一,公平程度低,没有包含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及城镇非事业与非国企单位,以至于享受公费劳保医疗成了一部分人的特权,从而诱发其他社会成员对这种特权的“寻租”行为。例如,“一人劳保,全家吃药”,以及农民向市民低价收购药品再倒卖。第二,诱发“败德行为”。放松消费者的财政预算约束,实质上等同于增加了收入。由于这部分收入是“专款专用”的,用的越多就获得收入越多,于是消费者会尽可能地使用这笔专款,甚至会无病求医,从而浪费国家有限的财政资源。第三,强化代理人问题。由于费用不受限制,患者就缺乏监督医师处方是否经济合理的激励,这加剧了代理人问题。在许多情

况下导致患者被迫“过度消费”，使医疗支出难以有效控制。第四，缺乏有效筹资机制，使保障功能不能正常发挥。这主要是对劳保医疗制度而言的，职工医疗能否真正受到保障，实际上取决于企业财务状况，当企业财务紧张时就可能无法实施保障，没有体现出保障制度应有的可靠性。第五，管理与服务的社会化程度低。国家委托各单位自行负责实施与管理这种保障制度，导致企业办医院等非效率现象。

因此，以市场化为基本取向的医疗制度改革已是势在必行。

二、药品消费的代理人问题

1、委托——代理机制

除了外部性及其延伸而来的社会性之外，药品还有其它一些特殊性：(1)药品往往具有两重性，既可治病防病，也有毒副作用存在，药品消费必须在医师指导下进行；(2)药品消费必须“对症”，也就是说具有专用性，因而通常附属于医疗过程之中，患者离不开专业机构或专门职业者的帮助，也就是说药品消费不可能是独立的过程，必定包含在整个治疗过程之中；(3)药品本身的质量好坏及是否适用等专业知识只有医师及药师具备，普通消费者在购买药品时信息不充分，无法独立作出完全正确的判断，必须或者经常地需要药师或医师提供咨询意义，这可称之为药品信息的不充分性。

由于药品的上述特殊性，就造成了药品消费的代理人问题，即药品消费决策是由不承担付费责任的医师或药师来决定的。这主要表现在：首先，药品消费者（患者）自己不决定选用哪种产品，而是由其代理人——医师来决定；其次，药品消费经常也不必为药品付费，而是由政府、保险机构、慈善组织等许多形式的机构来支付；再次，不论是处方药还是非处方药，不同品牌或通用名药的不同产地等的选择，通常也不是由对此一无所知的患者决定的，而是由药师来选择的；最后，医疗效果也不

是消费者自己能完全判别的，必须由具备这方面专业知识的医师来鉴定，并决定下一阶段的购买决策。因此，药品消费以被动决策为基本特征，在这里，代理人问题主要表现为“道德风险”问题(Moral hazard problem)，即，由于消费者无法监督，代理人可能作出损害委托者利益的决策。这样的消费模式就令人不得不担心，医师是否能为消费者着想，在处方中采用最经济合理的药物呢？

医师对药物的相对价格一般说来信息不完全，因而难以完全地选择最经济的药物；而且经常只考虑疗效而不考虑价格，再加上其它因素，就可能存在滥用药物的可能性。不过，实际上这种倾向不明显，医师的处方基本上经济合理的，这有几种原因：一是药品市场的高度竞争性，促使厂商主动向医师提供有关信息，改善了医师对药品相对价格的了解。二是病人也会说服医生尽可能地照顾到病人的经济条件，毕竟医师的个人声誉建立在病人对其信任程度的基础上。三是医师受到所属组织的规章制度的激励和约束，而医院的规章制度是由消费者诱导出来的，服务得好的医院才能吸引患者前去就诊，故而具有保护消费者的功能。

但是，在许多中小医院中仍存在着另外的非效率现象：一是大处方，即小病用重药，尽可能地多用药，使医院可按规定药品销售利润率获得较多数量的利润。二是“富贵方”，即开出贵重药与营养滋补品，全然不顾价格如何，其中，有些是“人情方”，即病家主动提出要求，有些则是医师为创收以推销这些药品而开出的。三是“设备方”，为了利用医院留置的贵重设备，而在不必要的情况下让病人去受检或受疗。医疗费用越来越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代理人造成的过度消费。据估计，目前这种不合理医疗费用占全部医疗费用的20%以上。

配药中的代理人问题较为容易处理。对于非处方药，顾客可以依据自己的知识及经

验,再加上药师的推荐,由本人决定购买什么品牌。对于处方药,显然药师对药品相对价格较为了解,有能力选择最经济的品牌或品种;有研究表明,较便宜的通用名药物具有比专利药物更高的利润率,因而药师将推荐前者。另外,药师的行动同样要受到有关组织及其制度的激励及约束,一般情况下,药师具有合理配药的激励。

代理人问题正是当前呼吁医药分业的主要理由。在正常情况下,医师滥用药品的倾向不严重,但不是说消除了这种可能性,假如医院财政状况紧张,就可能鼓励而不是抑制医师作出过度消费的决定。医药分业制度将是防止这种代理人问题发生的必要制度条件。

2、代理机制对 R&D 的影响

哈佛商学院教授 Regina E. Herzlinger 在《市场导向的保健业》一书中认为,保健业与其它产业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市场支付的保健业将使消费者处于支配地位,将来甚至可能出现在家治疗,无需求助于医院。这种观点受到英国学者 Alexandra Wyke 的批评,她认为:“并非所有的人都如 Herzlinger 所期望的那样急于控制医疗”,病人更偏好于让医生作出困难的决策。

在我们看来,代理人是不可取消的,因为这符合专业化分工的原理。无论病人在信息时代里多么地有知有识,其决策的正确性在概率上总不如专业化的职业医生。代理机制不等于代理人问题,存在代理人问题也不一定就严重到需要取消的程度。在还没有找到最优的解决方法之前,还必需保留不太好却有效的代理机制。

限制医生的权限也许能有效地抑制部分过度消费现象。镇江市“医改”试点规定:每张处方平均应限值在 47 元以下,同时对用药量也作了限制,急性病限量在 3—5 天,慢性病限量在 7 天,外配处方仅限于中药方,应控制药量在 10 味 5 贴内,且需审核后盖章方有效。结果,1995 年全市的药品消耗量下降了 20%;

而且,常规药品比例增大,贵重药品比重下降。另外,其他一些制度改革,如制订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及公费医疗药品报销目录,通过限制医生的用药范围也能起到控制消费的作用。但是,这些改革措施都具有消极作用,主要问题是会不会影响到疗效。如果背离了这个终极目标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改革。我们相信市场化改革毕竟是有限度的,药品消费的特性决定了这点。

假如代理机制没有被明显削弱,那么,对企业 R&D 的明显影响就包含了这样几方面:一是对 R&D 产生较强的激励作用。因为医师或药师是药品实际上的直接购买者,他们比之患者更重视药品的质量及效果,对价格不太敏感,因此,为新药开发提供了较高激励,新药的价格可以是同品种普药的几倍乃至几十倍,却照样受到欢迎;二是提高了 R&D 成本。这主要是由寻租行为造成。有案例显示,由于要进入各地的公费报销目录从而进入医院,促销费已经大大超过了真正的技术开发费;再加上名目繁杂的回扣,新药的开发生成本已大大提高,导致新药无法收回投资。

三、价格弹性与影响需求的因素

1、缺乏价格弹性的必需品

药品消费的价格弹性通常小于 1,因而是一种必需品。

实际上,药品消费有时根本就不存在弹性。例如,上海市 40 家医院 1994 年药品销售额较上年增长了 20.6%,同期药品零售价指数上升 11.7%,推算出药品销售量增加了 8%;1993 年更为异常,零售价格数据上涨了 9.2%,而销售量增加了 34%。如果计算价格弹性的话,1992—1993 年的弧弹性为 9.2,1993—1994 年的弧弹性为 0.68,符号皆为正。这是没有意义的,应该视为不存在弹性。

然而,并不能依据价格弹性小就认定消费者对价格不敏感,有研究指出,专利名药与通

用名药有良好的替代性(交叉价格弹性接近或大于1),不同品牌药物之间也有较好的替代性(交叉价格弹性较大)。Robert C. Feenstro 的一个计算表明,Cephalexin 对 Cephadrine 价格的需求交叉弹性为 3.80,Cephadrine 对 Cephalexin 价格的需求交叉弹性为 3.13,同样表明相似疗效的药物具有良好的替代性,价格低的替代品会受到欢迎。

药品价格弹性低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药品具有专用性,替代品数目较少,消费者选择余地极小,无法对价格变动作出灵敏反应,搜寻成本太高了;二是药品消费具有时效性,具有很高的贴现率,而在较短时间内消费者就很难正确进行价格比较,同样不可能反应灵敏;三是药品消费的社会性导致的个人消费集体支付的消费模式,对个人而言不存在财政约束条件,因而存在过度消费倾向,价格在个人决策函数中是权重很小的变量。

2、影响药品需求的主要因素

与通常的影响需求曲线的因素相对重要性排序不同,我们认为药品需求的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序列如下:

第一是医生的偏好,这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因为选用何种药品大多由医师决定,而医师一般偏好于安全、有效,也就是质量高的品种。如此说来,实际上质量是最重要的因素。例如 1994—1996 年,上海医院购药金额前 20 位的药品中,大多为进口药或合资药,这些药品在国内实际上都有替代品,但质量上的差距,使仿制品不能获得医师的青睐。

第二是人均收入水平。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水平都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增,这表明两者具有正相关关系。

第三是人口数量尤其是老年人数量。在美国,65 岁以上老年人的药品消费量是 65 岁以下者的 5 倍,75 岁以上者则是 75 岁以下者的 8 倍。这是因为老年人发病率较高,同时康复期较长的缘故。不过,有些药物的最大消费

量有相应的年龄段。

第四是广告等促销手段,有时,广告费支出超过了真正的技术开发费,可见广告对需求的影响有多重要。但是,广告对老药需求的作用肯定不及价格,否则,为什么厂家不肯花钱为老品种做广告呢?

第五是替代品价格,这主要针对老药的需求而言。医生和病人对老药的性能已比较了解,这时有可能比较关心价格问题。例如,在长沙铁路医院,1989—1991 年,在抗感染类药销售额中,青霉素类药要占 30%—40%,处于第一位。其原因就是此类药高效、低毒且价廉。

其它因素对药品需求的影响就不太重要了。例如,由于药品本身有效期很短,且个人对药品的需求有不确定性,因而价格预期几乎不起作用。又如,由于疾病包含了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因而药品市场不可能真正饱和。因此,市场饱和程度对药品需求的影响也不大。

四、消费结构:二元性与本土化

1、消费水平的二元结构

中国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特征,这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显著差异。收入的差异自然会反映在消费水平的差异上。尽管医疗保健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在城乡之间并没有明显差别,但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与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之比率却相当低,1994—1996 年 3 年的平均比率为 39.31%。由于城镇居民大多享受公费或劳保医疗待遇,而农民大部分自掏腰包,因而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水平的差异实际上要比这个比率大许多。有人估计城市与农村的人均年用药消费额的比率为 9:1,即,城市居民人均年消费药品 90 元,农村居民人均只有 10 元。

2、药品消费的本土化

有专家估计,全国平均而言用药结构为:国产药占 65%,进口药占 20%,合资药占 15%,但在典型的大城市中,价格相对较贵的进口药与合资药的消费比例较高。国产药尽管总体上仍处于购药总额最大的地位,但比重在逐步下降,在 100 个领先药总金额的比重中下降更为明显。而进口药比重同样也在下降,只有合资药所占比重在逐年上升。

进口药受到医生欢迎,主要在于质量更可靠、疗效更好。据成都市对喹诺酮类药物的一次调查,医师、药师对进口品种疗效的认同率为 65%,超过 35%的对国产品种的认同率,而进口品种的不良反应仅占 40%,低于国产品种的 60%;但对进口品种价格的认同率较低(20%),导致进口品种的首选使用率仅占 35%。

现在不少企业采取的国产化战略颇有成效,通过合资引进技术,进行少量生产及开拓市场后,由国内企业大量加工生产以扩大市场份额。这种进口原料药加工制剂的西药批文号已从 1995 年占总批文号的 11.7%,提高到 1996 年第二季度的 30%。而合资药实际上是对进口药的替代,现在全球前 20 位制药企业中已有 17 家来中国合资建厂生产,其中一部产品正是原先要进口的产品。

因此,尽管随着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对进口药的需求在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同时又在逐渐地转化为合资药及国产药,故而存在着海外药品本土化的趋势。

五、药品市场是责任市场

1、为什么是责任市场

所谓责任市场也是说责任本身就是交易的对象,随着药品的流通而在每次交易过程中被确认和转移,从而构成完整的清晰的责任链,当病人消费药品时同时也在享受着卖方提供的“责任”。在这里,药品和对消费者的责任不可分离。这是由药品的特性所决定的:(1)

药品的二重性及专用性表明,用药有可能对病人造成损害,为确定损害的责任者就必须建立责任链;(2)信息不充分及代理机制表明,病人自己不应为药品消费后果负责,因而消费责任应由卖方提供。卖方的责任主要有两方面构成:一是及时供应药品的责任;二是对药品临床反应的责任。简言之,卖方的责任就是及时提供安全、有效的药物。

责任市场也意味着是质量市场。所谓责任,实际上就是质量保证。药品不同于其它商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符合质量标准的次品或等外品几乎没有使用价值。质量市场包含了很高的质量壁垒,次品或等外品不允许进入市场。这种壁垒通常是制度性的,除了监管药品质量的一些法规外,还包括为防止伪劣药品进入市场而设置的一些预防性制度。这些制度壁垒对企业而言构成主要的进入壁垒,是制药业 R&D 成本较高的重要根源。

2、责任成本与药品质量

自 1985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药品管理法》至今,我国药品管理法规体系已经基本建成。然而,假劣药品案件仍制而不止,实际上,整个药品市场的质量状况都不能令人满意。

我们认为,责任成本低是导致药品质量低的根本原因。不合格产品的供给成本当然可以降低,但如果承担的责任成本超过这种成本节省,那么理性者就不会提供不合格产品。现在,药品的责任成本明显偏低。由于信息不对称,不合格药品不一定被发现,只有被发觉后才发生责任风险损失。因此,责任成本是一种期望成本,等于责任风险损失乘以风险概率。

鉴于药品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危,一般说来责任风险损失是很大的,然而风险概率普遍较低:一是地方保护主义在容忍不合格药品;二是制“假”技术在不断改进;三是药品管理存在许多漏洞。要提高药品质量水平,就必须提高责任成本,主要途径在于提高风险概率:一是提高及完善药品质量标准,同时要求更高的检验合格率;二是加强药检力量,增加抽验频度;

三是改善药检技术,提高效率;四是完善管理制度,保持责任链的清楚、完整。相比于通过提高进入壁垒使不合格药品无法进入市场从而不能实现收益的治理方式,提高责任成本从而使不合格药品即使进入市场也无利可图,我们相信更有效。

3、责任成本与 R&D 强度

责任导致的风险成本在药价中有时占有显著地位, Richard L. Manning 对加拿大与美国处方药价格差异的分析表明,责任成本差异是药价差异的显著解释变量,责任成本差异大致使药价差异平均值提高一倍,使药价差异中位数提高 1/3。随着法规健全与健康价值的提高,我国药品的责任风险成本也会提高,这将影响到企业 R&D 行为。

美国杜克大学的 Viscusi 与 Moore 通过对产品责任保险成本与创新各种特征之间的数理统计分析,得出的一个重要结构是, R&D 投入强度与责任成本之间的关系是二次式,责任成本增加起初会提高 R&D 强度,但到最后将降低 R&D 强度。这表明企业的行为是这样的:当责任成本提高时,他们就会增加 R&D 投入以改善产品安全性,否则就会遭到更大的责任成本;但当责任成本进一步提高到一个临界点后,企业因为无力承担这种责任风险转而会减少创新甚至放弃新颖性要求,只寻找安全性较高的技术,从而 R&D 强度反而下降。不过,平均而言,在 Viscusi 与 Moore 的样本中,责任成本提高 1%,则 R&D 强度将提高 15%。需

要指出,产品责任与创新的上述关系主要表现在产品 R&D 而非工艺 R&D 上。

Viscusi 等人的结论表明,适当提高责任成本对企业 R&D 具有激励作用,并非如想象的那样,责任成本会抑制 R&D,只有当责任成本高出一定界线后,这种情况才会发生。由此推论,在我国制药业 R&D 强度与产品质量都显不够高的情况下,应该提高责任成本以迫使企业加强 R&D 投入,提高质量。●

参考文献:

①余晖:《中国药业政府管制制度形成障碍的分析》,《管理世界》1997 年第 6 期。

②孙志筠:《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与医药行业发展》,《中国药业》1997 年第 9 期。

③叶贻国:《从镇江医疗制度改革看药品消费市场变》,《中国药业》1997 年第 1 期。

④孙锦炎:《再议上海地区用药新动向》,《中国新药杂志》1996 年第 4 期, P. 72。

⑤杨爱民:《上海用药趋势分析》,《上海医药》1998 年第 1 期。

⑥李江华:《我院 3 年药品消费结构分析》,《中国药学杂志》1994 年第 6 期。

⑦陶剑虹:《我国医药市场品种结构》,《药学进展》1997 年第 3 期。

⑧邓雪蔚等:《成都市喹诺酮类药物市场调研》,《中国新药杂志》1997 年第 2 期。

⑨《中国医药年鉴 1994》, P. 41。

责任编辑:谭湛明

现代性的危机与出路

王金宝

(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天津 300071)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5-0047-07

“现代性”作为支撑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理论基础,包括以下三个基本内容:理性主义思想、主体性原则和线性社会进步史观。它是由笛卡尔和培根开创,又经过18世纪启蒙运动,到康德和黑格尔得以确立成熟和逐渐展开丰富的。由于“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缺陷和矛盾,以及现代工业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19世纪末期思想家们就开始了“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但由于他们仍居于“现代性”的思维方式,所以其反思和批判往往是不彻底的,而且在一定程度又进一步发展了“现代性”。到20世纪下半叶以来,当代思想家才真正对“现代性”提出了全面的挑战和深刻的反思,直到此时,“现代性”才真正陷入了全面和普遍的危机之中。

一、“现代性”危机之一:理性主义的式微

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兴起、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理性”无疑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还是文化结构,都具有“理性化”的特征,都是逐渐被“合理化”的发展

过程。如果说前现代社会是一个由宗教统治的社会,那么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无疑就是理性逐渐取代宗教从而最后“一统天下”的过程。从笛卡尔以来,人的理性逐渐被人们捧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人是理性思维的存在物,人只有运用理性,才能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而理性代替宗教成了衡量和判断一切的标准。这种理性主义观念对破除宗教神学的束缚,促进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使政治结构更加“理性化”,都起到了正面作用。但这种理性主义本身也带有先天的缺陷,这也正是当代思想家批判理性主义之所在。

(一)理性主义的片面性。传统理性主义强调理性的重要性是以贬斥、压抑人的非理性、情感和意志为代价的。理性主义思想家或者不承认非理性等因素的地位和作用,或者是虽然看到了这一面,但用理性去统治和压制它。这种对理性的崇拜,成了当代思想家攻击的目标。福科认为,西方传统的理性对非理性的排斥和压制恰恰使理性走向了反面,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并没有胜利可言,理性在这一征服中反而转化成了非理性的强暴和专制。^①德里达从解构传

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出发,认为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是形而上学的必然要求,理性统治非理性是一种不合理的“等级观念”,他的目的就是要“在一定时候推翻等级序列”。②罗蒂也认为“合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阻碍了我们对文化的理解,消除这种西方现成的老框框是当代许多思想家的共同主题,它应该被“取代”。③

(二)理性主义的单一性。传统理性主义强调的“理性”,实际上是“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理性主义思想家是要用这种理性去为社会和其他文化奠定基础,提供“合法化”。这种单一的理性观导致了科学技术的滥用,使人完全置身于工具理性的控制之下,人的精神文化也被科学化和理性化了,人则变成了科学的对象、理性的奴隶。“科技理性”的膨胀,导致了人类生活的机械化、单一化。正如福科所言“随着理性和科学的昌盛而来的是人类经验的枯竭”,而从尼采开始,这种“理性和科学的不可一世的统治摇摇欲坠。”④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弊端的批判更是一针见血,他认为“科技理性”的结果,导致了人的“存在”或“生存”的遗忘。伽达默尔则力图强调人类的艺术、审美等的经验解释来对抗科学主义对人文科学以及人的生活世界的蔑视和统治。哈贝马斯也主张要批判工具理性的绝对权威,代之以多元理性观,建立一种“交往理性”。

(三)理性主义的绝对性。传统理性主义认为,人天生就具有理性能力,这是人的天性,是超验的,而且这种理性是所有人共同具有的,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理性是一个完整的具有同一性的整体,对任何事物、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具有同样的效力。从而,这种理性是绝对的,虽然历史在发展,但一些理性原则是

永恒的、不变的。而且一旦我们运用理性掌握了“真理”,那么这种“真理”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同等的力量,永远不能被推翻。而海德格尔则认为,任何一种真理和理性都不是既成的东西,它是一种向未来的“敞开”。伽达默尔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批判了传统的绝对真理观和理性观,认为任何事物都没有一个客观的本来的本质存在,人们的解释和理解是一种“视界融合”,不可能有一种绝对地把握和再现了事物的真理和理性存在。罗蒂干脆认为真理不具有纯粹的客观性,它是一种建立在一定交往共同体基础上的“协同真理”,绝对普遍的理性根本不存在。

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理性主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现代的片面、单一、绝对的理性观已出现危机,并表现着理性主义式微的趋势。

二、“现代性”危机之二:主体性的黄昏

弘扬人的主体性,可以说是现代西方思想发展过程的一条红线,而且也是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提高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是理性逐渐取代宗教的过程,那么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人作为主体而代替上帝的过程。理性主义和主体性原则在现代思想文化中是合二为一、密不可分的,理性讲的是人的理性,而主体性实质上是理性的主体性。从笛卡尔开始,弘扬人的主体性原则就成为现代思想家的共同目标。

自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的主体性观念就逐渐受到了冲击。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以及存在主义都批判了传统抽象的主体性,但是他们又把人的“权

力意志”、“生命之流”、“无意识”以及“个人存在”放置在支配决定一切的主体地位。而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很多思想家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者则对人的主体性采取了全面消解的策略,以致德里达和福科自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之后,又提出“人的终结”的骇世结论。

人的主体性对推动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曾起到了巨大作用,但这种主体性的膨胀也带来了这样或那样的弊端,出现了环境危机、精神危机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当代思想家也正是基于此,对现代主体性观念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一)主体的抽象性。传统主体性观念实际上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之上的。这种观念往往把人看成是天生就具有理性能力和自由平等权利的存在物,并由此出发去规定人的主体性。这样,人的主体性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抽象的人性预设基础上的,从而使其失去了现实生活的基础,而成了一个空洞的神话。而当代思想家则反对这种抽象的主体性。罗蒂认为,主体性原则是现代的一个方面,“为了这一方面,一群孤立的圣职人员奋斗了二三百年来,但确对欧洲国家实现启蒙理想的成败没有产生重大影响”。^⑤福科则认为“人的主体性”只是 17 世纪虚构出来的一种“语言”或“话语”,没有任何必然的实际意义。利奥塔德也指出,“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只是现代性的神话,现在正在失效。当代思想家批判抽象的主体性,其策略是想把人拉回到现实基础之上,而他们则认为现实基础就是“语言”,认为人离不开语言之网,既然语言之网限制、制约着人,那么人又何谈其主体性呢?正如福科所言:“当语言的存在继续在我们的地平线上放射出越来越强烈的光芒时,人正处于消亡过程中”。^⑥利奥塔德也说,

主体“正在语言游戏的散播中消解自己。”^⑦

(二)主体的孤立性。传统主体观把主体看成是单一的原子式的实体,认为每个人都是具有独立性的孤立个体,社会无疑是无数孤立个体的机械相加,这种主体的实体化、孤立化倾向导致了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和人与人关系的疏离化。海德格尔认为,个体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实体,而是存在于与他人关系的开放性之中,是一种“共在”。伽达默尔也反对孤立个体的独立价值,认为人是处于与历史、他人的互相交流和互相理解中而存在的。哈贝马斯从“生活世界”入手,关注人与人具体的交往关系,认为主体只能是交互主体。拉康则说:“主体没有独立存在,它只是通过主观内部与另一个人的对话来显示自己,而且谈话的涵义同时取决于对话双方。”^⑧由此可以看出,当代思想家对“主体间性”、“交往”、“对话”的关注就表现着对孤立主体观的批判和克服。

(三)主体的虚妄性。传统主体观是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强调主体对客体的支配、征服和改造,把主体看成是凌驾于外部客体之上的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这种观念的极端化导致了“人类中心论”或“主体中心论”。虽然它为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提供了理论支持,但这也是当今出现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当代思想家批判了主客体二元对立模式,强调了人和自然的平等与和睦相处。海德格尔从批判科学技术泛滥造成的人对自然的奴役出发,认为人不是自然界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界的看护者,存在的牧羊人。德里达则从解构主客体二分的思维方式和主客体之间的等级观念入手,力图给主客体以平等地位。而大卫·格里芬等自称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

认为,人类中心主义虽然给西方现代化带来了巨大成就,但也带来了严重环境危机和精神分裂,所以必须“抛弃现代性”,“超越现代社会存在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⑨

由此可见,现代主体观越来越受到当代思想家的拒斥,正如《主体性的黄昏》一书的作者多尔迈所总结的:“主体性的观念正在丧失着它的力量,这既是由于我们时代的发展导致的,也是因为一些先进哲学家们的探究所引发的。”^⑩

三、“现代性”危机之三:线性社会进步史观的破产

“理性主义”与“主体性原则”的结合,必然产生线性社会进步史观。既然理性是至高无上和绝对普遍的,那么社会发展必然就是按照人的理性和科学进步逐渐发展的过程;既然人具有高于万物的主体性,那么人类社会肯定就是人的主体性逐渐表现和人逐步获取解放的进步历程。这种进步观念和乐观主义观念在现代工业社会发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是人们向往美好未来,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巨大精神支柱。但进入本世纪以来,伴随着环境污染、能源危机和核武器的威胁,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技理性的发展并未给社会带来真正进步,反而使人类社会陷入了深深的不可摆脱的危机之中。特别是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们所向往的自由平等的社会制度非但没有实现,反而造成了专制集权主义的泛滥和人类社会的巨大破坏。而且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人们并没有得到幸福和解放,反而陷入了“商品拜物教”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疏离和道德价值虚无主义的困扰之中。

(一)社会发展的目的性。传统线性

进步史观认为,社会发展是趋向一个特定目的即理性的充分发展和主体的自由解放的过程,所以,传统思想家往往给人们设定出一个美好的目标或“理想的乌托邦”。当代思想家很少再建立一种庞大的统一理论体系,去为人类社会设定发展前途和美好目标。他们抛弃了传统形而上学建构宏大体系的愿望,抽削了脱离当下现实的空洞的理想主义,更加注重对现实问题进行治疗性的分析。而且,他们对社会未来不再抱盲目的乐观主义态度,而更加倾向对具体问题冷静保守的思考。他们也不再认为自己的研究和结论是社会发展的“真理”,未来的“航向”,而声称这只是一种可能选择的思路和特定视角下的思考。罗蒂批判了传统哲学的建立宏大体系和对社会发展进行独断论思考的特征,认为要建立一种具有当下实用性的“教化哲学”和“治疗型哲学”,走向一种后哲学文化。利奥塔德则将人的自由解放看成是一个虚幻的神话,从而瓦解了传统的“理想的乌托邦”。而德里达、福科从对人主体性的解构进而宣称“人的终结”,更是给社会发展前途涂上了一层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色调。

(二)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传统线性进步史观由于受到进化论的影响,从而笃信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认为社会是由低级逐渐向高级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这是不容置疑的,因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人们道德和生活的进步。当代思想家则批判了这种必然进步的观念,认为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没有给人类道德、文化带来进步,反而造成了社会的断裂。贝尔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断裂,认为经济的发展非但没有带来政治、文化的进步,反而现代主义文

化一直作为资本主义的对抗力量,起着一种腐蚀社会生活的作用。福科也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什么持续性、必然性可言,它只是一种“语言体系”的偶然更替罢了,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不存在确定不移的必然性,它只是由一些不确定的偶然的断裂碎片所组成,谈不上有什么非得如此的趋势。

(三)社会发展的一致性。传统线性进步史观认为,任何社会发展都具有同构性、一致性,无论在世界的哪一地方,都必然要按照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而发展。然而 20 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出现的危机和其复杂性特征的增强,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照搬西方社会发展的模式,也走向了现代化,这样就逐步使社会发展模式的一致性和普遍性受到了质疑。当代思想家们更加强调的是“差异”和“多元”,抽象的统一、一致、普遍和整体的观念越来越遭到人们的抛弃。德里达和利奥塔德对“差异”、“多样性”的强调最具代表性。德里达通过创造出“延异”(differance)一词来表达重差异、反同一性、反结构的思想。利奥塔德则认为:“我们为缅怀整体和单一,为概念和感觉的一致,为明晰透彻和可交流经验的一致,已经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让我们“向整体开战”,去“触发差异”。^①在当代一些思想家特别是第三世界思想家那里,反对“西方中心论”、反对西方单一社会发展模式已成了他们普遍的共识和致思的取向。

由此可以看出,现代的线性进步史观遭到了当代思想家深刻的批判,逐渐被人们所抛弃,而且表现着一种被“多元史观”所代替的趋势。

四、现代性的出路

“现代性”出现了危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它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它一方面是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一种理论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对即将来临的“信息社会”、“后现代社会”的一种观念上的建构。现代思想家高扬人的理性,高扬人的主体性,强调社会的进步发展,这本无可厚非,然而他们高扬的理性,只是一种片面、单一、绝对的理性;高扬的主体性,只是一种抽象的、孤立的、虚妄的主体性;强调社会的进步发展,却陷入了一种具有机械因果必然性的线性史观。而后现代思想家恰恰抓住了“现代性”的这些弊端,批判了“现代性”中的片面化、抽象化、空想化的内涵,这对克服传统形而上学无疑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对我们拓展思路,重新理解“现代性”都极具启发性,同时对当代社会的发展也具有不可估量的“警世”作用。

然而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后现代思想家那里也存在着某种极端化的倾向,他们在批判现代理性主义、主体性观念和线性进步史观的同时,却走向了非理性主义,全面消解人的主体性和否认社会发展的泥泽之中。这实际上涉及到究竟如何理解人的理性,人的主体性和社会发展问题。人本身是理性和非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体,片面强调哪一方面,都是对完整的人的片面化理解,其现实结果必然造成“单面人”。人的主体性是现实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任何想把人的主体性抽象化、虚妄化和一味强调人与外部世界的完全平等合一从而消解人的主体性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辩证的历史过程,对社会发展进行线性理解和否认社会的进步,都缺乏理论和现实的根据。由此,“现代性”虽然出现了问题,但我们

绝不能走向全面抛弃人的理性、人的主体性和否认社会发展。我们必须重建一种扬弃了“现代性”的新型理性观、新型主体观和新型社会发展观。“现代性”已出现的危机并不能成为我们全面抛弃“现代性”的借口。

由此观念出发,我们可以对“现代性的出路”问题作出一个冷静合理的选择。反观当代思想家对如何解决现代性的危机以及“现代性之后”的可能选择是什么,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思路。

(一)向前现代回归的旧保守主义思路。这种思路反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一切成果,认为应该返回到前工业文明或农业文明的“田园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中,人与自然天然合一,人与人纯朴往来,没有对自然的破坏,也没有精神危机的纠缠,这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而现代工业社会则破坏了这种天人合一的世界,相对前现代社会而言,这不是进步,而是倒退。这种思想在西方(如生态学派)和中国(如新儒学)都有所表现,它虽然强调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统一的思想,对医治社会“现代病”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要想“回归”是不可能的。这实际上,是想用前现代观念取代现代观念,这种思路空想有余,而实现很难,带有抽象的“理想乌托邦”色彩。

(二)新保守主义思路,这以贝尔为代表。这种思路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回避的,它们也为社会和人类生活带来了便利,所以要欢迎现代科学的发展,但是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代主义文化则是我们应该抛弃和批判的,因为这种现代性文化历来标榜“个性化”、“本能”、“自我发展”以及“反制度精神”,所以导致了人们的信仰危机。贝尔认为要解决这种危机,必须“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这样才

能恢复资本主义的道德基础和文化的连续性。这种思路的理论本质上与旧保守主义没有太大的区别,其力图建立某种统一的“新宗教”从现在来看其现实性和可能性很小,因为文化的多元时代正在来临,而再侈谈“宗教统一”只能是一厢情愿。

(三)激进的后结构主义,这以德里达、福科为代表。他们主张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语言结构要进行全盘否定,“现代性”应该被全部摧毁。这种思路并不想建立什么新东西来代替“现代性”,而是一味的主张消解一切传统的价值、理想和历史确定性,这种观点表面上看来比较激进,实际上是对差异、不确定性、偶然性的肯定,这种“怎么都行”的态度无疑更多的带有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成分,这只会导致人们的无所适从。而且,这种“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式的思维方式,也不会给人以一种精神支柱,而只能强化人们的精神危机。所以,这种思路也是不可取的。

(四)新现代主义的思路,这以哈贝马斯为代表。这种思路承认“现代性”已出现问题和危机,但这并不等于“现代性”已彻底终结,“现代性”的设计并没有完成。在今天这个社会、政治、文化都已发生变化的时候,必须在不抛弃现代性的精神基础上,重建一种新的“现代性”。他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但并没有抛弃理性,而主张给予理性一个恰当的位置,建立一种多元理性观;他批判传统的主体性原则但也没有放弃人的主体性,而力图建立一种“交互主体性”;他批判线性史观,并没有抛弃人类历史的发展以及人的理想和目标,而主张确立一种融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社会行动纲领,给人一种现实的切合实际的精神支柱。反思批判“现代性”,并不是完全抛弃“现代

性”，而是要进行一种新的理性的重建和新的主体性的重建。由此可以看出，哈贝马斯所提出的计划其合理性和建设性的意义要大于其他三种思路。

在中国今天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中，思考“现代性”同样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虽然中国正处于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与西方先进国家正在向后现代社会转型有着不同的社会发展基础，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没有也不可能脱离西方和整个世界的背景。自从 19 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本世纪五四运动以来，西方的物质文明、民主、科学就成为了无数中国知识分子、革命志士以及普通国人的向往和追求。尤其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更成为了当代中国的一个“主导话语”，许多中国人都沉浸在一种“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梦想之中。仔细思考中国人的“现代化情结”，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现代化情结”背后无非就是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些“现代性”观念。虽然“现代性”在中国现实中并没有完全展开，但它却一直是当代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想和追求目标。由此，西方当代学者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也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中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必然要求建立一种“现代性”的文化观念作支撑，但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整个世界背景之下进行的，而且“信息社会”的一些技术和文化观念已开始进入中国，固守旧有的“现代性”观念同样也不合时宜。所以，可能的思路应该是在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合理观

念，充分借鉴当代思想家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现代性”的文化观念。哈贝马斯的重建工作最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①参见德赖弗斯、P·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和解释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73 页。

②德里达：《立场》，转引自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 82 页。

③罗蒂：《哲学和自然之境》，中译本，三联出版社，1987 年版，作者序，第 15 页。

④转引自《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价》人文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 400 页。

⑤转引自《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 66-67 页。

⑥福科：《事物的秩序》，转引自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1 页。

⑦利奥塔德：《后现代知识状态》，转引自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1 页。

⑧转引自科恩《自我论》，三联出版社，1986 年版，第 214 页。

⑨格里芬等：《后现代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8-19 页。

⑩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 页。

⑪利奥塔德：《后现代知识状态》，转引自《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 53 页。

责任编辑：冯 生

黑格尔逻辑学开端探析

□高家方

(吉林师范学院政教系副教授,吉林 吉林市 132013)

(中图分类号)B81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5-0054-05

一、黑格尔对开端的确定

黑格尔在他的《小逻辑》第17节里,专门讲了哲学的起点与终点的问题。黑格尔认为,谈到哲学的开端,本来与别的科学不同,因为哲学自身是一圆圈,不存在一般科学的起点问题。可是,为了研究方便起见,也需要像别的科学一样,先假定有它的研究对象的存在。哲学既然是对事物的思维考察,因此必须先假定有思维的存在,以思维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活动是一种思维活动,因而它完全是自己创造和提供自己的对象。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推演过程中,所谓哲学的起点与终点只不过是所谓绝对理念这个大圆圈中的不同阶段而已。他公开承认,这种由概念到概念的思维自身运动,即自己决定自己、自己返回自己、自己满足自己的概念运动,是思辩哲学的唯一目标。

黑格尔的整个逻辑学,便是按照上述目标建立的。

黑格尔从四种不同的角度讲了哲学的四种意义的开端:(一)就人的具体认识过程来说,认识活动的最低级的意识即“感性确定性”为开端,经过漫长曲折的过程以后,终于达到“绝对知识”即关

于概念的知识,这个过程是《精神现象学》所描述的。(二)就哲学以思想、概念、理念为研究对象来说,哲学以概念为开端。①(三)以“绝对”为开端。②(四)整个逻辑学以描述概念的转移、转化过程为内容,这个过程以最抽象、最贫乏的概念——“纯有”为开端,这个开端叫做“逻辑学的开端”。《小逻辑》第86节和《大逻辑》的“必须用什么作科学的开端”节集中讲了这个问题。美国学者哈利士认为,黑格尔关于他的哲学系统讲了三种开端:第一是“主观的开端”即精神现象学所讲的以“感性确定性”为开端;第二是“本体论的开端”,即逻辑学所讲的以“纯有”为开端;第三是以“理念”或“自我活动”亦即“绝对为开端”,他说:“绝对是黑格尔系统的真正开端”。③

黑格尔说,凡是开端的东西,就不需要再用别的东西来说明。精神现象学的最后阶段,就是逻辑学的开端。最抽象的概念,就是理性认识的开端。这个概念黑格尔叫做“纯存在”或者叫做“纯有”。

“纯存在”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是有和无的统一。所谓“纯存在”用我们通常的话说,就是对一切事物的高度抽象

和概括,它是最普遍、最一般的概念,因而也是最空洞、最抽象的概念。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存在”可以用“是”来表示。这样,纯存在的抽象性或无规定性就可以这样理解:比如我们说“这是……”或“X是……”,还没有说出来是“什么”时,这个“是”就是没有任何规定性,没有任何内容的、纯粹的、抽象的“是”。当我们进一步说出“是书”或“是笔”等时,“是”就有了规定性,有了内容,书或笔就是它的规定性和内容。因此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既不能形成表象,也没有什么可以思维的。这样的“存在”和“无”没有任何差别,和无是等同的。

开端是直接性和间接性的统一。哲学应该从哪里开始?是从直接的东西,即没有前提的东西开始,还是从间接的,即有前提的东西开始?黑格尔认为确定这点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无论是从直接的东西开始,还是从间接的东西开始,都会遭到反驳。但是,他认为既不能从前者开始,也不能从后者开始,这又是容易指明的,因为没有什么单纯的直接性或单纯的间接性,一切东西无不同时包含着直接性和间接性,它们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批判那可比的“直接知识论”时说:“胚种和父母,从其所产生的枝叶和后裔看来,只可以说是直接的、创始的存在。不过胚种和父母的存​​在虽说是直接的,但它们仍然是有根源的,是衍生出来的;而枝叶和后裔,其存在尽管是中介性的,却仍然可说是直接的,因为它们存在。”可见,一切东西都是直接性和间接性的统一。由此黑格尔得出结论说:“无论在天上、在自然界中、在精神中或任何地方,都没有什么东西不同时包含直接性和间接性,所以,这两种规定不曾分离过,也不可分离,而它的对立便什么也不是。”④黑格

尔在这里列举“天”、“自然界”和“精神”这些方面,是为了说明任何领域中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着的,强调没有什么东西是孤立存在的。这个思想是合理的。但是,他把天(在黑格尔那里就是绝对观念)摆在自然界和精神之前,并看作是先于自然界和创造自然界的,这个观点同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法没有什么区别。

二、黑格尔开端上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

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是辩证逻辑的一对基本范畴。它们之间的一致是辩证逻辑的一条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黑格尔在论述存在、无、变易这三个范畴的依次过渡时,在唯心主义形式下谈到了这条原则。他说:“在科学上是最初的东西,也一定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这里的“科学”是指黑格尔自己的逻辑学,“历史”是指整个哲学史。所谓科学上最初的东西一定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是说逻辑范畴展开的过程和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致的,也就是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是一致的。列宁对这个思想很重视。黑格尔把哲学发展史同他的逻辑范畴的推演联系起来,认为各种哲学思想的更替同范畴在逻辑体系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是一致的。《逻辑学》中最初的几个范畴是存在、无、变易。黑格尔认为,“存在”这个范畴在哲学史上最早出现于古希腊的埃利亚学派中,特别是巴门尼德的哲学中。巴门尼德首先提出,存在是唯一的、不动的;它既不能产生,也不能消灭。在黑格尔看来,巴门尼德把存在视为一切事物的基础,才算是真正达到了对存在的抽象理解,从而也才算是有了真正的哲学。逻辑学中的概念运动是从存在这个范畴开始的,与此相应,哲学思想的发展是从巴门尼德开始;逻辑学中的“存在”范畴就是代表哲

学史上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的。黑格尔认为“无”是佛教思想的最高原则,佛教达到了对“无”的抽象理解。他说:“在道家以及中国的佛教徒看来,绝对的原则,一切事物的起源、最后者、最高者乃是‘无’……这种‘无’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无或无物,而乃是被认作远离一切观念、一切对象,——也是单纯的、自身同一的、无规定的、抽象的统一。因此这‘无’同时也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叫做本质。”在黑格尔看来,逻辑学中“无”这个范畴是代表东方佛教思想的。存在和无的统一是变易。黑格尔认为“变易”是赫拉克利特哲学的根本原则。赫拉克利特提出,一切皆流,一切皆变,“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等等关于运动变化的对立统一思想。黑格尔说,赫拉克利特认识到了“存在和非存在只是没有真理的抽象,只有生成是第一个真理。”同样,黑格尔认为逻辑学中的“变易”这个范畴是代表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思想的。或者用更符合黑格尔的意思来说,那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东方的佛教思想和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不过是绝对观念在自我运动、自我认识的过程中,发展到存在、无、变易这些阶段的外在表现。

黑格尔认为,逻辑开始之处也就是真正的哲学史开始之处,按照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哲学史开始于爱利亚学派,或者确切地说,开始于巴门尼德的哲学。巴门尼德把“有”看成是“绝对”,并且认为只有“有”存在,而“无”是不存在的。巴门尼德说:“思想与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因你决不能遇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表达的存在物的。在存在物之外,决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也决不会有任何别的东西,因为命运已经把它固定在那不可分割而且不动的实体上。”黑格尔认为,巴门尼德的纯思维本身作为认识

的对象,因而把哲学提高到了思想的领域,所以应该把他的观点看成是哲学的真正开始。黑格尔的这种观点是和他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紧密相联的,应该说是哲学史的歪曲和臆造。

三、黑格尔在开端上对费希特的批判

在开端的问题上,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以绝对观念雏形姿态的“纯存在”开始,而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则从“自我”开始。为此,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针对费希特指出:“有一种独创的哲学开端,对它也不能完全不提,它在近来很著名,即以自我为开端,这种开端的由来,一部分是出于一切后继的东西都必须从最初的真的东西演绎而出这样的思考,一部分则出于最初的真的东西是一个已知的、尤其是一个直接确定的东西这样的需要……”^⑤黑格尔的心思是,费希特把自我作为哲学的开端,既出于演绎的需要,也出于他把最初的、真的东西(即本原)当成是已知的、直接确定的东西的需要。黑格尔赞成其前者,不赞成其后者。他认为,如果以自我作为哲学开端,那就必须对它加以提高和净化,即去掉它的具体性,真正成为抽象的自我。而费希特并没有做到这一点。黑格尔还提出,对抽象自我自身运动的认识,必须由它自身的内在必然性来说明,而不是主观的任意规定。费希特也没有做到这一点。黑格尔紧接着又进一步批判指出,费希特的自我是“没有这种客观的运动”。费希特把纯知规定为理智的直观,只能说明他在开端问题上的主观任意性和未能摆脱意识的经验状态(个人的感受,即偶然性状态)。黑格尔在《小逻辑》第86节里也不指名地批驳了费希特从自我开始,也就是说费希特从含有间接性的自我开始,不符合开端必须纯粹是直

接的要求。

具体地说,费希特的哲学从自我开端,自我首先建立他自身,然后从自我建立自己的对立面非我,非我就是自然界。因此,自然界成了“自我”的产物,也就是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看作是由主观的“自我”创造出来的,最后是“自我与非我的统一”,即“自我”与“非我”相互制约、相互限制。这是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三条基本原理。对于这种观点,黑格尔提出了两点批评:(一)自我是一个较高的范畴,不能作开端。(二)从自我建立非我,是纯粹主观的运动,而如果没有客观的运动,纯知识(即逻辑学)就会显得是一种任意的立场。这个批判是中肯的,可取的。列宁曾说过:“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益于唯物主义的。”黑格尔对费希特的批判就是其中的一例。唯物主义是从客观实在出发,认为一切思想、观念、理论、方案都是从客观实际中引伸出来的,不是主观自生的,更不是主观决定客观、创造客观。因此,黑格尔对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基础的批判,对唯物主义是有利的。当然,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的黑格尔是不可能真正了解客观运动的。黑格尔所说的“客观运动”其实就是他所谓的“客观思想”的运动,这同样是唯心主义的。

四、费尔巴哈及列宁对黑格尔开端说的批判

列宁注意黑格尔关于逻辑的开端的论述。具体说来,着重注意以下四点:(一)逻辑的开端是无前提的,因此它只能以毫无规定性的纯有作为开端。(二)认识的发展是由事情和本性的本性规定了的。这就是说,认识的发展是由思维本身的必然性造成的。列宁在摘记这一条的旁边写上“注意”二字。(三)开端包

含着有与无的统一。(四)从非有到有。以上四点,单独来看都包含着一定的合理思想或者辩证因素。比如,黑格尔认为逻辑的开端只能是纯存在,这才符合“事物的本性和内容”。列宁在旁边划了七条线并写上“注意”二字,这说明列宁对此十分重视。在列宁看来,从存在开始是符合人类认识的历史和认识的规律的。列宁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个范畴与存在相当。他说《资本论》的分析“开始是最简单的、普通的、常见的、直接的‘存在’:个别的商品(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⑥在他看来,黑格尔关于逻辑开端的思想体现了逻辑学和认识论的一致。但是,黑格尔关于逻辑开端的整个看法却是神秘的唯心主义的。

费尔巴哈在《黑格尔哲学批判》里,对黑格尔以纯有作为逻辑学的开端的思想,也作了详细、尖锐的批判,他用一连串反问来反驳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他说:“它从纯粹的存在开始;它不从任何特殊的开端开始,而从纯粹未规定的东西,从开端本身开始……可是我正要问:人为什么一般地要有这样一个开端呢?难道开端的概念不再是一个批判的对象,难道它是直接真实并普遍有效的吗?为什么我就不能在开始的时候抛弃开端的概念,为什么我就不能直接以现实的东西为依据呢?黑格尔是从存在开始,也就是说,是从存在的概念或抽象的存在开始,为什么我就不能从存在本身,亦即从现实的存在开始呢?或者说,既然存在是被思维的,是逻辑的对象,把我直接引回到理性,那么,为什么不从理性开始呢?如果我从理性开始,难道是从前提开始吗?……可是就算我假定一个前提,既然我不管什么开端的问题,直接从现实的存在或理性开始进行哲学研究,那又有什么坏处呢?”这段话深刻地

揭露和批判了黑格尔在逻辑开端问题上的神秘观点。费尔巴哈的这些反问,处处都在揭露着黑格尔关于逻辑学开端的唯心主义实质。概括起来,费尔巴哈在这段话里主要谈了四点:(一)开端不是不可以分析的,因而不应作神秘的虚构,应该有它的真实内容;(二)作为真实的开端,不应从纯思开始,而应从现实的东西开始;(三)为什么不从存在本身开始,偏要从存在的抽象概念开始呢?(四)假如借口逻辑是以理性为对象的,那么,为什么不从理性开始呢?这样做岂不更好些吗?但是,也应指出,费尔巴哈却完全忽视了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论述中所包含的辩证法思想。

另外,黑格尔还论述了他在开端上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认为逻辑学的开端也是哲学史的开端。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如果说哲学思想是从巴门尼德开始的,那么,在巴门尼德之前就没有哲学,或者说没有真正的哲学。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即使按照黑格尔的理解或标准来看,只有对存在物达到抽象的理解时,才算是有了哲学,那么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阿那克西曼德把“无限”作为万物的本原,也就是对存在物的一种抽象理解。因此,黑格尔为了把他的范畴推演同哲学史联系起来,硬说哲学从巴门尼德开始,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同时黑格尔为把赫拉克利特哲学纳入自己的范畴体系,竟对他的观点作了篡改,他说:“用我的话来表达赫拉克利特的意思应说:绝对是有与无的统一。”这样,黑格尔就抽掉了赫拉克利特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基础,把唯心主义的绝对观念强加在赫拉克利特身上,完全歪曲了赫拉克利特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如果撇

开黑格尔这些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那么他把自己的逻辑范畴同哲学思想发展史联系起来,提出在科学上是最初的东西,也一定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可以说明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東西之间的一致,把逻辑的东西作为历史的東西的基础,把历史的東西看作是逻辑的东西的显现,这又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所以列宁说:“听起来很像唯物主义!”^⑦言外之意是说黑格尔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東西的一致,实际上是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一致、思维规律和存在规律的一致、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一致问题。所谓逻辑的东西就是理论体系的内在联系或理论的逻辑顺序;历史的東西包括客观事物本身的运动发展过程或规律和人类认识的发展史这两方面的内容。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是建立科学体系的根本原则,同时也是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

总之,黑格尔逻辑学的神秘的开端表明了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的实质,同时也体现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逻辑与历史的一致”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重大缺陷。黑格尔在开端问题上对费希特的批判有利于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是片面而深刻的。列宁的批判是辩证的。●

①参阅《小逻辑》第1.17节。

②参阅《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93页。

③哈利士:《黑格尔逻辑学》,第146-147页。

④⑤黑格尔:《逻辑学》上卷第52页,第61页。

⑥⑦参阅列宁:《哲学笔记》。

对史、地分离学术研究现状及其原因的反思

□ 蒋昭侠 曹诗图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湖北 宜昌 443002)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5-0059-05

很早以前,中外一些学者就进行了史地结合的学术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最显著的特点与优势是将空间与时间、主体与客体有机结合,注重人地关系的探讨,从而使研究具有较强的整合力与透视力,在学术上具有较高的境界与品位。尤其是在历史学的研究中,这种研究方法克服了仅仅从人类社会系统内部去研究历史发展的局限,用系统的方法去探讨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有机联系,探索左右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因的不可逆转性与可逆转性的辩证关系,在自然史的大背景下研究社会历史,在人地关系的原则中探析人类社会,具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高远学术境界。应该说,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是历史学或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正途。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史、地学术界似乎把这一优良传统抛弃了,曾经长期隐入“见人(史)不见地”和“见地不见人(史)”,主体与客体分离的研究误区。本文试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等角度对史地结合的问题进行一些阐释,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

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载体,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与舞台。社会历史的进程不能脱离人类在时空上所处的特定地理条件,历史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地理环境之中进行,并与之发生水乳交融的关系。正是由于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人类才在历史的长河中演出了一幕幕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异彩纷呈、有声有色的活剧。地理环境是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与地理之间有着血肉般的联系,这已被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所认识。

以原始社会而论,没有热带、亚热带丛林、没有第四纪冰期的降临、没有自然环境适度的变化,生物进化史上就不会产生“人猿相揖别”这一质的飞跃;没有自然灾变或环境的变迁,就不会产生古人类的迁徙,从而促使原始文明的交融与进化;没有自然界的压力,就不会促使社会的形成和生产力的进步。原始人类之所以联结形成社会,从根本原因来说,在于其与外部环境(主要是自然环境)相互作用中实现了自我保存和发展。而原始社会的生活资料、劳动资料都是直接来自地理环境。这一时期的人地关系基

本上是大自然主宰人类的命运,地理环境作用属主导地位。

以奴隶社会而论,四大文明古国的诞生与兴盛均具有特定的地理条件,即位于亚热带、暖温带地区和大河中下游流域。剩余产品的出现,私有制的产生,均离不开特定的地理背景。一些古典文明(如古埃及、哈拉帕、巴比伦、玛雅等古典文明)的兴衰更直接与气候的变迁和生态环境的变异息息相关。

以封建社会而论,游牧民族的几次大规模南侵,草原与农耕两大纬向地带的地域分异所形成的巨大经济、文化反差,地理是其基础,而气候变迁则是其天然动力。农民起义在时空上亦有一定地理规律可循,如我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北方多于南方且多发生在严重自然灾害之年;历史上的屡次南北抗衡多以北胜南告终,显然与地理背景的伟力作用有关;中华文明东移南迁与这一时期中纬度地带自然环境的变迁密切联系;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外封闭、内活跃”,地理条件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以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而论,资本主义最先在地中海沿岸萌芽,继而在西欧临海国家或地区开花结果,显然与这一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开放的地理环境以及丰富的“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等地理条件有关。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则对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地理环境的开发或封闭程度的不同,区位条件的优劣,自然资源的差异,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工商文明在欧洲各地产生的时间先后不同。

最后就现代社会的发展而言,澳大利亚之所以畜牧业与工矿业发达而被称为“骑在羊背上和坐在矿车里的国家”,日本之所以成为外向型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当今世界上的东

西差异、南北矛盾以及普遍存在着的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经济发达的规律等,都离不开特定地理条件的影响与制约。在未来的后工业化阶段或生态文明社会时期,生态环境质量及区位条件、资源因素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无疑会更为显著。当今及未来社会发展的指针——“可持续发展理论”则是环境反馈作用及人类对自然反思的产物。

古今中外的一些学者对地理环境的重要作用 and 史地之间的密切关系亦不乏正确认识与精辟论述。例如:我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学研究中非常重视自然环境作用与人地关系,他治学有一句名言,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认为:“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谈史者所最当留意也”;“史迹为之物,必与当时,此地两观念相结合,然后有评价可言”;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美)许倬云认为:“地理环境不仅能决定古文明的发展方向,也能影响后期文明的发展”;等等。外国学者关于地理环境作用和史地关系的研究比中国更多,论述也更为明确。例如,康德认为:“地理乃历史之基础”、“地理是静止的历史,历史是变动的地理”;洛克指出:“地理与历史之关系,一如肉体之精神。有健全之肉体,然后活泼精神生焉。有适宜之地理,然后文明之历史出焉”;普列汉诺夫则认为:“历史学科的首要任务是研究人为环境(即被人工改造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研究它的起源和变化。”恩格斯在研究爱尔兰的历史时,首先是从地理环境入手,再进入社会历史与经济的考察。近年世界公认的历史学中的新兴学派——年鉴学派与生态学派,在研究历史方面继承了维达尔的地理学人地观,都主张把历史现象放在一定时空范围加以考察和理解,拓展和

深化了史学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认识到,史地两学科密不可分,合则皆兴,离则两伤。

我们认为,地理环境作用始终应该是历史学与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某种角度上讲,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质上是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含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及其相互制约的社会内部关系问题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离开了地理环境就不可能科学而全面地说明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只有了解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及其具体作用,才能正确而全面地了解历史、文化的衍生背景及其形成机制,才能发现历史事象的某些奥秘。历史学和人文地理学中的诸多疑案也只有史、地两个学科的工作者携手攻关才能较好解决。对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作自然——人文因素综合考察的方法,理应是历史学以及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正途。

二、对史地分离学术研究现状及其原因的反思

长期以来,许多历史学家或历史理论家都将历史理解或界定为回忆传统和重大历史事件,而看不到历史的基础在于人化自然的创造,(见张尚仁《社会历史哲学引论》,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97页)置地理环境的重大作用于不顾。特别是我国史学界曾深受“左”的思潮的影响,把人类的历史完全写成为一部阶级斗争史,尤其轻视地理背景的作用及人地关系,极少“究天人之际”,这种状况至今仍没有多大改变。翻开我国汗牛充栋的历史专著与教科书,很难发现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地理背景或地理环境作用的论述,这种重主观轻客观、重人轻地的学术风格乃至地理虚无主义的倾向十分明显,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史学研究大相径庭。笔者近期阅读了(美)L·S

·斯塔夫里阿诺期的《远古以来人类生命线——一部新的世界史》,颇有感慨,作者打破了以人物和事件为中心叙述历史的传统,选取了自古到今始终与人类生命线生死攸关的四条“生命线”(生态环境、两性关系、社会关系、战争)展开分析,书中对地理背景、生态环境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非常重视,读之令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目前国外史学界正日益重视地域性研究和人地关系的探讨,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近年港台学者在史学和文化的研究中也有明显的史地结合的倾向。但我国内地不少学者至今仍把对社会历史发展产生很大作用的地理因素的研究视为禁区,有的甚至非常忌讳对地理环境作用的探讨,倘若有人用地理环境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或从地理角度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原因,很容易被扣上“地理环境决定论”或“唯心主义”的帽子,从而遭到各种指责与非议,甚至引起风波。这使很多学者对此心有余悸或“心有预悸”,很不愿意涉及这类似乎是敏感且易被误解的论题。特别是“自从对《河殇》和类似的作品进行批判后,研究和讨论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 响似乎成了禁区,好像一谈到地理环境就是别有用心,强调地理环境的作用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见葛剑雄《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 响》,《复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6期52页)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很不正常和对学术研究有害的。笔者很同意葛剑雄先生的观点,即我们不能因《河殇》而因噎废食,放弃对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关系的研究。千百年来的唯心史观“把人对自然界的 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4页)我们认为,不承认

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的重要作用,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但愿我国学术界的某些同志不要重蹈“把地理环境逐出社会历史”这一唯心史观的覆辙。至于少数同志认为将地理纳入历史、文化的研究是一种过进而肤浅的做法,笔者认为更是荒谬和幼稚可笑的。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许多奥秘还有待人们去探索,社会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个永不过时且常论常新的课题,人地关系的研究将贯穿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如果我国的史学研究仍只注重从社会内部原因(如生产关系的变革、社会制度的变化等)去进行分析,而对人类社会的外部环境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地理背景避而不谈,那么对史学中的许多问题就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圆满的回答,有些甚至会成为无法破译的“密码”。

至于地理学界,由于过去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文地理的误解、批判,“左”的思想的禁锢比史学界更深,更没有人愿意涉及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作用的研究,学术思想更不够开放。例如,关于斯大林的“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作用”理论中的非科学观点,哲学界、史学界早已进行了反思,地理学界却不敢越雷池一步,有些人至今仍将其理论观点奉为经典和法宝,一些地理期刊一直拒绝刊登这方面反思性的文章,担心引发不必要的风波。又如关于“地缘”这一术语,外界提出许久,地理学界才敢提起。有的地理学者曾指出:“当一些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的学术思想大大开放的时候,作为综合性的地理科学的思想好像还在收缩。这种现状颇令人困惑、令人费解。”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也曾对我国地理学的保守状况发表过感慨,他没有料到“地理界同志受旧观念、

旧思想束缚太深”。(见钱学森等著《论地理科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第281页)这里尤需指出的是,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优势学科历史地理学,理应很好地体现史地结合的研究特色,但却一直局限于对地理事物历史演变的探微考证,而极少对社会历史发展及重大历史事件作宏观上的地理探析。恕笔者直言,目前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名称中的“历史”二字基本上只具有“时间”(或“沿革”)一词的含义,就其研究现状来看,基本上还只是属于“时间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与“历史”二字不够贴近。就历史学科名称的科学命名或确切理解而言,笔者认为其主要方向应该是从地理学角度去研究历史(正如文化地理学主要是从地理学角度研究文化,经济地理学主要是从地理学角度研究经济等一样。几乎所有的地理分支学科都可以按其学科名称的偏正结构去理解,而唯独历史地理学例外)。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现实的历史地理学走的不是由地理研究社会历史这一条道路。至于其它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则更少体现史地结合研究。

造成上述忽视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关系的研究以及“史地分离”这种学术状况的原因较为复杂,我们认为主要原因还是与过去“左”的思想残余尚未肃清有关,与昔日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批判的偏颇以及斯大林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理论认识中的非科学观点的影响有关。笔者十分赞同著名史学家冯天瑜先生的观点,即“我们的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必须注重对地理环境的考察。那种一涉及地理环境影响历史文化进程和风格,就被斥之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作法,是全然不可取的,乃是斯大林在三、四十年代的苏联造成的一种不良学风。今天,在

这个问题上有必要复归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观点,既高度重视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又扬弃地理环境决定论,坚持文化生成的主体客体辩证统一的观点。”(冯天瑜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8 月第一版,第 28 页)总之,无论是历史学的研究,还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于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关系的探析应该大大加强,决不能囿于“左”的思想束缚而却步不前!

近年我国史、地学术界在这方面已开始出现一定的转机和好的苗头,少数思想开放、学术观点新颖的有关社会发展、中国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成果已开始出现。如冯天瑜先生等著的《中华文化史》中的上编“文化生态”部分,以大量篇幅深入探讨了中华历史文化物质及其形成发展的地理背景与生态机制,读之令人耳目一新;王会昌先生的《中国文化地理》,以地理环境变迁为经,社会文化发展为纬,系统探讨了中华历史文化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形成、发展和文化中心转移的过程与规律,从地理学的角度阐释了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诸多疑案,该书深受学术界的好评。近期,王先生的又一部力作《世界古典文明兴衰与地理变迁》已经面世。以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社会发展地理学”在我国已经诞生,具有代表性的专著《社会发展地理学概论》出版后受到许多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和广大读者的欢迎,并荣获中南地区优秀图书出版一等奖,学术成果被

众多著作引用。更令人高兴的是目前非常畅销的《人文中国》、《南北春秋》、《东西论衡》等大型系列丛书中,都有大量有关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影响作用的论述并将其摆在重要地位。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学术研究也开始形成气候,如近年复旦大学曾组织召开“地理环境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交流了一些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有的历史地理学者已开始调整研究方向,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方面。我国一些学术期刊亦曾零星刊载对地理环境作用认识方面的讨论性文章。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有些可贵的成果却遭到非议,甚至引起风波,有些试图在这方面进行深度研究的学者因疑虑和预悸而忍痛割爱。有的刊物曾开辟栏目试图对地理环境作用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后因怕担风险和某些原因而终断,大多只开了个头便草草收场。总的来讲,有关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目前虽然取得可喜的学术成果,但仍在不良的学术氛围中艰难跋涉。

地理环境的作用是一个古老而又常青并无法回避的论题,只要人类社会的运作没有终止,人类就不可避免地要同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发生复杂的交互作用。因此,史地学术界应对这一切关宏旨的问题予以重视。有关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关系的研究和史地结合的学术研究方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优良的传统,我们应很好地继承并发扬光大,以使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不断推陈出新。●

责任编辑:郭秀文

从《西安历史地图集》看史、地的结合

□ 曾昭璇¹ 曾 新² 曾宪珊³

(1.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31; 2. 广州市方志办副研究员, 广东 广州 510091; 3. 广州青年培训学院讲师, 广东 广州 510630)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5-0064-03

我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历史名城和古都很多。怎样才能使人们了解及继承、发扬我国古都名城的光辉历史文化呢? 《西安历史地图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该书是由西安地图出版社于 1996 年印行的, 由著名历史地理学者史念海教授主编, 由陕西师大、西北大学、西安联合师院、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等单位的 20 多位专家合作编成。地图集中英文编写, 共收地图 89 幅, 说明 89 幅, 彩色照片 89 幅, 基本反映出各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演变, 历代的主要遗址、政区设置、乡里的分布及周、秦、西汉、隋、唐国都都城布局及重要的宫苑、陵墓的分布, 五代至民国时期的城区和郊区, 建国后西安城市建设的发展和政区的演变等等。用地图方式形象地复原了西安市区和关中地区的各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及其演变过程。资料丰富且深入浅出, 对今后西安市历史、考古、文物、地理、水利、城建、规划、旅游等各方面均有重大参考价值, 是历史地理学与地图学结合后取得的新成果。从地图学来看, 该图集有以下特色和创新:

1. 对自然地理的重视。

重视自然地理是现代历史地图中的

一大特色, 是国际上编辑历史地图集的新趋势。但一般的历史地图集是不重视自然地理图的, 或者干脆不要。而《西安历史地图集》中, 却有一组“自然环境图”(4 幅)。《图集》选取了新石器、西周、西汉、唐四期制图, 亦即顺自然环境变迁而确定。仰韶期气候温暖, 是全新世中期的“气候最适宜期”, 西安有水獭、竹鼠、貉等亚热带动物生长, 气候暖于今天可达 3℃(年平均); 西周已入于“龙山冷干”的暖温带气候, 情况与今天相似。仰韶温暖时期所广布的竹林, 此时已消失; 西汉气候为和暖期, 渭河平原上竹林又再繁生。彩照采用了秦岭、神禾塬、关中平原三帧, 反映出西安市区自然环境的基本特色。

2. 西周图组反映了中国历史的悠久。

西周图组的选择也是该《图集》特色之一。西安是三千年前西周朝定都的地方。该《图集》选定四幅, 反映了周人在西安市区的兴起、发起和迁移的过程。周原是西周的发祥地, 是皇朝都邑所在, 考古及文物均为我国重点地区, 西周皇室宗庙也发掘出来, 作者曾考察部分遗址, 发现这些遗址都被一层厚 1.2—1.4

米的黄土层埋没。下面除房屋建筑外,还有一层黑淤泥层,都是周朝和缓沼泽、河道地面,即《诗经》所记“猗与漆、沮,潜有多鱼”(周颂·潜)、“周原既既,萁茶如飴”(大雅·绵)的自然环境。后为黄土披覆,近被切蚀成峡谷,破坏了平坦原面。《图集》各图即具体标出其详细地点,很有研究价值。

彩图选择了宗庙和具有长铭文的史墙盘两幅。从宗庙照片中可见我国正堂式屋和三进制的建筑形式已在周原上建立了。史墙盘文字达 270 字,可见当时文化水平之高。

3. 秦代图组反映我国文化的高度发展。

西安是强秦兴起基地,本组六幅图最突出的是秦始皇陵图。兵马俑坑、马厩坑群、长方形陵区图、石料加工场、修陵人墓地、北面官邸、窝棚区、挡水堤等各结构部分,该图都有明确显示,即目前考古发掘的成果,基本上已用地图方法标明。不明性质的遗址、附葬坑(铜车马坑、双门道马厩坑、曲尺形马厩坑、珍禽异兽坑、祭祀坑等)及 17 座陪葬墓等,亦一一标于图上,可帮助游客、研究者了解秦始皇陵的结构,能“按图索骥”了。

此外,“秦咸阳城图”也很精彩,如在城北兴建的仿六国宫等已由考古发掘证明存在。由渭河北迁而侵蚀去的咸阳本区亦用浅绿色范围表明。渭河南岸的宫苑区亦有考古发掘为证,找出的阿房宫、前殿、广场、章台、甘泉、信宫(极庙)、兴乐宫等地点亦一一记在图上,堪称佳品。彩色照片则选用了两幅,即阿房宫前殿遗址和咸阳市遗址。

4. 西汉图组反映我国强大的景象。

西汉是我国最强大时期,故本组图多达九幅。如长安城图,它的科学性表现为把考古成果和文献分析分别绘出,

成为两幅,利便比较。考古证据说明未央宫、长乐宫、桂宫、东市、西市、九庙、社稷、辟雍基本上可互相引证。但建章宫则考古出来面积较小,文献记载一般比考古成绩要详细。一些具体宫殿和单位,已由考古工作发现,但记载不详(如地点、名称等),如后宫、中央官署遗址、椒房殿遗址、西南角楼遗址等。

西汉国力强盛亦可由宫观苑囿分布图显示出来,在渭水各地包括平原和两侧山区,都有分布。如南郊的由 36 小苑组成的上林苑,以昆明湖为中心,占地达 10 平方公里。北岸的甘泉苑周围更达 270 公里。以周长 9.5 公里甘泉宫为中心,为汉代夏宫。沿函谷大道(东去)和陇右大道(西去)还有大批宫室。

最有特色的是西汉陵墓分布图,它把记录及考古学研究成果,一一体现在图上,非常直观。如集中于渭河北一带有英陵(李夫人)、茂陵(武帝)、平陵(昭帝)、上官皇后陵、延陵(成帝)、班婕妤墓、康陵(平帝)等;南岸山坡上由西而东有樊哙墓、少陵(许皇后)、丙吉墓、杜陵(宣帝)、王皇后陵等,一字排开,成为突出的陵墓景观。其中杜陵与茂陵更有专图。文物则选“马踏匈奴”石雕,随葬品选鎏花马,建筑物选朱雀纹。字纹瓦当也有代表性,如字纹瓦当中的文字“千秋万岁”等,字型介于篆隶之间,能与图组一起形象地说明问题。茂陵专图中充分反映考古学的成就,如文物出土地点、陪葬墓位置皆能一一标出,为各地考古图件之精美者。

5. 隋大兴城反映了长安的新建。

隋代图组 2 幅以大兴城图为特色,它反映六朝长安城的迁移,为我国方格状古都名城规划的开始。这座于 582 年建成的新都标位于长安城东南 10 公里处,分北部宫城、南面皇城(官衙、宗庙所

在),东、西、南三面为外廓城,包绕宫城和皇城。宫城与皇城之间为一阔宽大街,向东西通过两边外廓城,直达城外,为全城东西主街,但已略狭。由宫城南大兴门南下亦为一直街,分皇城为二,并向南伸出外廓城,直出城外,亦为城内主街,略狭于宫城南大街。皇城南有一东西主街,东西横贯全城。宫城和皇城东西两侧亦有贯通南北的全城大街,组成东西二、南北三的正交大街系统。此外,外廓城的東西两市(利人市、都会市)有由大街围成的方块市场。

全城街道系统除宫城外,大街和街构成十字系统道路,东西向 12 条(包大小街),南北向 9 条(包大小街),把全城分为 130 块长方形市区,因东南角一块建为芙蓉园,故市区只有 129 块,呈整齐长方形。它吸收了先秦都城的规制并有所创新,今全国各大名城多效之。今在地图上全面反映出来,特色甚显。

6. 唐代图组反映我国的强盛富饶。

唐代图组共 18 幅,能全面反映中国唐代历史文化的精粹。

大明宫图是用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分两幅绘制,太极宫图资料详确,可见考古成绩比隋大兴城深入。兴庆宫本隋隆庆坊地,武后赐为“五王子宅”,后李隆基由王称帝,改为此宫。彩照配上沉香亭景色,很可反映当日兴庆宫壮丽建筑一端。

《唐代图组》还有住宅分布图,据图例有:改寺观前住宅、年代未定住宅、前期住宅、后期住宅、前期和后期无确址住宅等 6 种。已考订出的住宅有:左春坊、家令寺、四方馆、右春坊、率更寺、左清道率府、左内率府、左监门率府、东宫朝堂等 174 处。该图还配有说明文字,补充了资料的不足。

《商业及娱乐场所图》是《图集》中唐代图中的特色之一。这种地图即使在现在的地图上也很少见(商业地图除外),历史地图上更少见。图上記有旅邸(12 家)、鞠场 6 家、戏场(3 家)、巨商宅,此外还有鱼、酒、茶、乐器、毡、饼店(2 家)、车店(2 家)、珠宝、弩店等。东市、西市各用专图表示,内载行业 27 行,以纺织业为主,并有胡商、胡姬酒肆等,市分九坊,各有专业,在说明中则指出两市共有 220 行。

寺观图也很有特色。寺、观、塔等分布计 160 所(隋代留下观 6 所,寺 76 所)。大寺可占一坊,如大兴善寺占靖善坊,昊天观占保宁坊,大总持寺和大庄严寺合分和平、永阳二坊等,面积有 25.5 万平方米,可见唐代佛、道之盛。

唐代陵墓图组分成 3 幅。总图显示出陵区分布比汉代还大,并另绘了昭陵和乾陵两图,突出唐陵特点。自乾县向东至蒲城县,长 200 多里,为“关中十八陵”,高大雄壮;陪葬陵更多(昭陵陪葬墓 188 座,乾陵为 17 座),为我国独特的陵墓景观,旅游热点。

7. 五代的“新城”图。

五代“新城”是朱温迁都洛阳后由韩建在皇城废墟重建的小城,只有长安城之 1/16,以利防守。自是以后,长安改为地方行政中心,为今天西安城的基础。“新城”东西并建二小城。此格局历宋、元不变,明代只改城南门与北门直连,并于 1380 年建钟楼、鼓楼,至今仍存。明清以后已有地时地图参考,亦较各朝为详细了。清代西安四面城门已发展成为市区,成为今天西安市区扩大的基础。



责任编辑:郭秀文

略论广东商帮商人资本的发展趋势

□肖茂盛

(广州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广东 广州 510210)

(中图分类号)F8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5-0067-05

随着广东商帮的发展,商业资本也不断积累与增殖,并从流通领域流向其他领域,发展成为产业资本、土地资本、高利贷资本、官僚资本和宗族资产。现分述如下:

一、与手工业生产结合成为产业资本

明中叶以后,广东商帮的商业资本已经开始有一小部分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与手工业生产相结合。在城市和一些城镇中,出现了一些商人直接投资和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新现象。例如正统七年(1442)南海商人聂天根把商业资本投资于纺织业中。其家谱记载:“四世祖天根……流贾于厓门水滨,……后以纺织为业,勤俭成家……。”^①嘉靖年间,佛山冶铁作坊主李壮(号同野)生产出大量产品后,“挟巨资遨游吴楚”,一时成为巨富,“海内莫不知有同野公”。^②商人麦宗泰的父亲曾以经商为业,到他这一代,则经营冶铁业。其家谱说他“性好货殖蓄财,……宗泰是以创立炉冶之艺。”^③明末清初,新会商人卢从庵、卢鞭人也到佛山从事冶铁生产,“讲求冶生,业钢铁于佛山,善计然求,驯致小康……到崇祯初……贵雄于一方。”^④顺治年间,石湾业陶者“陶成则运于四方,易粟以糊其口。”^⑤乾隆年间,以“业自鸣钟”起家的潘松轩,也积资颇裕,以至“有贾商积负至数千元无以催,公辄注销记籍不

问。”^⑥从顺治到道光年间,“以车模铸冶为业”的黄氏一族,如黄龙文先以经商为业,后到佛山经营冶铁,到其子黄妙科当家时,已是“积有千金”^⑦的作坊主了。

众所周知,明清珠江三角洲冶铁业、陶瓷业等较大生产部门能容纳较多的资本,为商人资本转向产业资本提供了可能。但是,能否实现这个转化,取决于产业利润率的高低。清代佛山商人利润率通常为100%,例如乾隆年间廖介然“高于汉阳,或经年始一归,所获倍利。”^⑧道光年间,陈善性在佛山经营薄荷油生意,获利亦倍蓰。^⑨而产业利润则更高,乾隆十五年(1750),佛山炒铁业“盖利与同人,其获三倍”,^⑩利润高达300%。追逐高额利润成为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的根本动因。广东商人把资本投资于本地区(镇)的产业和矿业,这是当时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孕育出来的新经济因素。

广东商人资本与手工业结合成为产业资本的途径有二:(1)直接开办手工业作坊和矿山山场。明清两代,投资冶铁业的佛山商人较多,见于记载的就有隆庆年间投资高书矿山的洗林估,^⑪清初投资本镇冶铁业的麦念居和冯绍裘的祖辈,康熙年间既从事本镇冶铁又投资外地矿山的黄金发、黄宝阶等人。^⑫康熙年间投资于纺织业的梁俊伟,其“梁伟号”织机房,

“诚实著闻,商业遂振”,^⑬其机房历康、雍、乾、嘉四代而不衰,道光九年(1829)仍由其后人继承。(2)承担包买商的额外业务,直接控制某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佛山铁矿业从入清以来就是以商人发炭铁原料给附近乡民(俗称“替铁者”),乡民打制成铁器交给商人的方式生产。^⑭据口碑材料:乾隆年间有叫住应、住佛两兄弟是著名的机房大户,开铺于佛山安乐里,拥有大量“外机”(即本镇和附近乡村的织产),可见,住氏兄弟也是大包买商。随着佛山商营作坊的不断发展扩大,逐渐出现了手工作坊。《广东新语》对佛山的炒铁业有这样的记载:“炒铁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一肆数十砧,一砧有十余人。”^⑮如果我们把一肆算 30 砧,一砧算 15 人,就有 450 人。偌大的生产规模,决非作坊式生产所能包容,其生产具有手工场的规模是肯定的。

二、与土地结合成为土地资本

明清时期,以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经济结构依然存在,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生产形式中仍占统治地位。当时,广东商帮经商所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与土地结合,转化为土地资本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如正统七年(1442)南海商人聂烟波在经商获利后,就购买土地,“于是田园倍增,手扩租无算。”^⑯正统年间中山小榄镇大商人何图源致富后,在小榄周围买土地二万余亩,收采成千上万石计的租谷。^⑰嘉靖十四年(1535),顺德商人龙翠云乘土地兼并日盛之机,“商业因之歇业,仅留自置田产八十余顷。”^⑱明末,番禺沙湾商人何叔运捐买族田 50 余顷。^⑲顺治年间香山海商朱殿郎“起家产业十余亩,隆养双亲。”^⑳康熙年间中山小榄商人何世宁开酒店、米店经商赚钱购土地 17 顷和几十亩基塘。^㉑道光年间南海商人潘宽怀“既乃筑广厦,置田园”。^㉒道咸年间中山小榄何品益到 64 岁时,有土地 60 余顷。^㉓咸丰年间顺德商人吴敏购田种桑。^㉔同年间顺德商人梁炜买田 320 亩。^㉕宣统二年(1910)中山商人

韦必达,买田十多亩。^㉖

以上商人资本与土地结合转化为土地资本的事实说明:

(1)商品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商人以求田问舍仍然有着浓厚的兴趣。有的学者曾认为,明嘉靖以后商人对于购买土地的兴趣降低转而热衷于手工业的经营,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从广东商人资本的转化史实看,商人经商赢利后热衷购买土地,是商人资本转移的一个重要方面。

(2)由于商人活动不受地域限制,所以往往出现跨县、跨省购买土地的情形。例如番禺商人林大楸到广西贵县买地等。这些商人便成为寄庄地主。

(3)商人购地投资主要目的是榨取封建地租,而不是资本主义方式的土地经营。从广东商帮的发展史看,商人购买土地后,并没有成为“农场主”,而是商人兼地主。如中山小榄的何图源,广州十三行的伍秉鉴、潘正炜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又是大地主。

什么原因使广东商人购地成风,商人资本与土地相结合转为土地资本呢?

第一,土地财产“不忧水火,不忧盗贼”,风险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商确实能获得高额利润,迅速致富,但风险较大。万历时刘升认为“富商大贾,算及纤毫;穴金则有窃发之虞,怀璧则有戕身之累,唯有买田广土,无水火盗贼之忧。”^㉗所以,当时的人积财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置田宅,长子孙,为室家计。”^㉘于是商人增加财产,“自当以田地为上”了。

第二,土地能给商人带来高额地租收入。商人购买土地的主要目的是坐收地租,而明清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地租率一般是在 50% 以上。所谓“佃户就主贷田而耕,岁晚所得之半归之。”^㉙根据叶显恩同志的研究,以族田为例,明初每亩租谷为二石四斗(500 斤),沙田每亩 30 斤。此外,还有预租、押租、批头租等额外剥削,其中押租一般为租额的 20%。清中叶,番禺沙湾何族田的地租率甚至高达 70%—

80%。^⑩所以,只要占有较多的土地,就可以获得大量的地租收入,拥有更多的财富。

第三,明清封建统治者奉行“重农抑末”政策,把主要的手工业收归官府经营,对私人的手工业严加限制。以民营冶铁、铸铁为例,嘉靖三十四年(1555),广东布政司对民营冶铁规定“每处只许一炉,多不过五十人”。商人开矿冶炼须由官府批准,发给执照才能营业。“若有多聚炉厂及别省人称首者,即便拿获,钉解所在官司,以重治罪。”^⑪此外,还不断增加矿税。嘉靖三十八年(1559)每炉纳银10两,不久增加税银5两,即增税50%。^⑫铁课税达到20%—30%,铁炉纷纷倒闭。如乾隆年间,佛山铸铁业有130炉户,到光绪二年(1876)剩下40家,^⑬光绪九年(1883)剩下33家,^⑭光绪十四年(1888),仅剩下20多家。^⑮因此,商人不愿扩大手工业生产,便把资本投向土地。

第四,封建宗法势力强大,影响和阻碍商业资本大规模向产业资本转化。虽然广东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发达,但封建宗法势力也十分强大,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一方面是乡族集团拥有相当数量的陶瓷、冶铁等手工业作坊和铺舍、墟场等;另一方面乡族集团又对族众(包括同宗商人)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直接干预,用具有族法效力的家规宗法来束缚他们的经济活动。如石湾《霍氏崇本堂族谱》明确规定:“不可学制炼硝磺火药火炮”,“不可去入窑砌砖,去挑砖入窑,及去樵山抬石,番禺等处入穴挑煤”等等。这些规定是以关心爱护族众为幌子,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官府“重本抑末”政策所起不到的作用。

由于以上原因,加上明清土地自由买卖之风日盛,以及“雇工不如坐吃地租”的封建思想的影响,致使广东商人不能摆脱与土地相结合的传统倾向,使得资本积累受到很大的限制,大量的商业资本无法直接转化为产业资本。

三、与高利贷结合成为高利贷资本

广东商帮高利贷资本崛起于清代,较之徽商、晋商,为时稍晚,但发展迅速。嘉庆之后,

广东的典税收入已常列榜首,而由广东商人资本所转化的高利贷资本是明清高利贷资本的主要来源。

在封建社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本是一位一体的,地租、商业利润、利息,互相转化,循环不息。他们不仅私放钱债,就是巨大的典当也几乎为他们所把持,并作大宗的信用借贷。嘉庆二十二年(1817),顺德县商人何朝钰在佛山开中泰银店,店伙梁津昌暗中挪用10800两银,查帐时,谎称已经出货,可见其借贷营运资本之大。^⑯有的鱼商设有“鱼栏”垄断鱼的销售,兼营发放钱债。渔民出海所需工钱食用等费“均须向鱼栏息借”。船归,则将鱼交售“鱼栏”。^⑰有的商人墟头设当押店,墟尾设粮麸、杂货店。农民从其押店得到的押金,用来购买其杂货店的粮麸、杂货。收获后,农民又将农产品压价售给他,得到的现款用来赎回押物,^⑱以此循环剥削农民。有的商店则兼营借贷。南海县西樵黎物明“在本乡设店售沽酒米……遇告贷钱银者,亦必概然与之。”^⑲还有同治、光绪年间的张龚华,“与贷者积至四十万金”,^⑳可见其投入高利贷资本之巨。在这里,商人资本与高利贷完全融为一体。

四、与政治势力结合成为官僚资本

广东商帮从事商业活动发迹以后,往往步入仕途成为官僚地主,从而导致商人资本与政治势力结合而成官僚资本。

如冼氏宗族^㉑在宋咸淳末由南雄迁居南海县扶南堡(离佛山20里),明初始迁居佛山鹤园里。由于家业渐起,数代之后,政治上发迹起来,成为明清时期控制佛山冶铁业的巨族。霍姓中的一支从邻近的石头迁来,原系寒族,以孵鸭为业,景泰(1450—1459)年间,其先祖“昼则鬻布于市,暇则作扇,市取值以起家”。^㉒正德九年(1514),霍韬登殿试二甲第一名,官至户部右侍郎、礼部尚书。霍氏也因而“气焰煊赫”,佛山经济命脉一度为其所控制。霍韬的儿子与暇也不得不承认,在其父官吏部时,“若佛山铁炭,若苍梧木植,若诸县盐鹺,稍

一启口,立致富羨。”^{④③}霍韬之后,这一家族科举蝉联,成为一方望族。李氏始祖广成,明初从邻近的里水迁居佛山细巷铺,因“得铁冶之法于里水,由是世禔其业。”嘉靖、万历时,这一家族的李同野(李待问的祖父),“因子姓繁夥,合室而爨六十余人。”因享有富名而招妒,幸得某“贤绅怜而身翼之”方免遭害。^{④④}万历十二年(1904),李待问中进士,历官至户部右侍郎总督漕运。从此,这一家族官运亨通,成为佛山之名族。^{④⑤}清代的佛山梁俊伟,“康熙间来佛创立机房,名梁伟号,因家焉。……商业遂振……至今子姓繁衍,科甲继起。”^{④⑥}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先后操纵佛山经济的洗、霍、李、梁等旺族,都是先致富,后取得政治上的特权,完成了由商人资本向官僚资本的过渡,由商人转化为官僚地主。

五、与宗法势力结合成为宗族资产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虽然已相当发达,但肇于汴宋的^{④⑦}宗法势力到明中叶亦相当强大,因此商人资本往往与宗法势力相结合转化为宗族资产,其主要形式是购买土地变为族田。

族田被视为“祖垆可保,祠宇可守,达居宗人所由会聚,一脉联固,气魄雄壮,未许外人轻生窥侮”的物质条件。“堂产的厚薄,乎族运的盛衰。”^{④⑧}而族田的相当一部分是由商人、富户捐赠。如明万历朝户部右侍郎李待问致仕归故里佛山后,与族老合资购买族田1顷90亩,“又置书田八十五亩”,以作子孙之力学者膏火之资。^{④⑨}东莞张祚恒于康熙四十年(1701)将自置田55亩(每年租银21两)捐赠为祠田。^{④⑩}顺德龙锡恩根据其父遗嘱,“送出田一顷六十二亩有奇,以为赡族之田,设立敬宗会名,每年收取租银分送阖族鳏寡孤独恤费。”^{④⑪}番禺县张殿铨在广州“城西十三行街创办隆红茶行,贸易致富”之后,便“独立修葺祖祠,并置堂田。”^{④⑫}咸丰时顺德商人梁炜在江西、江苏经商致富后,也把商人资本一部分用以“建祠堂产,……为义祠祀费。”^{④⑬}也有的宗族在族绅的倡议下,由商人、富户带头认捐,族众各力捐资购

买。如东莞员岗何真于明初除“置私田百余顷为义田”外,还“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祠其祖。”^{④⑭}

在珠江三角洲,各个宗族,除了有数量不等的族田外,还有铺舍、码头、瓦窑、墟肆等族产。所收得的祖堂银均可用来“放债生息”。族产未丰的宗族,则发动族人捐银,用来“生息裕堂”。如顺德《黄氏族谱》记载:乾隆九年甲子岁二月初一吉日,岭芝堂四房子孙等共议,捐得“银三百五十两司码,每年一分二算息,自甲子至癸酉共止十年,共长利息一千零八十七两二分八厘。”^{④⑮}利息已为本银的三倍。

由于宗法势力不断强大,广东佛山等地的经济日渐蒙上宗法色彩,宗法势力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也日益加剧。从明至清,各名宗巨族及由他们组合的乡族集团,愈来愈加强对主要经济部门各个行业的控制。如佛山的洗、霍、李、陈等巨族都先后长期插足于铁冶业、陶冶业等。这些名族的显贵者,是村宗族的族长、族绅,也是佛山乡族集团的成员,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往往通过宗族产业来干预佛山的经济。如嘉靖八年(1530)成书的《霍谓家训》中写道:“凡石湾窑冶佛山炭铁、登州木植,可以便民同利者,司货者掌之。年一人司窑冶,一人司炭铁、一人司木植,岁入利市,报于司货者,司货者经岁咨禀家长,以知功最。”^{④⑯}霍氏家族的“家长”通过所拥有的陶冶、炭铁、木植,以及其它“便民同利”的产业来干预商业经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控制佛山经济的作用。

商人资本与宗法势力结合转化为宗族资产,其经商赚来的利润,不再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来培养封建宗法势力,加强封建的伦理纲常。其宗族资产愈是膨胀,封建性愈浓,商人阶层在经营商业、手工业中积累的资本,变成了加强自身封建性的手段。其宗族资产(宗族经济势力)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严重阻碍着产业资本的发展和新的生产技术的传播,在某些方面对城市经济则起到摧残、破坏作用。尤其是不断增加封建宗族性活动的消费,以及

购置祭田、修建宗祠等,加固了城市的封建性,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与成长。



- ①①⑦《聂氏家谱》。
- ②《李氏族谱》卷 5。
- ③《麦氏家谱》。
- ④卢子骏:《潮连乡志》卷 5。
- ⑤顺治十六年《三院严革私帛缸瓦饷示约》。
- ⑥②④《潘式典堂族谱》卷 6。
- ⑦黄先臣:《以寿太祖小谱》(《黄氏族谱》)。
- ⑧《南海廖维则堂家谱》卷 3。
- ⑨⑩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 14,《人物志》。
- ⑪《岭南冼氏宗谱》卷 7。
- ⑫《江夏黄氏族谱》(咸丰四年手抄本)。
- ⑬⑭⑮《佛山忠义乡志》卷 6,《实业》。
- ⑯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15,《货语》。
- ⑰《小榄何族发家史》。
- ⑱《龙氏族谱》卷 7,《华山堂祠堂记》。
- ⑳《番禺沙湾农业历史调查报告》(原件藏佛山市档案馆)。
- ㉑⑳《香山翠微韦氏族谱》卷 14,卷 12。
- ㉒㉓何仰镐:《据我所知中山小榄镇何族历代的发家史及其它有关资料》(原件藏佛山市档案馆)。
- ㉔㉕《顺德县志》卷 30。
- ㉖《韦氏族谱》卷 4。
- ㉗《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第 61 卷,《田制部艺文二》。
- ㉘《咸陟堂文集》卷 9。
- ㉙⑳丁仁长:《番禺续志》卷 112,实业志。
- ㉚《留耕名沙田总志》(原件藏佛山市档案馆)。
- ㉛孔能宽:《雍正归善志》卷 2,《事记》。
- ㉜戴璟:《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 30。
- ㉝《光绪二年重修佛镇栅下天后元君古庙

官神值事善信芳名喜 记各物签题工金各行工料杂项费用进支数同刊列碑记》(存佛山栅下天后庙内)。

- ⑳《光绪九年佛山清涌碑》(现佛山祖庙)。
- ㉞朱儒《粤东成案初稿》(道光刻本)卷 22。
- ㉟林仲芬、李达才:《旧社会广东的当押业》,《广东文史资料》第 12 辑。
- ㊱南海《黎氏族谱》(宣统三年刻本),列传。
- ㊲番禺《张氏克慎堂家谱》。
- ㊳冼氏是荃南独有之姓氏,系出自古代南越首领冼氏之后,南北朝时,著名的高凉太守冯宝之妻,被敕封为信都侯,隋封为宋康郡太夫人的冼夫人即出自这姓氏。
- ㊴《石头霍氏族谱》霍韬《又序》。
- ㊵《霍勉斋集》卷 22,“碑记”:《寿官石屏梁分偕配安人何氏墓碑记》。
- ㊶李待问:《李氏族谱》卷 5,《广成公传》、《祖考同野公传》。
- ㊷陈炎宗:《佛山忠义乡志》卷 8,《人物志》《李待问传》;又卷 6,《乡俗志·氏族》。
- ㊸同上书卷 14,人物六,义行。
- ㊹陈炎宗:《佛山忠义乡志》卷 3,《乡事志》。
- ㊺佛山《李氏族谱》卷 7,《祀业》(崇祯刻本)。
- ㊻《东莞张氏如见堂谱》卷 25,《送田引》(民国 11 年刊本)。
- ㊼《龙氏族谱》卷 1,《敬宗会缘起》(民国 8 年刻本)。
- ㊽吴道镕《番禺县续志》卷 2,《人物》。
- ㊾郭汝诚、冯奉初:《咸丰顺德县志》卷 2。
- ㊿(明)郭裴《粤大记》卷 26。
- ①《顺德《黄氏族谱》(抄本),《建造祖祠乐助捐贖附息总录》。
- ②《霍谓家训》。
- 责任编辑:郭秀文

翁万达的典边韬略

□ 黄赞发

(汕头大学, 广东 汕头 515063)

(中图分类号)K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5-0072-04

作为一代军事家和政治家,兵部尚书翁万达的确不失为潮汕,乃至岭南先贤中事功最为卓著,诗文也最具特色的人物之一。万历朝首辅、大改革家张居正就曾对其作出了世宗朝边臣“仅仅推公(指翁万达)屈一指焉”^①的评价。《明史》对其推崇尤高:“嘉靖中,边臣行事适机宜,建言中肯窾者,万达称首”;^②其本传长达3330字(未加标点),比同朝名相、阁老,如高拱、徐阶等人的传记还长。此后,翁万达一直广被褒扬,或称之为“岭南第一名臣”,^③或誉之为国之“干城”。^④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海外潮人的足迹,其威望还远播异邦。如在泰国,他被誉为“英勇大帝”,立庙祭祀竟多达一百余处。

一、不平凡的军政生涯

翁万达字仁夫,号东涯,隆庆年间追谥襄敏(《明史》谓襄毅,系笔误),生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卒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翁万达中进士后不久,即授户部广西司主事,此后历任广西司员外郎、山东司郎中(28岁到34岁)。在此期间,他查勘悬案,沮抑权贵,督税课兑,“以廉法著称”。^⑤嘉靖十三年(1533年),35岁的翁万达出任梧州知府。治梧四年,声绩大著,被誉为“治行第一”。^⑥在他39岁那年,安南莫登庸篡位,反叛明王朝,世宗命兵部尚书毛伯温等率领大军南征。翁万达被任

命为广西按察司征南副使,襄理军务,开始步入军旅生涯。从44岁至51岁,是翁万达青云直上、大舒其蕴蓄的峥嵘岁月。他由四川按察使、陕西布政使,一跃而为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不久又被擢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偏、保军务。这就是所谓三边大总制。最后还被任命为兵部尚书。这期间,在他的指挥之下,明军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充分显示出其深谋远虑、克敌制胜的军事才能。他既嫉奸锄暴,料敌如神,又知人善任,惜才恤卒,每每“得士死力”。明代文学家唐荆川(唐顺之)说他“用三败将立奇功”,就是他这种大将风度的写照。为此,他威震边关,气慑敌胆。

翁万达督边六载,主要对手是蒙古鞑靼部的俺答汗。其时,俺答虽“势方张,控弦数十万”,但总不敢大规模进犯。边关一度出现了升平景象。应该说,这是翁万达督边的实质效果。

嘉靖二十八年,翁父逝世,翁万达遂于年底南归奔丧。翁万达一离开边关,俺答即无所顾忌地兴兵犯境。在翁万达归里的第二年七月,大同失守,京畿震动。明世宗急诏万达返抵边关,掌其督抚重任。万达因丧期未满,又加之背疽发作,所以匆忙修书,派义子翁从云携带《乞恩陈情终制疏》上京。翁从云尚未抵

京,俺答已从古北口,“溃墙南下,直薄都城”。明世宗又连下两道金牌,催促翁万达起程。万达既感激于“特恩”,更“愤北虏之骄狂”,故虽父丧未葬,且背疽剧发,还是奋不顾身,登时就道。赶至山东,翁万达又接获有关复兵部尚书的手诏。就在世宗急于等待万达抵京之时,平素已为翁万达的严毅刚正所激恼的权奸严嵩、仇鸾,迫不及待地向上密奏,大肆非难万达,使万达被降职派往边关,经略紫荆诸关。

越年,翁万达因背疽发作,故乘“京察”,呈上《再辞免重任恳乞陈情疏》,引起明世宗的反感,遂免其职。接着世宗又以翁万达的《谢疏》有讹字为由,将其“削籍为民”。

嘉靖三十一年,55岁的翁万达约同友人抵闽游武夷山,途中背疽疾作,卒于舟中。此前,明世宗又感到防边重任非万达莫属,于是年农历十月十三日颁诏,第三次起复其为兵部尚书。但惜已太迟了。

二、谋国靖邦的真知灼见

作为军事家,翁万达的确有其过人的军事才华。由于他“片言每系当世之安危,决庙堂之得失,断袍泽之功过,定旦夕之祸福”,^⑦所以,他“每一疏入,上辄抚几听之。”^⑧从占其遗著半数以上的奏疏中,我们不难看出其谋国靖邦、抚夷制虏的真知灼见。综而述之,主要有三:

一曰严边备。翁万达认为,只有“饬边备,整军实”,才能“御强暴而绝覬觎”,^⑨所以一再提醒部下:“彼者来亦备,不来亦备”;^⑩“遇雨及天阴之时,尤须戒严。”^⑪他特别强调要“谨侦候,明赏罚”。一发觉擅离哨位者,“归辄缚”,因而没有敢“离次者”。^⑫他在《集众论、酌时宜以图安边疏》中,对如何饬边备,整军实提出了八大措施:谨防秋、并兵力、重责成、量征调、实边堡、明出塞、计供亿、省财用。

根据他的筹划,每防秋,都严格按布防计划分布兵力,严申号令。他号令森严,职责分明:总兵官不许择地拥兵自卫,务要往来调度,注重经常操练,振扬兵威;防秋之兵,步军登城

住宿,日夜巡防;马军挨墙列营,联络声势。如果由于疏于防守,以致敌兵侵入,则要查明地界,追究责任,按失陷城堡之律治罪;如果遇敌自分彼此,观望、推避,不立即赴援,那么,不论主兵还是客兵,一律治罪。对军队的给养问题,他也一直当作大事亲自筹措,并为此在边关实行屯军制度,所谓“塞下兵即塞下人”。如大同修边墙时,围进原敌占区四万余顷,即分给各边堡耕作。他也注意到武器的配备问题。在《置造火器疏》中,他对各种火炮的性能、数量说得十分清楚,并指出这是“夷狄所绝无,亦其所骇慑者”,要求工部速增拨铅铁、硝磺,以供其尽快督造。

在上述八大措施中,“并兵力”一项,最独具灼见。他认为大同与偏头关一带外边城为山西藩篱。山西宁雁一带八百里内边城在大同之南。大同有备,则山西可保无虞;大同失守,则山西内边城数万弱兵又奈强虏何?所以力主撤去内边增设之兵,合力以守大同。这既省费节劳,又能聚全力以守要塞。他的这一策略,得到山西巡抚杨守谦等的支持,也得到皇上的“嘉纳”。但是,新任山西巡抚孙继鲁“未尝入境”,即大唱反调,说是“重关为可恃,人心为可安”,^⑬并以私信相恫吓,使山西将领意存观望,举棋不定,几误边计。翁万达为此两次上疏,力主原议。他引证了守边的实践经验,说明数年来因“大同幸不溃防,山西始有宁宇”^⑭的道理,明确指出守大同,也就是守山西;而兼设内边,则只有疲师糜饷。孙继鲁也上疏抗争,甚至声言不撤原议,则“罢臣无误边事”。这就激怒了明世宗,他怒责孙继鲁“腾私书,引往事,议君上”,^⑮并逮之于狱。由于翁万达坚持了这一正确主张,使每年减少了六七万内边戍卒,节省了六七十万军饷。

二曰修边城。在整饬边备的过程中,翁万达特别重视边城的修筑。他说:“山川之险,险与虏共也;垣堑之险,险为我专也;”“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者。堡有垣堑,则寡可敌众,弱可制强。”^⑯在他的努力下,前后两次修边城

二段共千余里。在修边城的过程中，“万达精心计，善钩校，墙堞近远，濠堑深广，曲尽其宜。”^{①7}这样，不但敌人不敢轻易进犯，而且，边城之内，士卒也得以有空暇从事耕牧，从而节省了大量军费。

在翁万达看来，有了边城，并不就等于可以高枕无忧。他指出：“险而不设，与无险同；墙而不守，与无墙同；”“防秋之兵，所以必带甲而登墙，列营而待敌者。”^{①8}与此同时，他很重视边城的保护维修。他说：“遇有墙垣倒塌，壕堑淤浅，即时修补。”并提出将地界及维修事宜分段刻石，以明确各部职守，以求永不淤、塌，从而可望“内外之险全，而中国之势壮也。”^{①9}

三曰重优抚。这是翁万达军事思想中最为精辟的一个方面。如果说，重优抚这一谋略使得翁万达在军事上获得出奇制胜的主动权，毋宁说，重优抚在政治上带来的历史作用更是不可低估。它在客观上有利于民族的团结、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进程。尽管这一客观效果在当年翁万达脑中还是相当模糊的，甚或是非其始料所及的。

在长期的南征北战中，翁万达始终坚持“重纳降，轻杀伐。”早在他任广西副使，参与讨伐莫登庸的战役中，他就上书兵部尚书毛伯温，说：“揖让而告成功，上策也；慑之以不敢不从，中策也；芟夷绝灭，终为下策。”^{②0}并审时度势，提出宜以中策取胜。毛伯温采用了翁万达的计策，传檄安南臣民，怵以“天朝兵威”，使莫登庸震惧，遣使到翁万达处哀词乞降。毛伯温“纳其图籍”，报准改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并以莫登庸为都统使，正所谓“不发一矢而安南定”。^{②1}

在宣、大总督任上，翁万达更针对以往“首功赏重，招来赏轻”，以至敌方归降的人也常常被杀以邀功，使想归附的北人“南望号泣，不敢近塞”^{②2}的情况，提出了“严杀降禁、违辄抵死”的禁令，并颁布了招降赏格，以至“得降人抚之如所亲，以是益知敌情。”^{②3}当年，唐荆川即对此大加颂扬，诗赠翁万达：“得一胡儿如爱子”，

并生动地描述了当年边关上胡汉相通的情景：“边人大半能胡语，胡骑年来亦汉装。”

三、积极的通贡互市主张

如前所述，明世宗对翁万达的倚重几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正如《明史》所说：“万达更事久，帝深倚之，所说无不从。”然而却独有一事，一直“与帝意左”，那就是在对待俺答请求通贡互市的问题上。^{②4}

所谓通贡互市，就是蒙古族首领接受明王朝的封号，按规定向明王朝进奉贡物，然后由明王朝按贡品多少给予蒙古首领的酬赏，这就是翁万达在奏疏中所指出的，“获贡则利归其长”。^{②5}故也称封贡。在通贡的前提下，双方设定场所，在明朝官吏监督下，由蒙古首领按定数派若干贡使，并按规定时间、物品进行货易货的贸易交往，以互通有无。

实际上，这种贸易交换活动，早在明初就已开始了。它对蒙汉两族人民都是有好处的。到明世宗嘉靖年间，鞑靼部的俺答汗继小王子之后成为蒙古族最为强大的一支，横行北方四五十年。但是由于蒙古的鞑靼、瓦剌各部，互不相属，各部之内，又分成许多各自为政的小股势力，争夺激烈，就是俺答这样的雄者，也无法凝聚各部，形成真正可以问鼎中原的力量，所以对明王朝心存畏怯，一直选择求贡之路，以避免因交战而受到的损失，并通过通贡来获取比战争所获还要多的物质利益。

嘉靖二十年(1541年)，俺答及其属下阿不孩派遣使者石天爵向大同巡抚史道请求通贡，但惜朝议不纳；第二年，俺答再次派石天爵等抵大同求贡。时巡抚已换为龙大有。龙大有竟将石天爵缚献于朝廷，并胡说是用计诱擒的。明世宗信以为真，一面将龙大有提拔为兵部右侍郎，一面将石天爵磔于市。俺答盛怒之下，联络各部大举进犯，深入太原以南。龙大有虽终被罢官，但蒙汉却也绝信使五年。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和阿不孩又派使者到大同左卫求贡，又为边将家丁董宝杀之邀功。尽管如此，俺答仍未放弃通贡希望，于嘉靖二

十六年、二十七年又再而三地请求通贡,但都得不到允诺。

在俺答三番两次要求明王朝通贡互市的过程中,作为统率三边的封疆大臣翁万达,一直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一方面,他以高度的警惕性,提出“臣谬典封疆,所知者惟战与守而已,贡亦备,不贡亦备,时时戒严,俾无可乘之隙。”^⑥另一方面,他本着民族和解的愿望,一再上书明世宗,剖析俺答求贡的诚意,力主接纳其通贡互市之请。查看翁万达的遗著,关于“夷人求贡”这一专题,至少有一议三疏,另还有“虏中走向人口”三疏。在嘉靖二十五年的《虏中走向人口疏》中,他说:“近年石天爵之事,大失夷心,横挑巨衅。臣每痛恨当时边臣区划之失策。”今复“讲和求贡”,即不许,“犹当善其辞说,遣之使还”,“诱而杀之,此何理也?”坚决提请速诛董宝等人,并出榜于边塞,示朝廷德意,解俺答蓄怨。可惜明世宗一直听不进翁万达的正确主张,拒不接纳俺答通贡互市之请求,甚且在二十七年还怒责翁万达重提求贡之事,于是通贡之议乃息,以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翁万达南归奔丧之后,乃有俺答溃大同,直逼京师的“庚戌之变”。

由于明世宗对蒙汉力量的对比没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出于所谓天朝上国的高傲心里,他没有把俺答放在眼里,自然不会支持翁万达的纳贡主张。后来,他又任用奸相严嵩。严嵩只知仰承世宗鼻息,当然也不会支持翁万达的纳贡之议。

明世宗的另一位内阁首辅夏言也是个盛气凌人、好大喜功的权臣。他当时正热衷于与陕西总督曾铣谋复河套,当然也不是翁万达纳贡主张的支持者。嘉靖二十六年,曾铣提出复套之议,实则是夏言主其谋,世宗也已是溺其说。翁万达却冷静地对待这一严峻的形势。他在《复河套议》一文中,详尽地分析了河套的历史,客观地权衡了敌我双方的利弊,深刻地指出,套地落入敌手,已四十多年,胡人据以为家,不离住、牧,当不轻易放弃;而我方塞下喘

息未定,边卒疮痍,疲于奔命,故虽“有当复之理,而无可乘之机;多必奋之志,而鲜万全之算”,故不宜“横挑强寇,以事非常。”^⑦在翁万达看来,胡人在套地安居乐业,既难强夺,也不宜无端挑起战事。这既体现了他知己知彼,深识远虑,也体现了他力促蒙汉相安,力主纳贡的一贯思想,是符合两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为此,他还修书告戒夏言,不可轻易发兵。但夏言不听劝阻,终于兵败失事,与曾铣同被诛于西市。对此,朝野无不佩服翁万达之有先见。

尽管翁万达纳贡互市的主张一直未能得到明世宗的首肯而不能付诸施行,但这一正确的主张与其“重优抚”的战略思想一样却有着极其积极的历史意义。这是在当时应该而且能够实施的积极的民族政策。可喜的是,翁万达的这一卓识为此后的张居正、高拱辈所接受。就在他去世20年后的隆庆五年(1571年),张居正、高拱在内阁力排众议,力主纳贡,使明王朝与俺答部通贡互市的关系得以确立,使北疆“自宣大至甘肃不用兵者二十年”,^⑧将蒙汉两族融合、团结的进程推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①⑥明王锡爵(万历内阁首辅)《翁襄敏公神道碑》。

②⑫⑰⑳㉑㉒《明史·翁万达传》。

③大埔林达泉《请保护名臣翁襄敏公墓书》。

④⑦香港林建翰《先贤翁公万达文献勘版书后》。

⑤明薛应旂代徐少湖(徐阶)作《翁尚书墓志铭》。

⑧明莆阳郑綱《刻东涯集书后》。

⑨番禺叶恭绰《稽愆集序》。

⑩翁万达《答赵总兵东溪书》,载朱仲玉、吴奎信校点整理《翁万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⑪翁万达《与李吾西书》,载同上。

马采先生及其学术贡献

□徐文俊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广东 广州 510275)

(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5-0076-02

马采,别号采真子,字君白,1904年4月20日生于广东省海丰县海城镇。

1921年10月被广东当局公费派往日本留学,1927年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师从日本著名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后又改从日本著名美学家深田康算专攻美学,最后由植田寿藏教授的指导下,于1931年完成大学学业,获文学士学位。接着,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相当于今研究生院),在泷精一教授指导下,研究美学和美术史。1933年10月毕业后,回国在中山大学任教,1939年初,被提升为教授。抗日战争期间,中山大学几经搬迁,马采教授作为迁校的先遣部队,先后辗转于粤西罗定、广西南宁、越南河内、云南澄江、贵州贵阳、湖南衡阳、粤北坪石、仁化扶溪

等地。期间,于1938年在迁校途中与哲学系助教陈云女士共结连理,从此,这一对患难夫妻相濡以沫,直至白头。

抗战结束后,马采回到广州,先后任教于法商学院和珠海大学,1950年被保送到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回到中山大学任教。1952年因全国院系调整,调到北京大学任教,1960年中山大学复办哲学系,又返回中山大学工作。

马采教授是我国当代美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博学精深,贯通中西。早年,他率先把黑格尔美学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著有《黑格尔美学辩证法》、《论艺术理念的发展》等论著,提出“创作与鉴赏正是艺术理念不可分割的两面。没有不被创作的艺术,也没有不被鉴赏的艺术。鉴赏便是创作,创作便是鉴赏。”其观点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称为

⑬⑭翁万达《及时经理边防大计疏》,载同上。

⑮明武进孟森《东涯集(郭刻本)序》。

⑯⑰⑱翁万达《集众论酌时宜以图安边疏》,载同⑩。

⑲《明史·毛伯温传》。

⑳《潮州耆旧集·翁襄敏集·杂录》,载清冯

奉初编《潮州耆旧集》卷十一,香港潮州会馆印行,1980年8月1日出版。

㉑㉒翁万达《夷人求贡疏》,载同上。

㉓翁万达《复河套议》,载同上。

㉔《明史·鞞鞞传》。

责任编辑:郭秀文

“马氏美学辩证法”。

抗战结束以后,马采教授从德国观念论美学转向李善斯美学移感说,发表了《释移感》、《论美——从移感说观点看审美评价的意见》,并将李善斯的“生命感情”与中国画学“六法论”的“气韵生动”联系起来,用一种跨文化的观点开展对中国美学的研究,发表了《中国美艺讲演录》、《孔子与音乐》、《顾恺之研究》、《王维研究》等论著。同时,马采教授还提出应创立一门艺术学,把美学与艺术学区别开来,美学的对象是美,而艺术学的对象则是艺术,不可把美与艺术混为一谈。

马采教授还是我国当代美学教育的奠基者之一,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他与其他教授一起共同开设了我国解放后第一次美学专题课,主讲《黑格尔以后的西方美学》,获得成功,从而奠定了我国美学高等教育的基础。1980年,在昆明召开的中华全国美学学会成立大会上,提出“大力开展审美教育,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呼吁,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推动了美学的普及教育,丰富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

由于马采教授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他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并当选为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理事、广东美学学会顾问、中华全国日本哲学学会顾问等职。

在哲学上,马采教授精通西方哲学和日本哲学,尤其精通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早在40年代,他就出版了《哲学概论》、《原哲》等著作,《哲学概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哲学的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和基本内容,是一本哲学入门教材;《原哲》以苏格拉底为中心,抒发了马

采多年来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心得,其对苏格拉底哲学人格的评价,投射了马采教授本人的哲学信仰和治学精神,深得后学者的景仰。晚年,他又出版了《世界哲学史年表》,这是外国哲学研究的浩大的基础工程,填补了我国外国哲学基础研究方面的空白。

作为翻译家,马采教授翻译出版了一批颇有思想价值的外国著作,例如,费希特的《告德意志国民》、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基督抹杀论》、《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近代日本思想史》和安藤昌益的《良演哲论》、《自然世论》等,此外,还翻译出版了《萨摩亚史》等历史文化著作,丰富了我国的学术文化,推动了学术交流。

马采教授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默默耕耘,淡泊名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以耄耋之年,与夫人陈云一起,仍孜孜不倦地耕耘于学术园地。近年出版了《哲学与美学文集》、《艺术学与艺术史文集》,《马采译文集》亦已完成。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晚年,他与陈云积平生收集的资料,按照他们在1992年出版的《世界哲学史年表》的格式,计划编撰一本60万字的《美的历程——中外美学美术历史编年综表》,由陈云负责编撰中国部分,马采负责外国部分。陈云先生以85岁的高龄,抱病以惊人的毅力在编毕20万字的《中国美学美术史年表》之后,来不及等到正式出版,便已辞世。马采先生已届95高龄,在爱妻去世之后,仍笔耕不辍,独立完成全书的编撰任务。可惜,天不助人,马采先生尚未完成这一任务,便于1999年3月2日与世长辞。●

责任编辑:冯 生

古汉字结构的取象类型原始移情考略

□ 臧克和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上海 200062)

(中图分类号)H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5-0078-06

姜亮夫先生曾论及“汉字不用实物的特征表某一事,只是用‘人本’的所有表一切”。例如,一切动物的耳目口鼻足趾爪牙,均以人之所有而为字,故不为虎牙立专字,不为象鼻、豕目、鸡口、驴耳、鸚目、鸭趾立专字。又其表示人类的祖妣之且匕作兽类两性的差别;而犬之吠、鸡之喔喔、龙吟虎啸,莫不与人之口同用口;狼心豕脑、马肝、牛肺、草心等,亦为人身之件。①

应该说,姜亮夫先生这里所说的人物关系在构字层次上还是存在着取象差别的。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一书也发挥“移情”之理:

我国古代语文的生长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移情的原则进行的,特别是文字的引申义。②

喜欢把义理词章考据会通起来阐释的钱钟书先生,圆览中西,万方比照,观物求全,揭举“移情”法门:

盖吾人观物,有二结习:一、以无生者作有生看,二、以非人作人看。鉴画衡文,道一以贯。③

而且,钱先生早年就讨论了“一切科学”由人及物、物我不分的“人化”移情倾向:

一切艺术、鉴赏根本就是移情

作用,譬如西洋人称艺术鉴赏力为 taste,就是从味觉和触觉上推类的名词。人化文评不过是移情作用达到最高点的产物。其实一切科学、文学、哲学、人生观、宇宙观的认识,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象征的,像煞有介事的诗意的认识。……从我们研究思想史的看来,移情作用跟泛客观,行为主义跟唯心论,只是一个波浪的起伏,一个原则的变化。因为人化文评只是移情作用,而移情作用是一切文艺欣赏的原则。④

钱先生的这篇早期论文,使我们想到了不久前一位叫杜威明的美国哲学家所曾论述中国哲学的“基调”,他认为中国哲学的基调之一,是把无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相互交融的实体。⑤

古汉字系统与原始移情存在着关联的根本理据是,中国古代人类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那便是一种前逻辑的、主客体不分的思维类型。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来看,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生自有其必然性。在初民那里,自然就是他的身体,他也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以己之生

命和感情去感知自然界的一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由此而言,原始人类的移情作用,是人类心灵中天生就有的一种机制,是人类的原始体验,具有非自觉的性质。从人类的实践活动来考察,移情作用则是原始人类在与外界的接触中自发产生的通过自身去感知世界、理解自然的唯一认知方式。⑥因此,古汉字的结构取象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初民“正名”、“致物”的具体物化过程。以下就从“名原”、“制物”两个方面来说。

1. 正名:古汉字体系中的移情原则为探求事物名源途径之一

1.1 先民将名称神秘化,认为名称与事物之间存在神秘的内在联系,《尚书·吕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该句里的“主名”,裘锡圭先生注释为并列结构:《大戴礼记·五帝德》也说禹“主名山川”。同篇又说禹“巡五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为神主,为民父母”。看来“主名山川”的“主”指山川之神的祭主,“名”指为山川定名。⑦《国语·鲁语上》:“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礼记·祭法》作“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可见古人“命”“名”二者之关系。我们在考察《说文解字》所录存的汉字系统时已经讨论过,标志“前”“先”“后”“左”“右”一类位置关系的字,实际上是取自人对自身的直观,即人的身体及其各部分是所有其他空间划分都要间接转换成的参照系。再看下面的例字。

1.2《说文·鹿部》:“麇、鹿子也。从鹿,弭声。”按“弭”字从弓,原无“子”义。但捡看《说文·弓部》“弭”篆下又出或体重文作“引兒”,结体以“兒”。《玉篇·鹿部》:“麇,鹿子。”《集韵·齐韵》引《说文》:“麇,《说文》:‘鹿子也。’或从兒。”《国语·鲁语》:“兽长麇麇。”韦昭注:“鹿子曰麇。”是知“麇”训“鹿子”,大概受名于

“兒”。

《说文·玉部》:“珥,珥也。从玉、耳,耳亦声。”是说“珥”字本受义于人之两耳。古代先民指称自然现象、物象也名之为“珥”。《楚辞·九歌·东皇太一》:“抚长剑兮玉珥,”王逸注:“玉珥,谓剑鐔也。”《广雅·释器》:“剑珥谓之鐔。”王念孙疏证:“《通艺录》云:……剑鼻谓之鐔,鐔谓之珥。”

《说文·水部》:“沚,小渚曰沚。从水止声。”“沚”本指水中所滞止小块陆地,《尔雅·释水》:“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国语·晋语》:“底著滞淫。”可见“沚”、“渚”的得名分别与“止”、“著”相联系,而“止”等字体结构,当初仅与人的行为有关。人的脚部为“趾”,则墙根部为“址”。《左传·宣公十一年》:“略基趾。”杜预注:“趾,城足。”《篇海类编·身体类·足部》:“趾,与址同。”另外,像“肢”之于“枝”、“领”之于“岭”、“跟”之于“根”等,皆构成类似“趾”之于“址”的关联。

《说文·言部》:“说,说怪也。从言、兑。一曰谈说。”按《尚书》,这部典籍“谗说”连文,例如:《益稷》:“庶顽谗说,若不在时。”《舜典》:“帝曰:龙,朕堯谗说殄行……”扬雄《解嘲》“说”“谈”对文。根据徐锴系传,“说”字还应该从“兑”得声的形声字。“兑”(古音在月部,今读 ruì)有“尖锐”义,“锐”字不过是后起分化字。《荀子·议兵》:“兑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又“谈”从炎得声,炎声字每多有“锐”义。可知,“说”之言“锐”、“谈”之言“剡”,都是言辞犀利之义。也就是说,“谗”、“铤”同源,“说”、“锐”同源,“谈”、“剡”同源。属于这一类的还有《说文·金部》的“镛”字,解释为:“镛,矢缝也。从金啻声。”王筠系传校录:“啻声,大徐同。汲古作滴,亦啻之变体。”按“镛”从啻声,

而啻又从帝声,帝又从束声。“束”,就是木芒,孳乳“刀”符即为“刺”,是知矢锋之镗,取义于自然木芒之刺。因此有人推知:“人类制器赋名,恒假天然之物为比拟。”^⑧

1.3 上述一类字例的构成得名,体现了古人在认知取象赋形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人情物象之间,灌注相通,交互为用的复杂关系。训诂学界研究同源字,往往总是着眼于事物的功用、性状等,看来还有若干领域需要拓展研究,其中关于先民原始移情作为普遍的“命名”原则在古汉字系统中的反映,尤其应当给予重视。

2. 致物:古汉字结体取象的移情原则往往体现出某种巫术思维关联。

2.1 出土文献中铭文的相当部分辞例以“格”作“来”,不烦举。这使我们想到中国学术史上“格物”这一重要问题的理解,至少在先秦某个时代应该和“使物来”发生一些联系。裘锡圭先生注意到:在古书里时常可以看到有德者能招致物、能使物来至等说法(这里所说的物包括人、事、鬼神等,范围极广)。另外,在古书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于用某种方法来致物的说法。

《周礼·春官·大宗伯》:

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神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指百物之神“物彰”,参看《周礼·春官》“凡以神仕者”条)。

同上《大司乐》:

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凡六乐者,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示,再变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变而致鳞物及丘陵之示,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示,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示,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

以上所说,是以音乐等致物。

《史记·封禅书》:

少君言于上(指汉武帝)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

这是说方士致神的方法。又:

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通天地、泰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岁余,其方益衰,神不至。

又如《周书·文酌》:

伐道咸布,物无不落。落物取配,维有永究。

裘先生解释说:“伐道”疑指征伐之道。此文两个“落”,很可能应该读为“格”,“落物”就是“格物”。“落”从“洛”声,“洛”“格”皆从“各”声,故可相通。(参看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子内篇杂志·卷五》“格”字条)^⑨

按《尚书》里“格人”凡一见(《西伯勘黎》)，“格王”亦一见(《高宗彤日》)，“格命”一见(《吕刑》)，“格知”亦一见(《大诰》)，“降格”凡三见(《多士》、《多方》、《吕刑》):皆可视为当时恒语。其中“格”字均可作“至”、“来”理解。又如《舜典》讲到“格汝舜”，敦煌本“伯 3315”记作“女”，内野本于“格”字旁边以日语片假名注音作“キタレ”，该词形日语记录作“来たれ”，即“来たる”的命令形，那词义就是“使……来”。

2.2“狩猎”类古字考述。《录伯戠敲》铭文而“戠”字，正是《尚书·大诰》岛田本“王若曰繇”之“繇”字。而检内野本又作“王若曰猷”，上图影天正本亦作“王若曰猷”，^⑩可知“繇”、“猷”二字同。清人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

繇即谣即繇即訇，亦即猷。……谣言即訇言。訇一作讹。《说文》**化**字或作

繇。⑪

在“扌”、“伪”、“訃”等字尚未分化之前,皆由一“为”字兼职。《说文》将“为”字归属《爪部》,释作“母猴”。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据甲骨文字订正说:“案:(为)从爪、从象,绝不见母猴之状。卜辞作手牵象形……意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马以前。”“役象”就是采用人为力量以使役之,当非寻常力量可为。

在古书里,“为”是使用范围较宽泛的动词之一。《左传·成公九年》:“我出师以围许,为将改立君者,而纾晋使,晋必归君。”陆德明释文:“为,本或作伪。”《汉书·淮南王传》:“(淮南王)欲如伍被计,使人为得罪而西。”颜师古注引苏林曰:“诈作得罪人而西也。”《庄子·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俞樾平议:“《广雅·释诂》:‘取,为也。’然则‘为’亦犹‘取’也。”俞氏的解释是可信的,“为”字的这一用法如同《荀子·王霸》:“将以为乐,乃得忧焉;将以为安,乃得危焉;将以为福,乃得死亡焉,岂不哀哉!”这里的“为”都可以理解作“谋取”的意思。

“为”字的这种用法,可以和出土文献相印证。卜辞辞例有“取为”(《乙》2307),可以考知“为”字结构取象意义犹言“服象”,《吕氏春秋·古乐》:“殷人服象,为虐于东夷。”这里的“服象”,一如“格物”可隐括为“使物格”结构。《易·系辞下》也讲到: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服牛”和卦名“随”相联系,“服牛”也就是“使牛服”,卦名为“随”,含有“依随、顺从”,与“服象”情形同当。


由此,“訃”、“髡”、“鬻”等字结构同源关系皆可得而说:在大象头部(长鼻处)画成一控制者的手(爪)形,即等于在

“髡”旁画上“系”符,也就同于在“鬻”符四周画出“□”形。⑫在阴山岩画资料中,反映狩猎生活的部分不少内容就是在动物附近画出一“○”形,或是将狩猎对象局部(一般是蹄腿部位)置于“□”形之内。人类学者考证,这是有助于猎获的巫术关联类型。

属于该类型的古汉字结构,即取象于仪式者,可以推断在古文字发生阶段是会占到一定比例的,以下还可以提到两个同类的例字。


告,《说文》释为“牛触人,角著横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许慎既将“告”字分析为从牛从口,但又不可归《口部》,而是系于《牛部》之后,单置一部。这也许反映了《说文解字》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处置。

“告”字甲骨文、金文分别结体作:

 (《前》4, 29, 5)  (《亚中告簋》)

从口符之字多有圈闲束纳功能义,又可变形作口、□,然而又常常与口符发生混淆。以“告”为声符孳乳分化字群至少有:牯、窖、酷、梏、皓,等。

清代金石学家刘心源就以为:告已从牛,牯又从牛为赘。其实,类似“告”重复牛符孳乳分化的现象在古汉字系统中是比较常见的。刘氏同时还区辨了口、臼、□等字符的使用情形:

象槛阱形,牛陷入臼为告,与牛在中为牢同意。篆法臼字不必专指口舌之口,亦有用以象物形者。如仓、舍、邑、谷、凸等,篆本从□亦从臼(详《师首鼎》)。许不知告以口象形,故牵合福衡为训。其实告示字乃假借也。⑬

我们认为刘氏的字形比照大体是可信的,只是他还不能解释在牛符之下标明臼符何以就具有了圈牯的功能和这一类关系。

雞，《说文·隹部》：“知时畜也。从隹奚声。”甲骨文字（《粹》976）亦从奚得声结体。我们可以从考古发掘中找到该字的取象理据。据商代卜辞的记载，“奚”为被缚奴隶之象。“奚”在甲骨文中就是取象于绳索之“系”，“系”、“奚”同源同象。“系”上古为匣母锡部字，“奚”为匣母支部字，而由“奚”得声的“雞”，古音是见母支部。“见”“匣”二母为牙喉音，发音部位极为相近，而古韵部支、锡又构成阴入对转关系。

剩下的关联是：“雞”字构形为何从甲骨文时代就有取于“奚”？我们的联类理解是如同所获其他部族之类的人顶部画上“系”符即可束缚变成奴隶，亦可移注于由野佳捕获变化为家禽的雞。“捕获”之获，初文只作“隻”，《说文·犬部》：“获，猎所得也。”这些联系起来考虑，大约是表明在构形中标加控制之符“又”，即是等于对所欲猎获对象施加了某种巫术力量，从而有助于猎获。这类神秘关联的传达，一如北美印第安人部落的原始狩猎岩画：在野牛的腹部画上箭矢，就可以帮助捕获野牛。按殷墟卜辞，“隻”又限于捕鸟者。（《卜辞通纂》641）“雉”从矢受名，“雉从弋得声，都属同一类型。在狩猎时代，皆有用心深意存焉。《说文解字·隹部》：“雉，缴射飞鸟也。从隹弋声。”用今天的话来说，雉就是用带绳子的箭射猎。“雉”字构成的基本理据在于“弋”，《玉篇·隹部》：“雉，今作弋。”《说文·隹部》列举出了14种雉，结构分析作“从隹矢声”。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今以卜辞考之，古文……盖象以绳索系矢而射，所谓矰缴者也。”凡此，都表明与狩猎时代生活存在某种关联，恐怕不能排除其中的原始移情——巫术仪式规定下的影响。⑭

2.3 取象于“偃兵息武”仪式类古文字。

“吉”字各期甲骨文和金文结构为一盛纳器具，其上部所置放字符或为矢锋、或为斧钺。不论如何异构变形，“吉”字的古文结构不外就是将代表兵器之字符置于表示盛具之字符的关系（《合》118《摭续》137、《旂鼎》）。

古文字学研究者如李孝定等，训诂学家陆宗达先生也都曾经精细地辨察出“吉”字结构之所从，但是对于如此结体何以就可体示“吉”义，有的则失之牵强傅会。我们的考察结论是：在先民看来，将从敌方弄到的可施于杀伐的“凶”器包藏束置起来，就可以使敌对一方武力受到削弱以至避免战争。这对于自己部族来说，自然就是“吉祥”之事了。这种巫术思维原理，和先民关于部族间兵器“凶”伐的认识是完全相应相合的。“吉”之得名，极有可能就是来自先民有关“凶”器的“禁忌”。“诘”字从吉得声，《周礼·太宰》：“五曰刑典，以诘邦国。”注：“（诘）犹禁也。”从造字构形层次上说，“吉”字取象，属于所谓巫术仪式模拟的类型。从语音关系而言，在汉语古音系统中“吉”属见母质部，“忌”则为群母之部；又“忌”从“己”得声，而“己”古音亦属见母之部，由此即可见出“吉”“忌”二字的语音关联。

中国古代典籍一向以“兵”为大忌、视如“凶”器。《左传·隐公四年》所载众仲答郑桓公问：

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

而“兵”字的本义就是用于攻战的器械，《说文·收部》：“兵、械也。”《左传·襄公二十四》：

齐社蒐军实，使客观之。陈文子曰：“齐将有寇。吾闻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左传·宣公十二年》：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

安民、和众、丰财者也。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韩宣子曰: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菑也。将或弭之。

其他文献中的“忌兵”用例不烦举。

关于“忌兵”仪式和现实世界有关事物理念的同构抑或混同,人类学研究者早就为我们举出了若干证据资料。例如他们调查到:


美拉尼西亚人(澳洲东北方,西南太平洋诸群岛上的土著)一旦获得敌方的兵器,就必须妥善存放,以此减少对自己一方的伤害程度。可是,要是它被敌人获致时,那么,无疑地它将被拿到火旁以促使它所造成的伤口开始炽热和发炎。



⑮而且,这种以“忌兵”趋吉避凶的观念,还不仅限于针对敌对者一方的武器,人类学研究者遍稽全球存在过的有关“锋利兵器的禁忌”:

缅甸北部的祭司王被莎迪人尊为宗教和人世的权威,任何兵器或切割用具都不得带进他屋内。……中国人在人死后尸体还停在屋里的七天内,禁用刀、针,甚至筷子也不用,吃饭时就用手抓着吃。⑯

这样看来,禁忌兵器趋吉避凶,又非特为生存者所专,对死亡者也深存戒心焉。


3. 古汉字结构原始移情考余

按《毛公鼎》铭文有字,金石学家如刘心源释为“太”。事实上,该文释“太”于铭文辞例不合,《毛公鼎》铭文:

……临保我有周不巩先配命攸天畏司余小子弗及邦庸害吉……

释“疾”则文义通顺。殷墟卜辞该字形多见,亦从人中矢形,即“疾”之初文。我们曾联类考察古代“射侯”仪式的取象、诅咒性质,论证了“疾”又为“嫉”(《说文·人部》作“𢇇”)字初文的关联。⑰此例明显

地宣示了原始移情思维方式直接影响古汉字结构类型。

我们曾经考证到殷墟卜辞中的“德”字为从彳从直、并且从直得声的结构。关于字本义“正道直行”与道德规范二者关联,历代文字考释者颇费词墨。我们的考证结论是:在初民看来,在道路旁边或中央画成表示正直有当的测直之象,即可确保行为的准确无误,也就等于具有了避免越轨偏差的巫术效力。⑱

上述古汉字考察方式、结果使得我们认识到,裘锡圭先生关于考释字本义不能理解得过于狭窄⑲的见解有重大理论意义。●

①姜亮夫《古文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69—70页。

②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卷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597—598页。

③钱钟书《管锥编》卷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57页。

④《文学杂志》月刊第一卷4期,1937年8月1日。

⑤《试谈中国哲学中的三个基调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⑥臧克和《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自然与人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二次印刷,第22页。

⑦裘锡圭《文史丛稿——上古思想、民俗与古文字学史》,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5页。

⑧这类例字分别参见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第37—38、17—1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但杨氏考释过程中所征引文献有明显的讹误,这里已作订正。

⑨裘锡圭《文史丛稿》,第8—11页,注⑦。

⑩顾颉刚、顾廷龙编《尚书文字合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1665—1691页。

库恩和中国古典小说

——兼谈文学的创造性背叛

□林 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421)

(中图分类号)I05; 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5-0084-07

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 1884-1961)是德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他出生于德国萨克森的弗朗肯贝格, 1903年中学毕业, 赴莱比锡学习法律, 次年冬转柏林学习汉学, 两年后返莱比锡继续攻读法律, 1908年通过国家考试, 获律师营业执照。1909年被派到中国, 任驻华公使的翻译。1912年, 库恩辞去外交部的职务, 回德国师从汉学教授约翰·雅可布·玛利亚·德·格洛特。格洛特教授精通中国的宗教、哲学和历史。在他的指导下, 库恩完成了第一篇汉学论文《崔实的政论》(1914), 其后还写过有关中国君主政体的文章。但是, 库恩没有继续追随导师从事汉学研究。他感到, 当时西方流行的关于中国的书是一些戴有色眼镜的人

写的, 要介绍中国, 最好是“让中国的作者说话”。^①而与通篇注疏的四书五经相比, 文学作品对于广大读者具有更大魅力。于是, 他独辟蹊径, 走上了翻译中国小说的道路。

综观库恩的翻译生涯, 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1919—1926年, 是他从事文学翻译的初期, 主要译短篇故事。处女作《卖油郎与花皇后》(即《今古奇观》中的故事《卖油郎独占花魁》)发表于1919年, 是参考法译本翻译的。1923年, 选译了一本《中国的治国智慧》。^②1925年, 莱比锡的岛社与库恩签订《好逑传》的翻译合同。库恩选译《好逑传》, 显然是因为这部小说曾引起大文豪歌德的兴趣并受到他的

①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 释《录伯敲》铭文,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

②有关“○”符的束缚、容纳功能义, 参见臧克和《中国文字与儒学思想·原“中”篇》, 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版。

③《奇觚室吉金文述》卷三, 第11页, 《告田敲》。

④《清经解》(学海堂本)卷一〇六八, 阮官保《研经室集·释矢》:“《周礼》封人: 封其四疆, 造都邑之封域亦如之, 凡祭祀置其。司农注: 著牛鼻绳, 所以牵牛者, 今时谓之雉, 与

古者名同。”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

⑤佛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译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2月版, 第105页。

⑥弗雷泽《金枝》中译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版, 第337页。

⑦具体考释过程, 参看《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弓矢意象”考。

⑧《中国文字与儒学思想》“原‘德’篇”。

⑨裘锡圭《文字学概要》, 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版。

责任编辑: 陶原珂

称赞,把它翻译出来,容易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果然,他成功了,译作以小说主人公的名字水冰心与铁中玉为书名于1926年发表后,被汉学界称为至今所有翻译中“最可信和最吸引人的”作品。^③同年,他又发表了三篇译自《今古奇观》的故事,从而奠定了文学翻译家的地位。

1926年8月,库恩着手翻译《金瓶梅》,进入了翻译创作的第二时期。1930年,《金瓶梅》德译本出版,获得很大成功,使库恩在欧洲享有声誉。在此期间,他还翻译惜阴堂主人著的《二度梅》(1927),节译田汉的剧作《黄花岗》(1928),并开始了《红楼梦》的翻译。1932年,《红楼梦》译本问世,库恩获得了莱辛文学奖。紧接着,他又陆续翻译了《水浒传》(1934)、《玉蜻蜓演义》(1936)、《子夜》(1938)、《隔帘花影》和《十二楼》中的四则故事(1939),并于1940年完成《三国演义》的节译。至此,库恩的文学翻译达到了鼎盛时期。从选题上看,大部分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名著。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库恩中断了翻译工作,大量书稿毁于战火,他本人也几乎在轰炸中丧生。战后,库恩重提笔杆,进入翻译生涯的第三时期。《今古奇观》和《十二楼》的故事,唐代小说《昆仑奴》、《李娃传》、《刘无双传》相继翻译出版。1952年,联邦德国为表彰他在文学翻译上的突出贡献,授予他十字勋章。年逾七旬,库恩仍孜孜不倦地工作,先后翻译了《儿女英雄传》(1954)、《肉蒲团》(1959)等长篇小说。库恩后期的译作,文笔更加流畅和细腻,但其选题,无论在思想性或文学价值上都远不如战前的作品。

1961年1月22日,库恩在电影院看电影时辞世。这位翻译家没有结婚,陪伴终生的是中国古典小说。他以杰出的翻译才华,为中国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逐字逐句的翻译”(Wortwörtliche Übersetzung),二是“艺术的转述”(Künstlerische Übertragung),三是“自由的加工”(Freie Bearbeitung)。^④所谓“自由的加工”主要是指对内容进行删削、压缩,为保持情节的连贯性作必要的处理。他在小说翻译中,根据需要综合运用三种方法。其中,大量使用的是“艺术的转述”。下面试举一例,看看库恩的翻译方法和风格。《红楼梦》第1回,有一段关于甄家丫环看见贾雨村的描写:

那甄家丫环掐了花儿,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方腮。这丫环忙转身回避,心下自想:“这人生得这样雄壮,却又这样褴褛:我家并无这样贫窘亲友,想他定是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对人物相貌往往作面谱式的夸张描写。腰圆背厚,面阔口方,直鼻方腮,这些字眼对于中国读者是熟悉而亲切的,但如逐字逐句译成德语,在德国读者眼中,贾雨村就会变成凶神恶煞的妖怪。库恩是这样处理的:

她摘着花,嘴里轻声地哼着歌儿。她虽无十分姿色,但却娇媚动人。雨村站在窗旁,呆呆地望着她。这时,她偶尔抬头,察觉到了他的目光。“尽管他穿着贫寒,但身材却很雄伟”,她想,并很快转过身:“好一副模样儿,好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这人一定就是主人常说的朋友雨村了。”^⑤

译者没有拘泥于原著的字词,而是采取自由转述的方式,巧妙地利用内心独白(“好一副模样儿,好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婉转地点出贾雨村的堂堂相貌,同时揭示出多情女子的心理活动。

研究库恩的翻译,我们发现,库恩十分注重译作接受者的期待水平和作品的娱乐功能。他认为,“把中国古典小说翻译成欧洲文字,无非两种可能:要么,完整的、语言文字上严格的翻译,这是为专业界的;要么,自由地转述,这

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重新创造,是为读书和购书的读者的。”⑥要把中国小说译成德文,必须首先考虑广大读者,要让他们在阅读中得到消遣。由于中德语言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如果要一字不漏地翻译,就必须加大量注释,读者才可能理解译文的内容。这样做,也许符合少数专业人士的需要,但却会令广大读者感到扫兴。对于自己的译作,库恩多次声明“不是为少数专业人士,而是为广大受过教育的读者服务的。”1928年,他曾撰文批评奥托·基巴特节译的《金瓶梅》,提出:“好的文学翻译的艺术和任务,在于自由表达的同时,保持原著的特点,并做到不删削重要内容,不作违反原意的复述。”⑦他还认为,出版社“有权要求译本具有读者喜爱的、符合西方口味的特色。”⑧

为了使中国古典小说能被广大德国读者接受,库恩一方面努力避开因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翻译上的障碍,尽量越过西方读者在理解上可能遇到的困难,采用读者熟悉易懂的方式表达。另一方面,在翻译中,库恩按中国章回小说的格式,给每一章加上标题,适量地将一些地名,如:十里街、葫芦庙、大观园中各寓所的名称,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姓名,意译为德语,同时,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将一些汉语中独有的词语,如:“红尘、晚生、洗耳恭听、光阴易逝”等,按照字面意思直译,以增加译作的“中国情调”。

库恩不是翻译理论家,他对翻译理论没有发表过专论,但是,他的翻译实践却暗合了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中的某些主张,如奈达提出的以读者为中心的交际性翻译原则。库恩心目中的读者对象是广大受过教育的、不懂中文的德国读者。其宗旨是使他们通过译作了解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并且在阅读中获得娱乐,因而相应地采用他们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这种翻译的原则和方法,正是库恩译作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秘诀。

产生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作品,经过精心移植,在德国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这是库恩取得的成功。但是,译作就内容的完整性而言,却不尽如人意。

《红楼梦》原著 120 回,经删节、压缩、撮译,仅得 50 章。其中,原著前 27 回的内容,基本保留在译作的前 21 章中:第 6 回和第 7 回合为第 6 章,保留“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和“宴宁府宝玉会秦钟”,略去“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和“送宫花贾莲戏熙凤”。第 10 回和第 11 回合为第 9 章,保留原第 11 回标题“庆寿辰宁府排家宴,见熙凤贾瑞起淫心”,删去了“张太医论病细穷源”的情节。第 14 回和第 15 回合为第 12 章,标题为“贾宝玉路谒北静王,秦鲸卿得趣馒头庵”,压缩了出殡前的情节。第 19 回和第 20 回合为第 16 章,保留“情切切良宵花解语”和“林黛玉俏语谑娇音”的情节,而把“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和“王熙凤正言弹妒意”略去。第 22 和第 23 回合为第 18 章,译述宝玉调停湘云和黛玉反遭数落以及“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的情节,删去“制灯谜贾政悲谶语”。第 26 和第 27 回合为第 21 章,标题为“蜂腰桥设言传心事,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如果说,《红楼梦》前 27 回译述得还算比较完整的话,那么,从第 28 回起,库恩对原著则作了大刀阔斧的删削,许多内容只用三言两语带过。如:原著第 35—41 回,在译作中浓缩成一章(第 25 章),主要叙述刘姥姥的故事。第 85—89 回,缩成第 41 章,只述“坐禅寂走火入邪魔”和“蛇影杯弓颦卿绝粒”的主要内容,至于“贾存周报升郎中任,薛文起复惹放流刑”等内容只用一小段文字作简单交代。再如:原著第 90—94 回,缩成第 42 章,叙述黛玉病重,贾母和王夫人打算娶宝钗为媳,接着便转入宝玉失玉疯癫的故事。原著第 110—116 回叙述贾家急剧衰落的一系列事变,包括史太君寿终、贾家遭劫、凤姐去世、宝玉病重,在译作中缩为第 49 章。由于小说的后半部删削得厉害,因此,译作给人的印象是虎头蛇尾,各种矛

盾冲突刚刚展开,便匆匆忙忙地结束。

《金瓶梅》译本的情况也很相似。原著 100 回,译作只有 49 章。前 30 回译得较完整,从第 31——46 回,经删节只剩 4 章,译述“陈敬济失钥罚唱”、“翟管家寄书寻女子”和“西门庆包占王六儿,潘金莲香夜弄琵琶”,第 47 回“苗青贪财害主,西门枉法受赃”基本译出,从第 48——53 回只保留“遇梵僧现身施药”和“吴月娘拜求子息”。第 54——100 回,内容至少压缩了一半。

在翻译《水浒传》过程中,库恩主要依据金圣叹的 70 回本,同时参考 120 回的繁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译作在对原著内容进行压缩的基础上,围绕鲁达、林冲、晁盖、宋江、李逵、石秀等人的故事以及“锦毛虎义释宋江”、“梁山伯好汉劫法场”、“宋公明三打祝家庄”、“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等主要情节把全书分为 10 部分共 120 章,最后,以宋江、李逵之死作全书的“结局”。关于武松的故事,因已包含在《金瓶梅》中而全部略去。德译本书名是《梁山伯的强盗》。⑨

《三国演义》的译本,严格地说,只能称为节译本。原著 120 回,德译本只有 20 章,内容为前 38 回从“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到“刘玄德三顾草庐”的主要情节。

造成译本内容不完整的主要原因是出版社对译本篇幅的限制。按出版社规定,《红楼梦》译本的篇幅不得超过 800 页,《金瓶梅》译本的篇幅不得超过 1200 页,《水浒传》译本则不得超过 600 页。如果超过规定篇幅,出版社不付稿酬。此外,出版社对翻译的速度和交稿时间也严格限制。库恩开始翻译《红楼梦》时,出版社要求每月交稿 64 页,一年内全部脱稿,否则合同作废。为了履行合同,库恩在翻译到后来时,不得不将最后 24 回压成 5 章。全书约删去了五分之二,最后 24 回至少删去五分之四。

《金瓶梅》的翻译,也同样如此。库恩在 1929 年 12 月 19 日给出版社的信中谈及《金瓶

梅》的翻译时写道:“我的转述并不全然是翻译,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加工,特别是中间部分。在叙述的过程中,一些无疑会令欧洲读者感到乏味的历史情况和次要事件,会把故事情节打断,我不得不进行删节,大胆地筑路搭桥,使被打断的情节巧妙地联系起来,有时还得补充作简要的提示。当我把这一切都做了,可能要多出约 150 页。由于我必须按合同规定的篇幅,因而不得不把其中一些有价值、但对于主要情节并非必要的内容删去。”⑩

三

译本在具体内容的取舍上,影响的因素则是多方面的。正如上面所提到的,西方读者的审美情趣,是译者首先要考虑的。中国小说往往从俯瞰的角度叙述,有一种高屋建瓴的磅礴气势。《金瓶梅》写的是西门庆一家的兴衰,但又不局限于西门庆及其妻妾的命运,而是描绘上至封建权贵、下至市井无赖的世界。中国读者不仅关注西门庆生子加官、枉法受赃、贪欲丧命等主要事件,而且乐于了解琴童藏壶、侍女偷金、趋炎认女、贪富攀亲的细节。西方小说则不然,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西方小说在结构上突出情节的吸引力,所叙往往为一、二人之生平经历。德语文学中常见的教育小说,从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到凯勒的《绿衣亨利》和黑塞的《玻璃珠游戏》,就是以某一主人公在他的时代里经历各事件而逐渐成长的过程为内容的,即使是托马斯·曼描述祖孙四代兴衰经过的社会小说《布登布洛克一家》,或者是海因里希·曼的历史小说《臣仆》、《亨利四世》,都毫无例外地把笔墨倾注于个别人物身上,而不象中国古典长篇小说那样,主子奴才轮番登场,事无巨细均予铺陈。习惯于西方小说传统的德国读者(包括译者),不免会感到中国小说过分繁杂臃肿,次要事件妨碍了主要情节的发展,次要人物频频出场冲淡了对主要人物的描写。为了使德国读者不感到乏味,于是

乎,库恩删除次要事件,“大胆地筑路搭桥,使被打断的情节巧妙地连接起来”,并且给《金瓶梅》译本加上副标题“西门及其六个妻妾的风流韵事”。

此外,译者对原著主题思想和艺术价值的理解,对翻译时内容的取舍,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著名作家茅盾在1934年曾对《红楼梦》进行节编,他删削了全书五分之二,并重订章回,节本也只有50章。在茅盾看来,《红楼梦》是一部“自叙传性质的小说”,中心思想是写“婚姻不自由的痛苦”,小说中的宿命论,“又是曹雪芹的遁逃藪,放在‘写实精神’颇见浓厚的全书中,很不调和,论文章亦未见精采”,所以“大胆将它全部割去”。^⑪

库恩则认为“《红楼梦》的基本倾向是道教思想”,他在译本的“附言”中详细论述了道家的“无为”思想如何构成小说的第一主题。他还认为,小说中豁达开朗、维系着整个家庭的贾母,体现了“母系精神”,构成小说的第二主题。而以贾政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还不如上述两个主题重要。基于这种认识,小说中关于甄士隐梦见仙师的描写,跛足道人的《好了歌》,惜春立意修行及宝玉游历“太虚幻境”悟仙缘等内容,库恩在译述中都尽量保留。相反,原著中最精采动人的、令无数中国读者心碎的黛玉葬花的情节,却译得十分简略,催人泪下的“葬花词”也略去不译。至于大观园众姐妹结社吟诗、饮酒行令的“风雅故事”,以及许多有一定美学价值的诗词,无论在茅盾的节编本,还是库恩的德译本,都因其“乏味”而被删去。

除上述两个重要因素外,社会道德观念以及书刊检查制度对译作内容的取舍也不无影响。库恩在翻译《金瓶梅》的过程中,出版商就曾写信提请库恩注意:“我请您尽可能把色情描写删去,至少译得不会引起反感。《金瓶梅》所受到的种种指责,在我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似乎可以进一步地删节。”^⑫库恩的《金瓶梅》译本称得上是洁本,但最初在瑞士出版时,仍遭到书检机关的禁止和没收。即使到了50

年代末,西方社会在道德观念方面已发生很大变化,库恩在发表《肉蒲团》时,也仍然遇到了书检的麻烦。译作因保留了原著中的某些色情描写,于1959年6月在瑞士出版后不久,就被当局和德国海关没收。法庭经审理判定该书属色情读物,于1959年11月下令销毁所有存书及纸版。社会道德及书刊检查对翻译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⑬

四

从读者方面看,库恩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受到了读者的高度评价。1932年,《红楼梦》译本出版后,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黑塞发表书评,称赞该书“不仅是德国的第一个译本,而且是欧洲的第一个最完整的译本”,“阅读这部长篇巨著,是莫大的享受,而且受益匪浅”。黑塞认为,“他的转述很优美,语言虽然不能说是充满诗意,但统一而流畅。也许有些小问题可以讨论,但总的来说,阅读它是一大享受。”^⑭1935年,黑塞读了《水浒传》的译本后,也撰文发表感想,认为读这本小说,“就象观赏一幅哥白林织花挂毯,或者一幅古代东方的图画”。^⑮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对库恩的译作都持同一种观点。陈铨先生在《中德文学研究》(1933)一书中探讨中国古典小说在德国的翻译时,对库恩的译作就颇有微词。他认为,“译者的勤勉,颇值得人佩服。但是他的翻译,第一层不完全,第二层仍然不能表达原文的好处,而且他随处只要遇着艰难地方,就任意删节,以致原书本来面目,因此大受损失。”^⑯

笔者认为,为了全面评价库恩,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小说在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翻译的历史,作一些纵向和横向的比较。

中国小说在欧洲的介绍,可以追溯到杜·赫尔德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德文版:1749年),该书首次介绍《今古奇观》中的三篇故事。从那时起,到1926年库恩发表《好逑传》译本,

经历了 170 多年,中国小说的德译本,大大小小合起来只有 30 多种,其中大部分选自《今古奇观》和《聊斋志异》。古典长篇小说《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虽有介绍,但仅译出了若干零星的片断。称得上是中篇的,只有穆尔(Christopher Gottlieb von Murr)从英文转译的《好逑传》(1866)。这些作品之所以被选译,是因为要以此介绍中国的宗教和封建伦理道德。1908 年,德国研究世界文学史的专家奥托·豪塞尔(Otto Hauser)在《中国文学》一书中对中国诗歌作了较系统的介绍,关于中国小说,则只有一小段文字,并仅限于列举出当时欧洲出版的 13 种译本。^{①7}这种片断介绍的状况,到了库恩时,情况才有了新的突破。库恩的译作,包括长篇小说 12 部,中短篇小说 30 多篇,寓言 70 多则,到目前为止,所出德文版本近 90 种。^{①8}其译作选题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译作数量之多,超过了以往所有德译中国小说的总量。在译本的附言或跋中,库恩对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分别作了详尽的评介,其中包含不少独到的、精辟的见解,读者在读完译作后,可以从评介中了解小说的作者、成书、主题思想、艺术手法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无疑大大拓展了西方对中国文学以及通过文学作品反映出来的中国历史和社会文化的认识。

就翻译质量而言,前人的译作虽然不乏好作品,如卫礼贤(Richard Wilhelm)译的《中国民间故事》,锐芒(Claude du Bois-Reymond)译的《钟馗》(即《平鬼传》),但相当多的德译本是从英文或法文转译的,难免与原著有出入。库恩译《金瓶梅》,依据了 1695 年苏州臬鹤堂刻印的张竹坡版本;译《红楼梦》,依据了萃文书屋和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的两种版本;其他译作,也都直接译自中文。由于库恩汉语修养高,对中国文化又有较深的了解,所以,翻译质量能超越前人。再看看欧早期的中国小说译本:焦里(Bancroft Joly)的英译本《红楼梦》

(1893),内容为原著前 56 回,王际真(Wang Chi Chen)的英译本《红楼梦》(1929),内容为库恩译本的四分之一。在《金瓶梅》的欧洲译本中,莫朗(Georg Soulie de Morant)的法译本(1912)只有 294 页,1929 年纽约出版的英译本仅 215 页。德国人嘉普棱茨兄弟(G. v. Gabeletz, H. A. V. Gabeletz)于 1864 年根据满文版翻译了《金瓶梅》的片断。奥托·基巴特(Otto Kibat)于 1928 年也只译出了前 23 回。^{①9}这就难怪库恩的译本在德语国家一版再版,并迅速被译成其他欧洲文字。据《弗朗茨·库恩博士,生平及著作》(1980)一书提供的资料,至 1978 年止,《金瓶梅》译本由岛社重版了 18 次,其他出版社翻印了 4 次,印数达 17 万册。《红楼梦》译本,岛社重版 10 次,其他出版社翻印 2 次,印数近 9 万册。《水浒传》重版 4 次,1953 年改编为少年儿童读物,印数近 5 万册。《肉蒲团》译本于 1959 年初次出版,重版 8 次,印数近 7 万。在欧洲,库恩的译作被转译成英、法、意、荷、匈等 12 种欧洲文字。^{②0}

比较文学理论家罗伯特·艾斯卡皮特(Robert Escarpit)曾提出“创造性背叛”的论点。他指出,如果过去几百年里所有译者都仔细地、准确无误地翻译,那么,文学从一国到另一国的影响就不是那么值得成为研究对象了。比较文学之所以能作为研究领域,部分地由于存在对原文有意无意的误释或歪曲。当文学的形式、思想或倾向从一个环境移植到另一个环境时,由于翻译是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因此,总是存在出严重差错的危险。

翻译,或者对原作进行改编,只是创造性背叛的特殊方式。按照艾斯卡皮特的观点,人们甚至可以说,任何一种构想在写成文字传播开的一瞬间,都发生“背叛”。要读懂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作品,必须具备相应的文化素养,才可能重构作品发表年代的读者的审美观,而这种重构的过程是非常困难的,不是每一本书都可能这么做,也不能要求每一个读者都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有意

识地去误解作品,按照作者从来没有想到的方式去接受作品。

艾斯卡皮特的话,也许说得有点过分,但是,却阐明了一个道理:作者与读者,创作与欣赏,这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作品的意义,并不是单方面由作者决定的,它同时取决于读者的理解。正如艾斯卡皮特指出的:“对一本书来说,如果再没有人去误解它的话,那就意味着它的死亡。”

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象库恩这样的翻译家的创造性背叛,中国的古典小说是不可能走向世界的。弗朗茨·库恩不愧是杰出的、成果丰硕的翻译家,他的译作是中国小说德译史上光辉的里程碑。●

①⑩⑫⑬⑮⑰ 参阅 Hatto Kuhn: Dr. Franz Kuhn, Lebensbeschreibung und Bibliographie seiner Werke, Franz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1980

② Franz Kuhn: Chinesische Staatsweisheit, Damstadt, Otto Reichl, 1923.

③ 见: Ostasiatische Rundschau, Nr. 17, S. 4, 1927.

④⑥⑨ 参阅 Franz Kuhn: Die Räuber vom Liang Schan Moor 的“跋”, Insel Verlag, 1953.

⑤ 译自 Franz Kuhn: Der Traum der roten

Kammer, Insel Verlag, 1932.

⑦⑧ 见: Asia Major, Vol 5, Fasc, 1928, S. 278.

⑪ 见《茅盾全集》第 20 卷,第 51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版。

⑬ 参阅 Adrian Hsia: Franz Kuhn als Vermittler chinesischer Romane, in: Die Horen, 34. Jahrgang, Band 3, 1989.

⑭ 见 Hermann Hesse: Rezension über Franz Kuhn(Ü), in: Neue Zürcher Zeitung, Nr. 2348, 14. 12. 1932.

⑮ 见 Hermann Hesse: Rezension über Franz Kuhn(Ü), in: Notizen zu neuen Büchern, in: Die neue Rundschau 46, 1935, 1, S. 325.

⑯ 见陈铨: 中德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上海,1936。

⑰ 见 Otto Hauser: Die chinesische Dichtung, Brandus - Verlagsbuchhandlung, Berlin, 1908.

⑱ 奥托·基巴特(Otto Kibat, 1880 - 1956)及其兄阿尔吐·基巴特(Artur Kibat, 1878 - 1961)从 30 年代开始翻译《金瓶梅》,译文于 1967—1986 年在德国陆续发表,全书共 6 册,前 5 册为本文,最后 1 册为注释。译作的完成,是德国译坛的又一盛事。

责任编辑:陶原珂

试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车永强

(茂名师范学院讲师,广东 茂名 525002)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5-0091-05

钱钟书写于 1946 年的《围城》,至今
已有英、法、德、日、俄、捷等多种文字的
译本,是一部饮誉世界文坛的长篇杰作。
凡读过《围城》的人,有一点总体印象恐
怕是相同的,那就是它所表现出的那种
凌厉的讽刺。柯灵在《钱钟书的风格与
魅力》中说:“钟书创作的基调是讽刺”。
的确如此,《围城》中,辛辣机智的讽刺锋
芒几乎无所不至:社会、人生、道德的病
态,都逃脱不了它的冷嘲热讽。下面就
讽刺形象和讽刺风格两方面对《围城》的
讽刺艺术试作分析。

一

钱钟书在“自序”中说:“在这本书里
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
人物。”这“一类人物”,就是当时病态的
知识分子。所以,《围城》的讽刺艺术特
点首先就体现在独特的讽刺形象上。

在 30 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
社会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没有远大
的人生理想,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精神
空虚无聊,灵魂卑鄙,有的甚至已经耗尽
人气,堕落成为仅是“无毛两足动物”。
面对这种现象,作者以“忧世伤生”的心

境创作了《围城》,以方鸿渐的生活经历
为线索,将讽刺的笔锋伸展到中上层知
识界的各个角落,用多种方法勾画出病
态社会中形形色色知识分子的形象,展
现出一部新“儒林外史”的生动画卷。

一、漫画式的肖像描写

钱钟书对病态知识分子的讽刺在对
他们进行描写时就开始了。他以十分明
确的观感和态度,在每个人物出场时,都
对人物肖像进行了夸张、变形的漫画式
描写,极尽讽刺之能事,描绘出一个又一
个神情毕肖的漫画形象,使人未见人物
行藏,便已看出人物的性格及作者的情
感态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第
七章开头对汪处厚的肖像描写:

“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
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
红菱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
人,胡子都生不象样,又稀又软,挂
在口角两旁,象新式标点里的逗号,
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
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可以跟寿
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
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
剃下来了,慌忙安上去,胡子跟眉毛

换了位置……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线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

从这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那漫画式的笔法。而且，作者在描绘这位汪大人可笑的容貌时，对他的历史、思想、心理也一并作了讽刺，使他一亮相，就给人滑稽、迂腐的印象。

又如对沈太太的描写：“她眼睛下两个黑袋，象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红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一连用几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来铺陈渲染，读之令人忍俊不禁而厌恶至极。

类似这样的例子《围城》中随处可见，作者几乎在每个人物出场时，都对其肖像进行一番讽刺性描绘，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唐晓芙。唐晓芙是《围城》中唯一没有用讽刺手法去叙写的人。在外貌上，也是把她作为最美的典型来对待。但作者笔锋所及，却也运用对比的写法，调侃了社会上的一些人，如“她的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象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象这种几乎通篇以讽刺的漫画式笔法描绘人物肖像的现象在文学海洋中是极少见的。

二、犀利精微的心理讽刺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对于讽刺幽默作家来说：“一切琐庸的、可怜的、卑微的、鄙陋的东西，似乎都不能逃过他的眼睛”（《美学论文选》）。钱钟书善于用洞烛幽微、纤芥毕肖的笔触刻划人物心理，其犀利精微的心理讽刺，使人物形象具有立体感。

首先，他善于透视人物言行举止的心理基础；善于挑开蒙在人与人之间的

各种关系上温文尔雅的面纱，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出讽刺对象灵魂的丑陋，戳穿和嘲笑讽刺对象在言行举止上的虚假性。李梅亭在赶赴三闾大学就职的路途上所表现出的吝啬心理就很有讽刺意味：启程时，他抢着买低等船票，明明是为了自己省钱，却偏要撒个谎来骗取别人的好感；路途中，他因为舍不得用自己的新雨衣，便找借口用别人的伞；他带了一大箱药品，准备在内地的学校卖大价钱，却不愿意给一些仁丹于身体不适的孙柔嘉服用，因为一包仁丹开封后就卖不到好价钱。但不给药，又显得过于小气，左思右想，忽然灵机一动，记起自己前些天已打开一瓶鱼肝油丸。虽然鱼肝油丸比仁丹贵，但已开封的药却“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于是拿粒鱼肝油丸给孙服下，弄得她又一次呕吐。李梅亭这种吝啬鬼式的怪诞心理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吝啬的心理活动中暴露出来，给人以厌恶之感，其正人君子的假面具也就被一层层撕了下来。

其次，钱钟书还善于把作品中各种人物的心绪交织在同一场合，形成微妙而又激烈的心理冲突。《围城》第三章写到一次青年知识分子的聚会，便是一场不期而遇的心理战。这次聚会由赵辛媚作东，有苏文纨、褚慎明、董斜川、方鸿渐等人参加。赵辛媚请方鸿渐参加的本意是为了使方鸿渐喝醉，在苏文纨面前出丑，以发泄妒嫉之情。结果让方喝醉酒的目的达到了，但苏文纨却当着大家的面给予方鸿渐关心爱护，这使赵辛媚感到一种胜利后的失望；褚慎明与方鸿渐在席间互相鄙视，唇枪舌剑，各不相让；董斜川以会作旧体诗，懂“同光体”而自傲，又遭到赵辛媚、褚慎明的嘲弄讥讽；更为有趣的是褚慎明因为美貌的苏文纨跟他讲“心”，竟激动过分，把夹鼻眼镜都

掉进牛奶杯子里了。他拾起眼镜又不肯戴上，“怕看清大家脸上逗留的笑”。后来方鸿渐酒醉呕吐，褚慎明掩鼻表示鄙厌，“可是心上高兴，觉得自己泼的牛奶，给鸿渐的呕吐在同席者的记忆里冲掉了。”对褚慎明的这种阴暗心理的讽刺，触及了某些知识分子最敏感之处——面子。这种把讽刺形象的丑陋心灵，由隐到显，由暗到明，通过心理战而昭然若揭，猛然外化的手法，显示出钱钟书心理讽刺的高超、犀利。

三、入木三分的精神剖析

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钱钟书冷眼观察当时种种腐败堕落现象，在《围城》中深刻地解剖了一部分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空虚、苦闷、颓唐、堕落的精神世界。

崇洋媚外，是其笔下形象最为突出的病态精神。如方鸿渐说过：“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科举功名一样，我父亲常说，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了，非出不可……”又如冒牌的克莱登大学博士韩学愈不但用假文凭做敲门砖，还把自己在国外登广告求职之类的东西当做“作品”开进学历，从而骗取三闾大学教授职称和历史系主任职务；所谓“哲学家”褚慎明，到处写信吹捧外国著名哲学家，骗得他们的回信称赞自己，于是拿着三四十封这类回信“吓倒了无数人”；就连较为正直的方鸿渐，在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在留学归国之前买张假文凭，蒙混过关。正如他自己所说：“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这不但是对当时社会风尚的尖酸嘲笑，也是留洋知识分子的自我嘲弄。

现代中国知识界，虽不断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侵袭、渗透，但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决不是西方文明能够轻易取而代之的。因此，二者在中国知识界既激烈冲突，又互相妥协，这样“国粹”与“洋货”结合在一起，对一部分知识分子施下双重腐蚀就不足为怪了。《围城》中就有不少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既崇洋媚外，身上又保留着浓重的封建酸腐气。对这种精神病态，作者也同样作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如董斜川可以算作沾了“洋气”的遗少，他是清末民初落后文学流派“同光体”的崇拜者，喜作旧诗，写些“泼眼空明供睡鸭，蟠胸秘怪媚潜叫”之类晦涩难懂的东西，捧着“同光体”的僵尸到处卖弄炫耀。他骨子里封建味十足，却又在外国任过什么军事参赞，镀了一身“洋”金，连方鸿渐也对“这样一个英年洋派的人，何以口气象遗少”感到奇怪。又如对半旧遗老李梅亭和高松年在三闾大学极力推行所谓“导师制”的讽刺，可谓入木三分：“导师制”是由国民党教育部颁发的，从牛津、剑桥搬来加以篡改的货色，身为校长的高松年和身为训导主任的李梅亭不遗余力地推广实施。“导师制”虽然订出一些诸如导师与学生同桌吃饭，同上一间厕所之类的“平等”规定，却仍然掩盖不了其浓厚的封建色彩。象李梅亭这样一个曾在赴校任教途中嫖娼、出尽洋相的家伙，上任伊始便“严于男女防”，规定“未结婚的先生不得做女学生的导师”，给“导师制”打上封建假道学的印记。“导师制”不过是“西方文明”与中国“封建土产”相结合所产生的怪胎而已，由李梅亭、高松年这类满口仁义道德而满肚男盗女娼的人来推行，就更具讽刺性了。

像这样的精神剖析，《围城》中比比皆是。由于作者的个人特质——才华横

溢恣肆,笔力轻捷老辣,观世精细机敏,使他的讽刺更多有机智、幽默的锋刃。

再从讽刺的态度看,《围城》出众的原因之一,还在于作家的清醒。艾青在《诗论》中说:“讽刺是人类的理性向它的破坏者的一种反击。”作者面对当时社会上某些知识分子逐渐堕落为人类理性的“破坏者”,深为忧虑和蔑视。但对不同类的知识分子的讽刺,作者在态度上是有区别的。

一是无情的冷嘲。如对李梅亭、高松年、韩学愈、汪处厚之类的伪君子、假道学,对拍马奉迎、欺世盗名之徒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尖刻的挖苦嘲讽,用的是鲁迅称道过的萧伯纳的讽刺手法:“使他们登场,撕掉了假面具、阔衣裳,拉住耳朵,指给大家看:‘看那,这是蛆虫’。”(鲁迅《南腔北调集》)

二是“存情的讽刺”。如对方鸿渐、赵辛媚、孙柔嘉等人,作者在对他们人性中的弱质进行了淋漓酣畅的嘲讽之后,往往又隐隐透露出含有深意的同情、怜悯,类似于果戈理“含泪的微笑”,体现出作家“忧世伤生”的深沉感情。

二

《围城》讽刺艺术的另一表现,在于其独特的讽刺风格。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讽刺笔法的千变万化,不拘一格。它既有我国古典名著《儒林外史》式的冷嘲,也有马克吐温式的热讽和幽默,还常常在叙述、描写之中设有大量新奇精辟的譬喻,融入广博的知识和科学名词术语,随手拈来,涉笔成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作者用他那支降妖棒一样的笔,描绘出一批人物的丑相,揭开他们所披挂

的五颜六色的外衣,显露出他们可卑、可耻和可笑的本相。例如,对假哲学家褚慎明的描写:“他心里装满女人,研究数理逻辑的时候,看见从后果推测前因那个名词会联想到后臀,看见×记号会联想到接吻。”有一天,赵辛媚设宴请客,褚慎明先入席就座,当苏小姐步入宴会时,“褚哲学家害馋痲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弹出的子弹’,险的突破眼眶、迸碎眼镜”。这段漫画式的描写,生动地勾勒出褚慎明卑鄙下流的丑相,揭示出那肮脏的灵魂。作者善于在对某一对象进行讽刺时,夹进精粹的譬喻,使被讽刺的对象更加具体、鲜明。如对洋奴张吉民的讽刺:“张先生跟外国人来往惯了,说话有个特征……喜欢中国话里夹无谓的英文字。他并无中文难达的新意,却需要借英文来讲;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这里用两个比喻,通俗风趣地嘲弄了张先生以讲几句英语为荣的洋奴相。此外,作者往往在铺写之后,顺手牵羊、旁敲侧击,使其讽刺的含义更深刻广泛。如,写方鸿渐向爱尔兰人买了一张博士文凭后,就写信去教训对方,责令其停止出售假文凭的勾当,弄得那个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停。至此,作者顺笔讽刺道:“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的唯一胜利”,这个突然脱颖而出的一击,恰好切中要害。试想,旧中国在外交上哪一次取得过胜利?真该封方鸿渐为“英雄”了,在这诙谐幽默之中露出讽刺的锋芒。

《围城》中不仅有杰出的热讽,而且有绝妙的冷嘲。如方鸿渐一行,从上海赴湖南的途中寄宿的“欧亚大旅社”,破

烂不堪,臭气扑鼻,这些暂且不说,仅那些跳蚤、虱子之多,就够吓人。作家冷嘲道:“蒙马脱尔的‘跳蚤市场’和耶路撒冷圣庙的‘世界蚤虱大会’全像在这欧亚大旅社里举行”,而且,方鸿渐等人上了火车,还“有几个多情而肯远游的蚤虱一路陪着他们。”到了湖南的鹰潭一家小店,方鸿渐他们进门就看到“门口桌子上,一叠饭碗,大碟子里几块半生不熟的肥肉,原是红绕,现在像红人倒运,又冷又黑。旁边一碟馒头,远看也像玷污了清白的大闺女,全是黑斑点,走近了,这些黑点飞升而消散于周遭的阴暗之中,原来是苍蝇。这东西跟蚊子臭虫算得小饭店的岁寒之友。”真是“四害”之多,不敢目睹,见了令人恶心。

二是奇趣横生的讽刺语言。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围城》的讽刺语言巧妙、精致,几乎是涉笔成趣,浑然天成。各种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幽默的警句格言,蕴含深意的象征、暗示,以及中外古今的典故、逸闻,纷至沓来,琳琅满目,给人以奇丽谐趣的美感享受。如高松年在三闾大学文学研究会上讲话时,劝人做“法国——罗素(声音又象“噜苏”,意思是卢梭)”,在物理学迎新会上,“他那时候没有原子弹可讲,只可以呼唤几声相对论,害得隔了大海洋的爱因斯坦右耳朵发烧,连打喷嚏”。这是谐音和戏谑的结合。仅从这

里,便可以看出其讽刺语言是多么丰富多彩,而又蕴含着多么深的讽刺意味。

然而,《围城》讽刺语言的最大特色,是大量妙趣横生、联翩而至的新鲜比喻的创造和运用。23万多字的《围城》,比喻竟多达几百个。这与作者对比喻有深入的研究有关。他在《旧文四篇》里对比喻有精辟的论述:“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比喻包含相反相及的两个因素: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愈高”。对比喻艺术的精深研究,加上高超的联类取譬的能力,使他能够在小说中把各种新鲜奇妙、生动形象的比喻散布在情节、肖像、心理、细节、景物等各个方面的描写中,令人目不暇接。

总之,《围城》中的比喻复杂多样,有一般的明喻、暗喻,有曲喻,有撒喻,有本体和喻体隔得很远的奇喻,有连珠成串的妙喻……其中有的是刻划人物的点睛之笔,有的婉曲地托出人物的心理,有的是描景状物的闲适笔墨,有的显示出揭穿丑类、针砭时弊的犀利锋芒;有的又构成洞悉人情世故的警句格言……各种比喻手法的自如运用,强烈地增强了讽刺效果。●

责任编辑:陶原珂

赋学研究的一部力作

——读曹明纲著《赋学概论》

□ 伏俊琰

(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陕西, 西安 710000)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5-000-02

以讲究才学和文辞为主的赋,是中国古代最具有文化特色的一种文学体裁。它以悠久的发展历史和丰硕的创作成果,给予我国古代的文化、尤其是文学创作的形、发展和成熟,作出过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赋学研究领域从荒芜、寂寞到逐渐兴旺繁荣,一批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和论文相继问世。如马积高《赋史》,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万光治《汉赋通论》,叶幼明《辞赋通论》,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等。这些专著由于体例所限,多偏重于史的论述(叶幼明《辞赋通论》例外),即对赋的体式演变和创作概况作历史陈述,而对它们的成因及赋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与其它各类文体的相互影响等,却未能予以更多的注意和理论上的探讨。曹明纲的《赋学概论》,从横的角度着眼,抓住赋的特征、起源、分类、演变、作用、艺术贡献和结集评论等诸多问题,分析论证,提出自己的看法,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赋学专著。

本书最大的特点正如书名所说是一个“概”字,作者对前人有关赋的研究成果尽量广泛吸收,囊括无遗,并且详加梳理评议。在此基础上,或对某一成说用

新的材料、新的方法进行论证,或提出自己的修正意见和观点,持论审慎,有的放矢,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关于赋的起源,曹著认为,“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文心雕龙·诠赋》),即设辞问答、韵散相间是赋体文学的基本特质,是它区别于诗的一个根本特征。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曹著认为冯沅君、任半塘“赋出于俳词”之说,最为合理有据。因为历史上留存下来的俳词,形式上以问答构篇、韵散结合,与赋体的基本要素完全一致。此说立论的可取,在于给赋文体一个明确的界定,一个完整的系统,然后以“同源”的原则探索这一系统的渊源。

关于赋的分类,曹著在总结前人分类的基础上作了一些调整:首先把赋分为“文体赋”和“诗体赋”两大类,“文体赋”中包括“辞赋”“俳赋”“文赋”三类,“诗体赋”中包括“骚赋”“诗赋”“律赋”三类。曹著所谓“辞赋”,就是前人说的“两汉赋”或“逞词大赋”。所谓“辞”,不是传统观念中的楚辞,而是指包括春秋战国时代优人和行人在内的说辞。以“辞赋”名之,其意即在显示优语和纵横辞令对赋的直接影响,和他的“赋源于俳词”说

相一致。“律赋”前人多归入“文体赋”内，因为它是在“骈赋”的基础上形成的，曹著归入“诗体赋”中，主要是因为律赋在体式上有别于骈赋的特点，如讲究篇章结构的起承转合、限定用韵类别和类数、注意声调的和协与字数的限制等，无不与当时诗歌创作中四声八病的盛行和律诗的逐渐定型有关。所以，将其归入“诗体赋”类，对体现它的形体特征及其成因更为有利。

赋作为文体，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赋和其它各类文体相互借鉴、相互影响，而政治对文学也产生着或大或小的影响。曹著在论述各类赋的演变时，特别强调赋与其它文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如骈文对骈赋的影响，唐宋古文运动对文赋形成的作用，赋对唐代七言歌行的影响等；同时也注意社会政治活动对赋的影响，如唐宋科举与律赋的关系，明清试赋与文赋结构的变化等。赋从体裁到题材方面的嬗变，也是曹著论述的主要内容之一。这种论述，兼顾赋的形式特点和题材类型，使人能在洞悉赋体源流类别的同时，也获得创作题材方面传承沿革的信息和同题异体的创作状况，体现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考论上，作者一丝不苟，显示了驾驭材料和濯旧出新的能力。例如，骈赋何以又称为“俳赋”，一般学者未予深究。曹著认为，元代祝尧《古赋辨体》首次提出“俳赋”这一名称，用来指三国、六朝时期的赋，是表明在他看来，这些赋都是一些失情亡义而专注于辞的游戏文字。同时，“俳”字本义虽与偶对无涉，但它所指的戏言，在形式上，却多连耦者。张衡《论贡举疏》中所谓“连偶俗语，有类俳优”，刘知几《史通》所说“对话俚辞，盛行于俗”，可见，偶对骈俪，本是“俳体”的一个特色。再例如，关于考察骈赋中开始使用四六隔句为对的基本句式始于梁代，非常仔细；关于科举试赋的开始年代，考辨诸家之说，最为审慎；对律赋的发展线索的描述，尤其详赡，等等。

当你抓住一个系统的每一细小因素、每一种文体的一枝一叶进行分析时，你的研究才会深入；当你胸怀全局，站在理论的高度时，才会有“一泓海水杯中泻”和“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思辨穿透力。这是我读了《赋学概论》后的一点感想。



责任编辑：童 轩